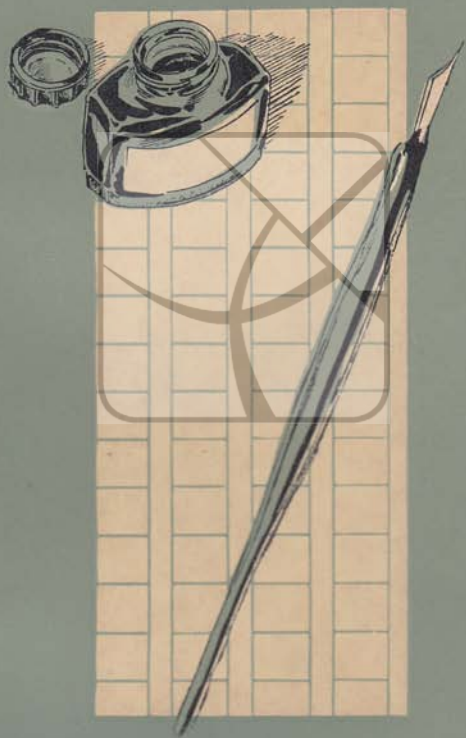


文人的另一面

溫梓川 著



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 印行







洪天賜教授捐贈

文 人 的 另 一 面

溫 梓 川 著



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 印行



文人的另一面

溫梓川著

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星洲大坡大馬路二〇五號

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承印

香港西營盤葛安里十七號

發行
吉隆坡 世界書局
檳城 世界書局
各地書局均有代售

定價港幣一元八角

序

這本小書可以說是我的回憶錄的一部分，所寫的，都是以我的師友爲主；而我的師友之中，則以文人爲最夥。他們的道德文章，相信在讀者羣中早已熟悉；但我所寫的，却爲讀者所懵然的另一面。當年他們的聲教，他們的逸興，時至今日，雖說已事過境遷，但印象猶新，每每偶一憶及，仍不免有親切之感。西塞羅說得好：「友誼常常變成不是彼此有益，或是彼此政見不同，有時雙方因了年老或境遇艱難而性情改變。」正足以說出我寫這些回憶錄的心境。

在我的師友之中，除已歸道山者外，今日倖存的，都已垂垂老矣！至於我自己，也已踏進了哀多樂少的中年的門闕；青春年少的情懷，已不可復得，自然，青年時期的舊夢，師友的面影，今日縱然能夠重溫，也不免會感慨萬千了吧？

此類文字以前雖則寫過不少，惜均燬於兵燹，戰後十餘年來，陸續重寫的結果，分量已不如昔，也就成了目前這一副寒傖的面目。好像有人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做到了剩了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吧？但是我却以爲一個人到了連回憶都沒有，那纔是最悲哀的。陸放翁有兩句詩說得好：「舊朋雲散盡，予亦感飄零。」這種無可奈何的寂寞的情懷，也還是我輩今日所能夠體味得來的。在我的師友之中，足紀的事尚多，現在我只能把這些自身往還的經歷與實感，用了拙劣的筆墨，老老實實地寫了出來了。

溫梓川 一九六〇年仲夏。

本書作者其他已出版的編著譯：

1. 戀歌二百首（一九二九）
 2. 山歌選（一九三〇）
 3. 夢囈（一九三〇）
 4. 梓川小品（一九三三）
 5.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一九三三）
 6. 南洋戀歌（一九三五）
 7. 美麗的謊（一九四〇）
 - * 8. 夫妻夜話（一九五二）
 9. 美麗的肖像（一九五三）
 10. 血洒黃沙（一九五三）
 11. 走向橋邊的女人（一九五五）
 - * 12. 郁達夫南遊記（一九五六）
 - * 13. 沈從文小說散文選（一九五七）
 - * 14. 作家的學生時代（一九五七）
 - * 15. 作家的創作經驗（一九五八）
 16. 馬來亞研究（一九五九）
 17. 某少男的日記（一九六〇）
- （* 爲本社出版，或發行者）

目 次

甲 編

史學家傅斯年.....	1
張鳳的面線點.....	6
葉公超二三事.....	9
談梁實秋.....	13
梁遇春與散文.....	17
汪靜之與「蕙的風」.....	20
馮三昧講小品文.....	24
周谷城教英文.....	29
李石岑談人生哲學.....	32
沈從文像小商人.....	37
顧仲彝、洪深不教戲劇.....	41
張資平教地理.....	46
鄧胥功的「要得」.....	50
京片子和衛生學.....	54
彭家煌教國音.....	56
章克標登龍有術.....	59
陶冷月專畫冷月.....	62

乙 編

秋野社的一羣.....	69
徐志摩朗誦秋聲.....	72
曾孟樸談孽海花.....	75

張競生開美的書店·····	81
---------------	----

丙 編

雨巷詩人·····	85
邵洵美金屋藏嬌·····	93
蔣光慈印象·····	97
與豐子愷的「緣」·····	101
滕固在伏見丸上·····	105
文藝茶話·····	111
情書一束·····	114
崔萬秋的啓事戰·····	118
曾今可宣告文壇下野·····	122
「何徐事件」的內幕·····	126
夏炎德寫法蘭西文學史·····	129
徐悲鴻坐對瓶梅食餅乾·····	133
郁達夫三宿檳城·····	138
蕭乾在檳城·····	143

·甲 編·

史學家傅斯年

一九二六年春，我負笈廣州，因為學校早已開學了，而且都是秋季始業的，春季不招生，我自然進不了學校，便由朋友的介紹，跟幾位很有學養的老師補習功課，到那年秋季，我居然出於意料之外考進了中山大學屬於文學院管轄的「預科甲組」。上課之後，纔知道功課並不繁難，只是因為當時時局不安定，大家都不能安心讀書，我讀了一年，就轉學到上海暨南大學去了。

在廣州住了一年多，上課的時日並不多，但我到圖書館去的時間反而多了起來，這一年多的時間，老實說，能夠稍有所獲的話，無非是在圖書館裏研鑽得來的一點點成果吧了。

記得那年秋季開學時，中山大學請來了一個肥頭胖耳的大塊頭，他有一頭蓬鬆的亂髮，一對玳瑁的羅克式的大眼鏡，他經常穿着那時最流行的大反領的ABC襯衫，沒有打領帶，外面罩上一套白嗶嘰西裝，那副形容，說起來就是那類不修邊幅的典型，但却顯出了與眾不同的風度，他似乎永遠是那麼滿頭大汗，跟你說不上三兩句話，便要掏出一方潔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登在中大出版部附設的民俗學會內，埋頭伏在室中央的一張大方桌上寫着甚麼，他的背後靠窗的地方，坐了一個穿着很樸素但服式入時的女郎，這個女郎也不時在寫着些甚麼，同學們要購買中大出版部出版的叢書，往往就是向這女郎購買的，而我那時也最愛購讀民俗

學會叢書，每出一本，便購置一冊，譬如鍾敬文，容肇祖先生的著作，我幾乎都先後讀過不少。因為我那時是十五六歲的孩子，求知慾暢旺，因此常常到那方小窗口去買在別處便買不到的那些「冷門書」，因此也就漸漸地引起那個女郎和大塊頭的注意。

有一次，我到那裏去買鍾敬文的「民間文藝叢話」這本書時，那個女郎就對那個大塊頭說了幾句話，那個大塊頭突然把執着的筆桿放了下來，回轉身來朝我說：「你在本校念那一系的？」

「預科甲。」我坦然地說。

「你是華僑生麼？」他說。

「是的，我是從馬來亞回來的。」我說。

「難怪你會說普通話咯，」他說，「廣東話你會說麼？」我點點頭。

「我們出版的書，你差不多都買光了。」他說，「你喜歡研究民間文學麼？」

他簡直像是向我作口試，我知道他是個教授，但我沒有上過他的課，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誰。

「你對我們的書，有甚麼意見？」他又說。

「我覺得這些書的內容很好，很合胃口，祇是書本的版式太大，像一塊大方磚，躺在牀上不容易看。」我說。

他笑起來，然後又說，「一點不錯，可是這些書並不是供消遣的，搞學問怎麼可以躺在牀上搞的？」他的話說得很幽默，接着又說下去，「照你說來，那末我們的書版式並不會不對的。」

「封面也太隨便了，只是幾個藍色字，一點也引不起美感。」我說。

「那末你爲甚麼要買這些書呢？」他說。「可不是爲了
是我們的教授的著作？」

我點點頭。

「你說的一點也不錯，」他說，「這些書的內容和作者
吸引了你，並不在乎那張封面，可不是嗎？」

對着這樣的一個生公，我這塊頑石是沒有辦法不點頭
的。

「做人也應該這樣，要樸實無華纔好，」他說。

我光着兩隻眼睛聽着他向我說話。

「我看你也是個樸實的人，你雖然是個僑生，但一點也
不像那些僑生那麼有濃厚的紈袴子氣，我看你老是穿那麼一
套灰布中山裝，白帆布膠鞋，除了你的膚色之外，一點也看
不出你有僑生的壞習氣。」他說。

其實他那裏曉得呢？能夠背井離鄉的僑生，都不是有錢
子弟，他們那種浮華的壞習氣，那種紈袴子氣，也不過是後
來纔染上的，我心裏雖然這麼想，可是我到底沒有說出來。

他看我沒有說話，纔又轉換了話題說，「你如果喜歡看
有歷史性的資料，我們這裏有的是，你有空可以進來這裏看
的。」

我唯唯地應了幾聲，然後纔把本放在窗口邊沿的「民間
文藝叢書」拿走了。

後來我問了問那些「老中大」，纔知道那個女郎原來就
是許景宋，那個大塊頭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四運動」健將傅
斯年先生。

「提起此馬來頭大」，傅斯年先生那時也不過是二十七
八歲的青年，剛從英國留學回來。就在革命策源地的廣州中
山大學當文學院長，兼授文史功課。主持了出版部出版民俗

學會的叢書，他當年最出風頭的時候，還是在於五四運動前後，創辦了新潮社，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刊行「新潮」月刊，雖說該刊發行至第三卷第二號終止。當時他和羅家倫負責編輯，他那時還經常在新潮上發表了不少的論著和新詩。惜余生也晚，等到後來我懂得甚麼是新詩的時候，新潮也早已停刊了，而我也只能在一本北社編的民國十一年八月出版的「一九一九年新詩年選」裏得讀一鱗半爪。他的新詩分量雖然那麼少，可是却曾轟動一時，甚至日本的報章雜誌，如大阪每日新聞和中央公論等都先後鄭重地譯介了給日本讀者，其中有一首詩，叫做「老頭子和小孩子」的，曾刊在新潮第一卷第三期上，在四十多年後的今日看來，還覺得頗有意思；這首詩的好處在給我們一種實感，使人彷彿身歷其境，尤其寫出一種動象，藝術上創造力所到的地方，更有前無古人之概。那首詩寫道：

「三月的雨，
 接着一日的晴，
 到處的蛙鳴，
 野外的綠煙兒濛濛騰騰，
 遠遠樹上的「知了」聲，
 近旁草底的「曲曲」聲，
 溪邊的流水花浪花浪，
 柳葉上的風聲霹靂，霹靂，
 一組天然的音樂，到人身上化成一陣淺涼。

×

×

×

野草兒的香，
 野花兒的香，
 水兒的香，

團團的鑽進鼻子，頗覺得此身在空中蕩漾。

×

×

×

這一幅水接天連，晴靄照映的畫圖裡，
只見得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
和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
立在河岸堤上。
彷彿這世界是他倆的一樣。」

我跟他以後有機緣時常接觸，纔懂得了他的別開生面的治學方法。他的國學，很有淵源，無論中西文化，總愛探究窮源，常把科學方法同治一爐。不了解他的人，說他恃才傲物，我却覺得他是個和藹可親的長者，而且天真得很，對於義之所在，往往敢言人之所不敢言，誠如史記上說的：「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譔譔」，無論在朝在野，在現代人物當中，他可說是一介譔譔之士，可惜我在一九二七年秋離開羊城之後，就沒有機會再向他執經問難，一親警欵了。一別廿多年，雖然時常在報上看到關於他的嘉懿言行，但他在中山大學的歲月，却使我永留不滅的印象。

抗戰勝利後，朝野都給勝利沖昏了腦袋的當兒，當年的局勢，實在教人不敢恭維，他却衆醉獨醒地常常在世紀評論上撰論，大聲疾呼，那時他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就是「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洋洋灑灑的義正詞嚴地指責當年炙手可熱的行政院長宋子文，他以布衣而笑傲王侯，真可以說是朝者的一個傲骨稜稜的諍友。

後傅斯年先生接長台灣大學校長，於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二十日，患腦充血死於省參議會大禮堂上，當天他正列席答覆有關校政質詢，在首長席上昏厥逝世。抗戰時他在重慶參政

會，以放炮聞名，當日在省議會向他質詢的，正是台省著名大炮參議員郭國基，不料竟有此結果，接長台大前後不到二年，竟賚志以歿，識與不識無不哀思。

張鳳的面線點

在暨南，教授和同學當中，就有不少人是被列入怪人的。他們的奇行怪事，可供談資的，的確不少。我在暨南的那幾年間，耳聞目見，接觸既多，印象自深，可記的也不少。當年洪年圖書館館長的許克誠先生，他是廣西人，檳城華僑中學創辦時的校長就是他。他長着長長的鬍子，致有美髯公之稱。他到了暨南之後，『美髯』却割掉了，據同學的傳說，許師母青春年少，而『美髯公』則年華不惑，那一臉橫秋的老氣，自然不是許師母所喜歡的；畢竟妻權崇高，我們的美髯公也就不得不奉命唯謹，忍痛屏息割髯了。他當館長不久，便被調任中學部去當初中主任，後來又調到訓育處當訓育員，只要我們那位老校長鄭洪年先生高興，隨時都有升調的可能；三月一小變，半年一大變，簡直是家常便飯。許先生卸職之後，繼任的就是『天目八怪』之一的張鳳博士，他在暨南前後擔任過的職務可真多，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楚；校長要他擔任甚麼，他就擔任甚麼，據他自己說，他在暨南十多年，就只有校長和茶房沒有當過。他是暨南的甘草，同學們大大小小對他都有非常的好感。表面看起來，一團和氣，人也很融通，但骨子裏倒並不是一個隨和的人。

他說話老是慢吞吞地，當他張開口捲舌頭時，那雙大眼睛照例往上翻，往往老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這當兒，大概是在思攷着；這麼一來，也就格外慢吞吞了。他那一口浙江嘉善音口，就教我們那些華僑同學夠受了。頑皮的同學倒喜歡

模仿他，跟他學舌，但總學得不像，因此同學之間，就流傳着這麼一句笑話，『甚麼都容易學，張鳳說話不易學』。據說他的法語說得並不怎樣漂亮，大概與口音多少總有點關係，他雖然是巴黎大學的文學博士，但一點都不神氣，我在暨南那幾年，一年四季，碰見他，總是頭戴着那頂破舊的潤邊氈帽，身穿由灰轉成暗黃的大褂，只消看那副形容，你就決不會想到他是在花都的巴黎消磨過不少日子的人。

當他當了洪年圖書館館長的時候，他就把他那部最費他的心血，時間和金錢的『張鳳字典』，印成了二三寸長，一寸多寬的小本子，封面用紅白藍三色版，用上等道林紙精印，厚厚的一小冊，小巧玲瓏，好玩得很，定價雖然是大洋五角，可是似乎沒有誰花錢買過。

有一天晚飯過後，全校同學都躲在宿舍裏自修的時候，兩三個茶房抬了一隻大竹筐，裝滿了『張鳳字典』到每座宿舍，每間臥室去沿門分贈，每人一冊，多要多贈，不要也贈，並且還夾付着一張廣告，廣告的文字，簡單有趣，如『面線點，照字檢，』『容易學，容易檢，』『張鳳可殺，方法不朽！』等字句，每個同學人手一冊，自然皆大歡喜了。

第二天早上，佈告板上他也貼了上面的幾句標語口號，和很大幅的廣告文字。

他這套『檢字法』可以說是簡單易懂。記得當年洪年圖書館的圖書卡片，就採用他的面線點檢字法編製的。同學們用起來都稱便不置。所可惜的，就是他的這套檢字法，發表在王雲五的『四角號碼』之後，『四角號碼』有大書局和教育部的通令給他推行，我們的張博士，和他旗鼓相當，也印了中字典小字典自己去推行，還寫了文章在新月雜誌上向王雲五挑戰，他舉出『臭蟲』的『臭』字就把『四角號碼』駁得體無

完膚。他的檢字法的確是簡單易懂，那年全國圖書館協會在南京集會，曾定下了檢字法的原則十七條，考驗起來，在百餘種檢字法當中，張鳳博士的檢字法，被列入甲級，雖然如此，但王雲五的檢字法却因推行得法而稱雄天下。與張博士的傾囊自印小字典推行，真不足以相提並論。因此纔有『張鳳可殺，方法不朽！』這二句滿是火藥氣的口號，他的檢字法雖然簡便易學，但是今天知道『面線點，照字檢』的人恐怕還是寥寥可數吧？

張鳳博士原是巴黎大學的文學博士，好事的同學問起他花都的情形時，他往往總是瞪起那雙大眼，一時不知所答的。半晌，他纔慢吞吞地告訴你，他在巴黎留學的那幾年的生活很簡單，每天從宿舍到巴黎大學，圖書館，餐室，然後回宿舍，除此以外甚麼地方都不曾去，花都的巴黎在他的心目中也許和暨南就不相上下吧？

他在法國跟沙爾和伯希和研究古典文學和考古學，整理敦煌石室的文獻，如和他談左拉，莫泊桑等人，就會格格不入，他還會張着兩隻大眼，表情是毫不相干。

他在暨南流傳着一個這樣的故事，說是他考博士的時候，除了寫專題的考古論文之外，還有『孔雀東南飛』的譯詩，主考的教授問他：『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這隻孔雀是雄的還是雌的？』這一個有趣的問題，却把他難住了。他對考古雖然熱心，但對於這一隻孔雀的問題，却顯得是那麽不十分熱心。

暨南的秋野社成立時，他在秋野月刊上又大張旗鼓，提倡活體詩，發表活體詩。他的活體詩不過是一種近乎樂府和詞曲的解放，舊詩詞的氣息非常濃厚，格式也並不怎樣新，而意境也還是那麽舊，並沒有甚麼了不得。他在秋野上偶然

也發表幾首舊詩，却寫得比活體詩好得多了，往往還有新意境，但他却熱心於活體詩，把這些活體詩印成一長卷，又狹又長，就活像一卷經摺似的東西，看起來並不便當，倒是相當好玩呢。

我們的『天目八怪』之一的張鳳博士就是這麼一個有趣的怪人。

葉公超二三事

葉崇智這個名字，在讀者羣中恐怕知道的人並不多；如果說是葉公超呢，恐怕不懂得的人就很少吧？他現在是一個「外交家」，在未做官以前，他是大學教授。暨南大學和清華大學他都會先後在那裏當過教授，尤其是在暨南，時間也最長，暨南同學當中就很少人不知道他的。「甚麼都不怕，最怕廣東人講官話」，他雖然是廣東番禺人，可是聽他說的國語，一點也聽不出他是廣東人。

他原本是在英國牛津大學念英國文學的，他的英文造詣自然是頂呱呱的了，他的文章也寫得很好。說起來，他還是當年新月社的一員大將，尤其是他在新月月刊發表的翻譯，也最叫座。真可以說是數一數二的名筆。他在暨大，同學都叫他做葉崇智，而不叫葉公超，他寫文章纔用葉公超，想不到後來竟以葉公超而聞名，而葉崇智反而不彰。其實葉崇智這個名字，就是喬治葉的洋名中寫法，新聞記者都誤為喬治葉；殊不知崇智却正是喬治的另一寫法。現在大家都叫慣了「喬治葉」了，又有甚麼辦法呢？

西洋文學系的同學向有採用洋名的風氣，而採用的方式，大概可分三種。一是照中文名字拼音譯成。二是用名字的第一個字母作名，冠在姓前；我們叫它作「T·V·宋」式。

第三種是約翰李，大偉王之類；我們叫作「顧維鈞體」。因為顧維鈞的洋名叫做「惠靈吞顧」。我們班上有一個姓葉的同學，他的名字用英文叫做喬治葉，中文名字則叫「葉喬志」，是從安南來的。他第一次上葉崇智先生的功課，點到他的名的時候，葉崇智先生訝然地說：「怎麼，你也叫喬治葉？」語氣之間，大有「祇此一家別無分店」的意味。但是那時同學們都不知道葉主任的英文名字叫做喬治葉。

他是個書香世家的子弟，他的叔父葉恭綽老先生和鄭洪年校長是交通部的同僚。他在暨南，非常受同學的歡迎，他上課時講的英文，真教人聽出耳油，不情願下課。他那時不過二十八九歲光景，頭髮梳得伏貼，口咬煙斗，衣服整齊，風度翩翩，一點也不像那些不修邊幅的作家，倒十足像個紳士。大概是在英國住久了的緣故，他說話坦率，有風趣；在暨南常常和梁實秋、梁遇春、蒯淑平、林語堂等混在一道，談笑風生。

我記得有一次，他在班上談詩，不知怎的竟談到柳宗元那首名詩「江雪」。他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是一首極容易了解的五言絕句。大致沒有晦澀的問題。他說最後一句，顯然是全詩的核心。「獨釣寒江雪」可作三種看法：

一，雪天寒江裏本無魚可釣，人家都不來，惟有我獨自在這裏，穿着簑衣，戴着涼篷帽，在雪天的寒江上垂着釣竿，空候着魚來。假如我們這樣地解釋這句，我們對這位痛苦的漁翁自然要產生一種憐憫的感覺；因為他必然是為生活所逼迫到這步田地，明知道這時候不會有魚可釣的，可是還要來試試看。

二，我們可以把這四句湊成一幅雪景，以這位簑笠翁為

畫的中心，以千山、萬徑、寒江、雪、孤舟等，爲陪襯的背景。這樣，我們的態度也許不同，「獨釣寒江雪」只是一種美感的好對象，某種趣味的寄託。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決不會想到那漁翁的寒苦身世，他不過是走來裝飾這幅雪景的主人翁而已。

三，一個孤零零的漁父在這鳥絕人滅的雪中垂釣，在孤舟風雪中忍受着寒凍，他的忍耐，孤峭，勤苦都值得我們羨慕，因此我們也就認爲這首詩是歌頌漁夫的美德的。

這三種反應彼此差別很大。第一是人道的，第二是美感的，第三是訓世的。假如我們翻出柳宗元的年譜來看看，我們就知道這首詩是他在貶官時作的，那時他一連做了成十首絕句，都是感世態淒涼宦情淡薄的，這首詩，他也許是以自己比之「獨釣寒江雪」的漁翁。

公超先生在課餘之暇，本喜歡執筆爲文，這一段讀詩心得，後來還寫成了一篇「談讀者的反應」一文中的一段，發表在第二十三期的「自由評論」裏。

他曾到過星架坡，住過一個時期，那時正是中國抗戰時候，大概是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之間，他是重慶時代的中央政府派駐星架坡的特派員。那時郁達夫一方面在星架坡的一家報館編副刊，一方面還替盟軍情報部料理中文部的工作。據當年的傳說，達夫進情報部去，還是由於他和郭泰祺的推薦。

有一次，大概是在一九四一年秋假期間，我到星架坡去玩，和一個暨南同學到他住的大旅館去看他。他剛好沒有外出，他的房間並不凌亂，完全不像一個單身漢住的房子。不過桌上放着一瓶開了的白蘭地酒，還有幾隻玻璃杯。我們進去的時候，他就斟了一比克白蘭地酒給我們，還滲了一點清

水，很有點西洋人的氣派。

「葉先生，你有酒癖，喜歡喝酒麼？」我好奇地問。

「不，我不過學喝點酒吧了。酒不能不學喝的，將來有一天搞外交的話，不會喝酒，或者一喝便陶然大醉，不是很失體統嗎？」

原來他早就有這麼一番未雨綢繆的工夫，難怪後來會去搞外交了。

那次我們談了不少的話，談到時局，談到日軍進佔越南，他表示了他寶貴的意見，他說這場戰爭並不是短期可了，最快也得三年五載纔能結束的。

『萬一日軍南進的話，我們真不知要作怎樣的打算纔好，』那個同學慨嘆地說。

『你不應該退避，你有身家財產在這裏，不過你須視局面如何好生應付一下的。』

後來日軍果然南進，葉公超却逃出了炮火，逃到印度去。抗戰勝利，一個當記者的同學從重慶回到馬來亞，和我談起當年從星架坡逃出的情形，纔知道他是和喬治葉同一艘船到印度去的，郁達夫却坐了另一艘船逃到蘇島去了。他說他當時身上一個錢都沒有，除了身上一架拍新聞用的照相機之外，可以說是孑然一身。正在焦急與憂愁交煎的時候，他意外地遇見了葉公超，他知道他是暨大的教授，在星架坡原是認識的，一見面，就問他：『你爲甚麼要逃難？』

那個同學默然說不出話來。

『你是不是帶了很多錢？』他說。

『沒有，我一個錢都沒有！』

『沒有錢，你爲甚麼要逃難？』

那個同學當即很生氣地走開了。他起初以爲遇見了他，

多少可以替他想點辦法，誰知竟意外地使他失望了。他對我談起這段經歷時，還不免帶有悻悻然的餘怒。

抗戰勝利後，我在報館裏編電訊，纔知道喬治葉原來就是葉公超先生，已經做了外交部次長，當了外交部的發言人，常常看到他招待記者的談話，總是「無可奉告」，記者每發一問，他回答的就是這四個字的名句，使我不禁想起了他在星架坡旅館裏的縱談，自國事以至風月，靡所不論，慷慨之氣，不脫書生本色，妙語解頤，並不稍自諱飾；想不到一行作吏，說話也就顯得那麼拘束，那麼多忌諱了。當時還想起了他的酒量一定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了；而我却已戒了幾年的酒了。不過雖然在報上常常看到他的活躍的近影，却比不上在暨大當教授時那麼風度翩翩了，尤其是他那支頗有英國氣派的吸淡巴咕的煙斗，恐怕也久已不用了吧？

談梁實秋

「新月社」當年在中國文壇上，倒是一支陣容相當強盛的隊伍。新月社創辦了新月書店，出版新月雜誌，網羅了文人學者不少，而刊物也辦得有聲有色，精彩異常，對當年的中國文壇的確有過不小的影響，其中最為世人所知的「新月社」人物，當推胡適和徐志摩。當時新月社在文藝青年的心目中是「紳士型」的作家集團，其實新月社的本身，却並無所謂門戶之見的，青年作家之被提拔的，也是這一派不可磨滅的功績；例如胡也頻，何家槐，陳夢家等晚一輩的作家和詩人，差不多都是徐志摩一手提拔出來的，但是這一派的文人學者，除了胡適和徐志摩之外，差不多有大部份的作家和學者都曾在暨大執過教鞭；尤其是文學院的西洋文學系所延攬的教授和講師，幾乎全是「新月社」那一批人。這些教授

和講師，常常於課餘之暇，總喜歡到暨大門前的公共汽車車站附近的南園餐館去作座上客的。他們時常在那裏娓娓而談，談到可笑處，便哄然大笑，聲震於瓦；但是他們也常常爲了些文學上的或有關學術上的問題，甚至爭論得面紅耳熱，但不一會功夫，就又談笑風生起來。在這一羣教授當中，使我留下了印象的，便是梁實秋先生。我時常看到他總是默默地坐在那裏吐煙圈，靜靜地睇視着他們的爭論，半響不說一句話，他有一篇「旁若無人」的小品，說「逃避不是辦法，我們只是希望人形的豪豬時常的提醒自己，這世界上除了自己還有別人。人形的豪豬既不止我一個，最好是把自己的大大小小的刺毛收斂一下，不必像孔雀開屏似的把自己的毛刺都盡量的伸張」簡直可以在這裏作一個註腳。他總是穿着那件團花的貂皮袍子，兩袖反捲，擦得很光亮的黑皮鞋，頭髮向兩邊分梳成那時最流行的花旗裝，那張帶有幾分胖胖的發福的相貌，流露着一團和氣的神氣，他說話老是慢條斯理地，一點也不乾急，那一口清脆的普通話，總不免帶着些杭州人的粗獷的音色，有時碰着同座的人在爭論着甚麼的當兒，他每每從中說一二句便會惹起了哄然的笑聲。他的話自然是說得那麼幽默，正如他在教室裏講授時候一樣，說得那麼風趣。他留給我的印象，總是一副忠厚長者的形容，可是後來讀到魯迅對他刻薄的批評，使許多青年人輕視他，這倒使我不免會發出會心的微笑。他在暨大的那年，記得是在一九二八年期間，他兼任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青光」的編輯，他經常用「秋郎」的筆名寫一篇千餘字的小品，後來他把這些小品文集成一部「罵人的藝術」的結集，在新月書店出版，暢銷一時，「秋郎」的名聲也因此大大地響亮起來。他的小品文雖然成爲每個讀者喜愛的必讀的文章，但是外間知道「秋

郎」是梁實秋先生的人，恐怕就不多。他說話語氣就跟他寫的散文差不多，讀其文可以想見其人，這話以喻梁實秋先生是一點不錯的。他那篇「罵人的藝術」，真是說得淋漓盡緻，雋永動人，他的散文在當代的中國作家中，實在是一個名手，尤其是他近年來出版的一部「雅舍小品」，簡直可以媲美蘭姆 Charles Lamb。其實他的才華并不局限於這一方面，當年在新月書店出版的那兩部文藝批評論集「浪漫的與古典的」和「文學的紀律」，也是很有分量和獨特見解的作品，但是許多人却每每喜愛他的散文。

我記得他有一篇題名「中年」的小品文，其中有一段說：「別以爲人到中年，就算完事，不，譬如登臨，人到中年像是攀躋到了最高峯。回頭看看，一串串的小夥子正在「頭也不回呀汗也不揩」的往上爬。再仔細看看，路上有好多塊絆腳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臉腫，有如處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的井底蛙。回想從前，自己做過撲燈蛾，惹火焚身，自己做過撞窗戶紙的蒼蠅，一心想奔光明，結果落在粘蒼蠅的膠紙上！這種種景象的觀察，只有站在最高峯上纔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更多。」話是那麼平庸，但却說得入情入理，娓娓動人。

梁先生以爲「中年的妙趣，在於相當的認識人生，認識自己，從而作自己所能作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伶宜唱全本的大武戲，中年的演員纔能擔當得起大齣的軸子戲，只因他到中年纔能真懂得戲的內容」。他的散文藝術，可見一斑。自然不能怪人家那麼喜愛他的散文了。

他當年在暨南，好像是講授「文藝批評」之類的課程，他也常常爲我們的秋野月刊撰述。我因爲時間的不湊巧，始終沒有選修過他的功課的機會，只是有一次，因爲看錯了功

課表，冒失地闖進教室去，纔知道那天那一節功課，是他上的課，而我湊巧又是空着沒有課上，也就這樣沒頭沒腦地聽了一節他的功課，後來每逢這一天這一節時間，我總是到教室去沒頭沒腦地聽他的在我永不能銜接的功課。從他的談話中，我們知道他是白璧德的高足。從那時候起，我們纔知道他在商務印書館陸續出了幾本莎士比亞的戲劇集子，還譯介了「西塞羅文錄」，雖然全書只選譯了「論老年」和「論友誼」二篇，但也可以看出西塞羅思想的精華。此外白朗蒂的「咆哮山莊」和奧利哀特的「織工馬南傳」都是對中國讀者有裨益的讀物，可惜這些書現在都已成為不容易購得的絕版書了。

他自己也寫過小說，初期的創造月刊上還登載過他的短篇小說，其中有一篇「淒風苦雨」還是給許多小說選集選載過的。

他一九三一年離開暨大轉往青島大學任教。抗戰時，他入蜀。一九三七年冬，他到廣州，在石牌中山大學任教，曾寫律詩一首，當時一位朋友還給我鈔了寄來，詩云：

歲暮猶爲客， 荒齋舉目非，
炊煙圓室起， 燭影一門微；
蠻語穿塵壁， 蚊雷繞翠幃，
干戈何日罷， 攜手醉言歸？

細玩詞句，無異實地寫生，別饒風趣，所描寫者實亦是在逃難環境中也。

近從雜誌中，纔知道梁實秋先生發表了不少莎士比亞戲劇的翻譯，料想梁先生雖已屆垂老之年，才華如昔，雄心亦如昔耳！

梁遇春與散文

在暨南的許多教授當中，有不少年事很輕的教授，他們並不因為名氣的關係被聘作教授，而是為了他們學有專長的原故。梁遇春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據我所知，他那時是西洋文學系主講英國散文的教授，年紀也不過是二十四五歲左右，是北京大學西洋文學系出身的，還未出過洋，鍍過金，但是同學們對他卻另眼相看，特別尊敬。他的確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學有專長的教授。他擔任的英國散文，講起來，實在使同學們五體投地的佩服。我聽過他一年的功課，印象也非常深刻，尤其是他那副形容，和他口中的培根與藍姆兄妹的文章風格，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今日，還念念不忘。

他在暨南當教授的時節，好像還未曾結婚，瘦瘦的個子，方方的臉孔，鼻梁上雖然架着一副並不時髦的近視眼鏡，但卻不能增加他多少的老氣，他終年總是穿得很整齊，一襲紫灰色的西裝，黑領帶，頭髮老是梳得光溜溜的，看起來倒有一點斯斯文文的恂恂儒者的氣派，假如是春冬之季，他在這套紫灰色的西裝的外面，便加上一套紫灰色的大氅，戴上一頂濶邊的灰黃色的氈帽，兩隻手老是分插進大氅的袋子裏。平時他和我們談話，不但不插進一二句英語，也不用一二個英文單字去形容甚麼，總是那一口漂亮的京片子。從他的口音上，我們很不容易猜出他是福州人。大概是因為在北京住得久了，所以他那一口漂亮的京片子說得和北京人說的差不多，他的英文也說得非常漂亮，當他在授課時說的英語，你也一點聽不出他的口音帶有中國腔調。你會以為他一定是在牛津或劍橋住過相當時日，所以纔會說得那麼一口標準的英語，我們就最愛聽他說英語；老實說，我們上他的

課，就爲了他那一口悅耳的「標準英語」。但是他却没有出過國門，吃過牛油麵包，起初我們完全不相信他不是留學生，後來有一次我們在課室裏問起他，他老老實實地告訴我們。他雖然不是英國留學生，但他講起培根那種充滿了智慧的簡潔而辛辣的文體，倒使我們佩服不置。年青小夥子，總是雄心勃勃，不知天高地厚，以爲培根的文章實在也沒有甚麼了不起，讀不上幾遍，提起筆來就譯，等到聽了他的課之後，纔知道培根的散文，在中國之所以還沒有人敢輕易動筆介紹，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事；因爲培根散文的神髓根本就不容易表達出來，他起初選一篇培根的「結婚與獨身」的散文給我們作教材。我們素來知道培根這個老傢伙是不可輕侮的，等到我們重讀了培根的散文，纔知道此公學力淵博，來頭不小，決不是光讀了幾部洋書便可了解的。以梁先生的才力和學力，他研究散文所下的功夫，他實在可以介紹培根的。但綜其一生，他始終沒有譯過一篇培根的散文！

他後來還給我們講藍姆兄弟，講現代的英國散文作家，如數家珍，我們雖然聽了他一年的功課，但對於英國散文的大概情形，總不致一無所知了。

他在暨南的那幾年，是跟葉公超，梁實秋，沈從文，蒯淑平，羅隆基，潘光旦這些人攪在一起，他的文章多在新月月刊上發表，所以同學們當中以爲他是「新月派」，其實，他是無所謂的，他也不屬於任何一「派」，他的文章雖然在「新月月刊」發表的最多，但在「北新月刊」和「語絲」上發表的也不少，他那兩部被讀者視如拱璧的散文集子「春醪集」和「笑與淚」，就是分別在北新書局和開明書店出版的，此外他還有不少的中英對照的集子，如在北新書局出版的自修英文叢刊之一的「小品文選」，內收二十位作家的散文代表

作，和那一套袖珍本的英漢對照的英文小叢書之一的 William Hale White(1831-1913)的「厄斯忒哀史」，和他在開明書店的英文叢刊之一的「英國現代小品選」等都是，他所搜羅的都是近代寫出極恬靜清麗的散文名家。就是他自己寫的散文，也足以媲美英國現代任何一個散文作家。我記得他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寫的，在第五卷第三十五期「語絲」上發表的「途中」一文，其中有一段雖然經過幾許的星移物換，歲月的遞嬗，到今天讀起來，還覺得餘味無窮。其中有一段文章說：

「我們從搖籃到墳墓也不過是一條道路，當我們正寢以前，我們可以說是老在途中，途中自然有許多的苦辛，然而四圍的風光和同路的旅人都是極有趣的，值得我們跋涉這程路來細細地鑒賞。除開這條悠長的道路外，我們並沒有別的目的地，走完了這段征程，我們也走出了這個世界，重回到起點的地方了。科學家說我們就歸於毀滅了，再也不能重走上這段路途，主張靈魂不滅的人們以為來日方長，這段路我們還能夠一再重走了幾千遍。將來的事，誰去管它，也許這條路有一天也歸於毀滅。我們還是今天有路今天走罷，最要緊的是不要閉着眼睛，草草一生，始終沒有看到了世界。」

他的那種清新的文筆，他的那種創造的主要情調，不是悲哀，是一種默默的惆悵。他並不讚頌人生，也不咒詛人生，只是懷着淒然的心境來視察人生，描寫人生，比之于 William Hale White 的散文並無遜色。許多人都稱讚梁遇春先生是一個天才，所可惜的，天才往往就不免有短壽的命運，像他那樣的一個天才，為了一場猩紅熱症，而竟致結束了他的生命，他去世的那年，恰巧是二十七歲的年華！如果

老天有情，假以時日的話，今年恐怕還未滿五十歲，我敢相信他的散文，一定有更大更輝煌的成就。

記得前幾年，香港方面有人登報徵求梁遇春先生的遺文。預備給他編一個全集，可是結果這事竟成了泡影，大概他的文章遺留在人世間的並不多，據說他的遺文，有不少還是未完篇的殘稿，但是，好文章遺留在世間永垂不朽的，畢竟是不多的，所以他的全集的不能完成，諒梁遇春先生在九泉之下，也不致有甚麼遺憾的吧。

汪靜之與「蕙的風」

現在年紀四十歲以上的，喜歡涉獵文藝書籍的人，我相信沒有幾個不知道「蕙的風」這一部「五四」初期的新詩集的，當然也沒有幾個人不知道叫人「放情地唱呵」的詩人汪靜之其人的。汪靜之成名很早，據說寫「蕙的風」時，還是杭州一師的學生。他到暨南大學教書的時候，年紀大約還未到而立之年，我之所以會認識他，也就是當年在暨大讀書的原故。他圓圓的胖臉，矮矮的身材，一頭從來就沒有膏沐過梳理過的亂髮，簡直就活像一個鳥窠。一年四季老是穿一套玄色的長衫，要是他不唱詩，誰也不會知道他是個詩人。暨南師友，識與不識都戲稱他「汪詩人」。他性情很好，可是他搗起蛋來，闖的禍也非同小可，我們那位「江村小閣」的「人豪」鄭韶覺校長，居然也曾給他抬過槓，險些還給他拆了台。

汪詩人平日上課，雖然教的是國文，但他總喜歡教學生唱詩，尤其喜歡唱他自己寫的詩。他雖然發給學生的講義是他自己編的「詩歌原理」。但却教學生人手一冊他的詩集。講「詩歌原理」的時候，一舉例，就翻開「寂寞的國」放聲

大唱一通。大概這就是他所謂「放情的唱阿」的時候。有一次，在課室裏，有個同學問他：「蕙的風」這書名的意義是怎樣來的？他就坦然地說，「蕙就是我從前追求的理想的愛人，我這部詩集就是爲了她而寫的，我寫好了，書出版了，送了給她，誰知她正眼也不瞧一瞧，她嫌我窮，後來嫁給一個官僚去了，女人就是這麼樣愚蠢的。」

一個惡作劇的同學便問他目前的太太是不是失戀後纔追上的？他就滔滔不絕地說：「我現在的太太是和『蕙的風』的女主角同學，那時她們同在杭州第一女師讀書。她嫁了人，我失戀了，傷心了一個時期，纔追起我目前的太太來的。我追求她時，曾有過一天寫過十一封信，平信，快信，掛號信全有，但都給她學校裏的校長扣留了，並且還請她去談話，她竟很乾脆地說，『沒有甚麼話可談的，還我的信好了。』由此可見我的太太是懂得戀愛的，現在的女學生那裏懂得談情說愛？」接着便是對女人來一通笑罵，挖苦得那些女同學也覺得有一點熱辣辣的，於是有一個女同學陡的站起來說，「汪先生，你不能老是罵女人！」他却笑嘻嘻地說，「如果我說的是謊話，我相信你一定不會替女人辯護的！」

過了不久，暨南鬧經濟恐慌，教育部發下來的經費不足，於是實行減薪節約。可是這樣一來，教務處的佈告板上，每星期總有一二次看到汪詩人請假的通告，後來同學問他，爲甚麼時常要請假，你想他怎樣說？他在課堂裏竟大發牢騷說，「教書的生活很苦，每星期要上十七節課，又要改許多裹脚布一樣長的作文，簡直苦得不得了，而薪水又那麼少，我上有父母要侍奉，下有妻孥要贍養。施存統當年在杭州提倡非孝運動，我還是其中的一個中堅份子，可是我現在每個月還要給家裏的老頭子寄八十多塊錢養老。想不教書，

改做小說，但是版稅至少要在半年之後，半年的生活又無從設法，不是小資產階級決不能作出多少作品，現在學校的薪水打八折，我教書也只好打八折，餘下的二折，我要寫文章賣錢的，不然我的生活也很成問題哩。」

牢騷發完了，預備開始講他的「詩歌原理」的時候，一個同學站起來說：

「汪先生，你最近不寫詩了麼？」

「寫詩的靈感完全給趕跑了，現在不得不要多寫一點小說了。」他說，「我最近一連寫了兩篇小說，寫得好極了，發表出來以後，你們一定要仔細看看。」

「叫甚麼題目的？」同學這麼問。

「一篇叫做『人肉』，是寫太平天國時代長毛造反鬧饑荒而吃人肉的故事，這個故事很有刺激性，這篇小說，我自己覺得不會比左拉寫的小說遜色。」他說，「這篇小說大概下個月便會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還有一篇叫做『北老兒』，最近的大江月刊也要發表出來了。內容我不好說的，還是你們自己去欣賞好。」

後來「人肉」和「北老兒」果然先後發表出來了。原來「北老兒」是描寫當年中國北方軍閥的部隊給北伐軍擊潰了，其中有一個散兵逃竄到一個農家去，看到一個年青的少婦，他把她污辱了，臨走的時候，還在桌上拋下了一枚兩角錢的銀幣，給她作代價，那個被污辱的農婦聽到銀錢的聲音，趕忙起身拾起那隻角子，放到嘴裏去咬了一咬，發現是一枚膺幣，立刻趕出門外去，要跟那個潰兵掉換，可是那個「北老兒」早已揚長地走了。故事的情節，就是這麼簡單，只是對於人性的醜惡和心理的複雜，却刻劃得很深刻，我二十多年前讀過，直到現在還沒有忘記。

可是他自從發表了這兩篇小說以後，他也就成了同學們在茶餘飯後的笑談的資料。不是說他寫得尖酸刻薄，就是說他寫得生動。他原是住在教員宿舍裏的，他的房門上老是貼着一張寫着「訪客留言」的白紙，預備給到訪的人客留言的。有一天，我去看望他，他剛巧外出，本想給他留言，可是猛然地看到門上貼着的那張白紙寫着：

「汪詩人大鑒：

『人肉』幾毛洋鈔一斤？

『北老兒』留言」

有一次，他看完了徐霞村譯的左拉的短篇小說集「洗澡」，高興得了不得，寫了一張便條找我和另一個從安南回來的同學去談話，一見面，他就對我們說，左拉的小說，好得不得了，他的「娜娜」現在還沒有人譯出，希望那位精通法文的安南同學，念左拉原文，我用英譯本校勘，他寫中文，書譯成後，賣給商務印書館，所獲利益均分，不過這種法子譯書，完全是走的林琴南的老路子。我對他表示異議，說是這條路子是走不通的，但他並不以為然，他馬上要我和那個安南同學給他分別開出書名，他立刻就到上海去採購。可是當天晚上，他從上海回到真茹，我跑去看他買回來的新書，他告訴我，兩種版本的「娜娜」都買到了，只是到了北火車站忙着買車票，竟連書也忘掉在黃包車上！回到暨大給我問起，纔恍然今天他到上海去原來是去買「娜娜」的。

第二天他就又再去把書買回來，開始工作的時候，他從書架上取出兩本長形的小拍子簿給我們。原來這些奇形怪樣的拍子簿都是從那些著作人送給他的出版物切下來的天地頭，當作廢物利用。一本新詩集，他可以橫切成三本，上下兩本都是白紙，中間的一本纔是詩文，他的書架上的藏書，

全是這種像放印子錢老板的賬簿，也就無怪其然了。

他雖然是這麼講實際，可是這部「娜娜」只譯了十來頁，那個精通法文的安南同學因丁憂回到西貢去了。這部書以後自然就沒有人再繼續和他合譯下去了。

記得是一九二九年間，章衣萍出版了一部「枕上隨筆」，裏面有：「懶人的春天哪！我連女人的屁股都懶得去摸了！」這樣的妙句，讀者都罵章衣萍缺德，罵他是「摸屁股詩人」，罵得他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罵得他有冤無處伸訴。原來正是汪靜之沒有收進詩集的作品，章衣萍看見了，覺得有趣，把它錄進「枕上隨筆」內，誰知竟招惹了這無妄之災！

汪詩人離開暨南之後，聽說曾一度到安慶去教書，後來又聽到說他到過武漢，後又聽說他到汕頭去，可見他運途多舛，後來我也南行，這位風趣人物也就一直沒有再看見了，屈指算來，大概總有廿多年了，而今我已經兒女成行，他也應該到了垂老之年了吧！對於「肥奶」和「大腿」大概總不像往昔那麼興趣盎然地寫詩歌詠了吧？

馮三昧講小品文

在暨南當教授的不容易，是遐邇皆知的事，尤其是當國文教師，最是吃力不討好；夏丏尊先生，在暨南就是一個感到無能為力的教授。他當時撰的一副很有名的對聯：「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貧無奈做先生」也是當時有感而發的牢騷。其他如小說家彭家煌輩，更無論矣。至於使同學們心悅誠服的，如馮三昧，曹蝸廬，曹禮吾，李冰若等幾位教授都是。

在暨南教國文，完全新的不行，完全舊的也不行；既要懂得國學，也要懂得新文藝。兩樣皆能，拙於口才，也還是

不免有『命苦不如趁早死』之嘆！詩詞歌賦，四六駢體，新詩，小說，戲曲，簡直十八般武藝，樣樣皆能，纔能站得牢，教得下去。馮三昧先生的國文，我上了一年課，却覺得受益無窮，我今天之所以能搖搖筆桿，也未始不是三昧師之所賜。我原先聽了蝸廬先生二年的國學，纔改選三昧師的功課，我的一點點淺薄的國學常識，也是那時纔開了眼界，曹師對於國學，而採用科學的方法去整理，的確是有他的一手的，後來聽了三昧師的國文，纔知道新文學也並不是輕易能下筆的東西，並不能呼之來則來的東西。

三昧師那一張瘦臉上薄薄的有點小麻子，驟然看起來，是不大看得出的。他本來是上海大學的教授，上大被孫傳芳所封，他纔改任復旦大學的教授，他之到暨南，完全是我們向學校當局去強硬要求得來的。他來暨南上課，老是戴着那頂潤邊舊毡帽，襯着玄色的長衫，黑皮鞋，一個公文袋却時常裝滿了參攷用書和講義。他教書的態度老是那麼安詳，那麼平心靜氣，他滔滔不絕的講授，他的講義的取材却相當廣博，小泉八雲，厨川白村，和本間久雄等人的作品裏的精華，他引用了不少。這部講義，後來他在大江書舖出版了，改名爲「小品文講話」；大江書舖關了門，就又改由開明書店再版出書，這部作品現在坊間恐怕已不易找到了。

三昧師第一天來上課，便以「幸福的家庭」命題要我們每個同學繳交習作一篇，體裁不拘，他說這樣可供他作編寫教材的準繩和參攷。記得當時我曾寫了一篇五千多字的短篇小說，內容却採自和我同寢室的那位同學的故事，說是他結了婚，不放心妻子留在家裏，結果也把她帶到大學來作旁聽生，誰知這位妻子一到了大學上課，却結識了不少大學生，眼界大開，居然喜歡過着社交生活，常常背着丈夫邀了約同

級的同學，一道去看電影咯，吃大菜咯，聊天咯，結果，風聲所播，也就傳送到丈夫的耳朵裏，做丈夫的人，每於課後，便私自跑到妻子上課的課室外的窗下去伺伏，暗地裏偵查妻子的行動。有一天，妻子下課到我們的宿舍來看他，他想發作，但卻缺乏勇氣，只是說他聞到妻子身上有異味，那是男子的氣味。可是妻子却無動於衷，態度如常，而那位丈夫却每天都在痛苦中過着說不出的痛苦的日子。故事就這樣結束，習作送了給三昧師，過了幾天，三昧師却特別約我課後到校前的一間僻靜的小餐室去喝茶；我當下有點耿耿於懷，不知自己到底撞了甚麼禍，恨不得立刻分曉到底有甚麼禍事臨頭。我好不容易等到上完幾節功課，趕忙三腳兩步跑到那家小餐室，誰知三昧師却已先我而等在那裏了。我懷着不安的心情會晤他。坐了老半天，三昧師纔從容地從公文袋裏取出一篇毛筆寫的原稿遞給我，說：「這篇文章是復旦大學教授謝六逸先生翻譯的手稿，還未曾發表過，你不妨拿去抄出看看的。」

我接過來，纔知道原來是一篇叫做「嗅妻房的男子」的日本作家的小品。

「你且拿回去先抄出來，和你自己所寫的那篇『幸福的家庭』參看一下，看看有甚麼異同的地方。」他很誠懇的說：「你如果看出來了，那麼你把它寫一篇詳細的報告交給我，你的構思是不錯的，取材也不錯，只是不夠簡潔，祇消二千多字，就足夠表現了出來的東西，你却用了五千多字，在文字上是一種浪費，你還得多多注意莫泊桑和柴可夫的作品，不要濫寫，一定要寫得簡潔，老練，用兩句話纔能寫出的東西，想法子用一句話表達出來！不要拖泥帶水，取材更應注意，從平凡中看出不平凡來，不要把許許多多的材料寫在一

篇小說裏，要表現一個人物，或單獨寫一個故事；不要把幾個故事寫成一篇小說，注意寫素描。素描寫多了，然後寫小品，然後進而寫小說。不要貪多貪快，寫作是沒有捷徑可走的！」

我當下聽了他的一篇洋洋大道理，真覺得未之前聞。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心裏却感到非常愉快。因為，我遇到了一位良師，他指示了我寫作的正確的途徑。

後來我把那篇「嗅妻房的男子」抄出來了，做了報告便把原稿和報告送給他。

「怎麼樣？」他說，「你的取材和『嗅妻房的男子』很相似，主題也一樣，你那篇作品可以作廢了的，不然就重新再寫過，怎麼樣？」他說。

「我覺得很奇怪，我下筆之前，並不知道有這麼的一篇作品，」我說。

「那是巧合」，他說，「既然發現了自己的作品，與人家的作品有巧合之處，那麼作品大可以作廢了的，寫作要言人所未言纔能夠代表你自己，以後，你至少要先讀完了一二百本外國小說纔動筆，那末你就會知道你自己所要說的東西，有沒有人說過了，應該怎樣着眼於人家所未知的東西了，要從事寫作，絕對不能貪懶的！」他娓娓地談着，我屏息着在靜聽。

接着他還講了一個故事，說是日本有一位青年作家，寫了一本十多萬字的自以為好得不得了劇本，送給日本戲劇家菊池寬去過目。過了幾天，那個青年作家便如期再去看菊池寬，想聽聽他對他的劇本的意見。誰知菊池寬却坦然對他說，「你這部劇本雖然寫了十多萬字，可是其中只有『拿茶來！』像一句台詞！」他給我講了這故事，當然是有感而發

的，他希望我不要像上海灘上那些作家那樣把一些沒有智識的人物的口語寫成了出口成章的教授的口語，那是最要不得的錯誤。

他在課室裏教我們欣賞新詩，他說應該從小詩入手，尤其是日本的俳句，他自己也常常寫小詩。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寫了幾首小詩給我們作例子，現在我還記得其中的一首是這樣的：

「對女學生講詩經，鬍子纔是最需要的東西啊！」

因為這首小詩，使我領悟到新詩三昧。就在那時候，我讀了許許多多的詩集。有一天，他告訴我已故詩人白采的詩，纔是詩人的詩。可惜我却没有讀過他的詩集，他的詩集也已絕版久了。第二天，三昧師把他珍藏的白采送給他的一本詩集「羸疾者的愛」轉送了給我作紀念，使我感到非常不安。

後來他和陳望道先生創辦大江書舖，還刊行了「大江月刊」，他在這雜誌上用筆名發表了不少的詩文。三昧師是講究書籍裝幀的。他主持下的大江書舖的書籍，差不多都是由他自己設計親手繪製的；我的一本在大江出版的中篇小說「某少男」的封面也是由他繪的，謝六逸譯的那篇小品「嗅妻房的男子」，後來也收集成為「日本近代小品文選」，在大江出版。他自己那部經過十多次訂正的講義，「小品文講話」也是他自己繪的封面，大江的書籍是別具風格的，可惜大江書舖開辦不久，出了一大批的書，也就蝕了本，關了門，以後的書籍也有一部分轉讓給開明書店出版。

我南行前夕，三昧師只對我說了句「希望我不要放棄寫作」。「一二八」之役發生後，我重返春申去看戰跡，到大江書舖去看他，竟悵然不遇。過後幾次去看望他也沒有見到，真使人覺得人與人之間的「緣」，實不易得，想起來實在可

嘆！

聽說三昧師於抗戰勝利後的翌年，已歸道山。記得三昧師在暨南的當年，對我和彭成慧兄，趙伯順兄接觸也較多，因此頗引起了不少同學的閒言。有些同學居然嘲笑我們是三昧師的得意門生；而我和成慧兄的訂交，也是由於三昧師的關係，伯順兄和我雖有同級之誼，但為時甚暫，他後來竟因失戀而臥鐵軌自殺，埋骨於暨南校園，留下了一抔黃土，徒供憑弔而已。成慧兄現在香港獨樹一幟，經營餐館，自成一家。我呢，還是那麼不長進！三十多年來，故我依然！說起來實在有負三昧師平日的諄諄的教誨哩！

周谷城教英文

周谷城先生是以著「中國通史」而著名的，是口才很好的一個教授，可是據識者所說，他的史學並不高明，他這部著作不但比不上錢穆，而且連呂思勉也比不上。說他只有史壳而無史識。他在暨南那幾年，起初教的是英文，後來纔改教「人生哲學」，等到李石岑先生接講時，他便重作馮婦，再教英文。

當他初在暨南教英文時，我並不曾選修他的功課，他怎樣教英文，我自然不知道，只是他教「人生哲學」時，我聽過他的課，他教得還不算壞，也還叫座。同學對他的印象也不錯，半途抽籤退堂的同學却一個也沒有。在暨南教書是最艱苦的一件事，不要說那些虛有其表的教授站不牢，即使是學有專長的名教授往往也會吃癩的。如果在暨南能夠教得下去的教授，那真是非有緊打緊紮的真功夫不可。周谷城先生之所以不會在暨南以史學見稱，也未始沒有相當的道理。不過他的口才的確是很好的。

我記得他初到我們班上來上課時，穿的是西裝，却没有打領帶，雖然還是春寒抖峭的初春天氣，可是他老沒有穿上外衣，只是把外衣掛在手臂上，上身只罩上了一件羊毛冷背心。這樣的裝扮，一直到初夏來臨，纔從此不再穿西裝，而改穿白夏布長衫，戴着一頂舊式草帽，搖着芭蕉扇來上課。他瘦削的臉龐上。配上了一副白金絲眼鏡，顯得相當莊重，驟然看來，倒有點跟銀幕上飾美國總統威爾遜的那一位演員神氣相似。他上課講授，從不站在講壇上，却喜歡半邊屁股坐在講案上滔滔不絕的講授。他從來就不發講義，黑板也往往成了無用武之地，他似乎不大願意寫黑板，往往需要寫出來的東西，他也只是用嘴說出來，由我們自己筆記。課本是採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那本「人生哲學」。在學期考試時，他舉行出題筆試的那些題目並不怎樣艱深，祇消聽他講書，不必再下甚麼功夫便可以對答得完全的了，大概是這樣的原因吧，他也就很得同學們的歡心。

我記得有一次，功課講完了，大家閒着無事，他就跟我們聊天，他說 he 自己是北京師範大學英文系出身的，也沒有留過學，可是他却當過好幾家大學的英文教授。言外之意，頗有顧盼自豪的神氣。那一天早上，剛巧報上刊載了張作霖在皇姑屯遇炸斃命的新聞，同學便問他對這事件的看法，他却對我們說：「對不起得很！我生平是最討厭看報紙的！」說得我們大家默然無語。可是第二天他來上課時，却在脅下夾了一份申報。

俏皮的同學便毫不客氣地問他，「周先生，你昨天不是說最討厭看報的麼？今天開始，大概不討厭看報了吧？」

我們當下聽了那個俏皮的同學不遜的話，真有點替他扼腕，但是他却慢條斯理地說：「唔，是的，我現在還是最討

厭看報紙的！」

「周先生，你脅下的那份申報不是報紙麼？」那個俏皮同學一點也不示弱地說。

「哦，原來如此！我老實跟你說，我還是最討厭看報紙的，這份申報是今天早上出版的，因為上面有我的新書出版的廣告吧了。」

原來他在作自我宣傳，自我陶醉。

「周先生，你的甚麼新書出版了呢？」一個同學插嘴說。

「哪，就是那本『到文化之路』。」他說着隨即把申報打開了，指着那幅書店廣告說。

「不，不是我自己的作品，是一個美國學者的著作，是值得看一看的，因為很值得看，所以我也就譯出來了。」他坦然地說，「你們不妨買一本看看的，我自信譯得還不錯，你們讀過了一定會相信我的話。」

「甚麼書店出版的？」那個同學還嚙哩嚙嚙問個沒有完。

「是北四川路新宇宙書店出版的，便宜得很，定價纔五角大洋！」他又不憚煩地說。

第二次上課的時候，他還是夾一份申報慢條斯理地踱進教室裏來，可是我們同學當中，誰也沒有再向他提起有關時事的問題了。

暑假快要到了，他來上課的時候，就問我們願不願意選讀夏令班？我們華僑同學大多數有家歸未得，因此大家都表示願意選讀夏令班，後來夏令班開課，纔知道江浙同學回家去渡假，有些華僑同學也避暑去了，就只剩下了我們這些有家歸不得，而且又沒有閒錢去避暑的窮同學上課。因此人數也

寥寥的只有二十多名。名義上雖然說是上課，其實，一則因爲天氣酷熱，大家上課也似乎不大起勁，二則夏令班有點像補習性質，講授的功課並不多，因此我們上課也就常常聽他談天說地地胡扯。就在這個時期，同學當中對於求知慾感到不滿足的也漸漸對學校有了嘖嘖的煩言，他就對我們說，假如有那一位同學希望轉學到北京師大的，他可以負責介紹。這句話一出，居然有二個時常跟他抬槓的天真的同學應聲而出，一心一意想轉學到北京師大去。就在這個假期完畢後。那二位轉學北京師大的同學也上了北平，可是却進不了學，以後也就沒有了下文。

後來我把這事告訴他，說那兩個同學轉不進北京師大，很覺惋惜。他却出我意料地說：「我早就知道他們進不了北京師大的。北京師大的校長跟我並不認識，我離開北京師大時就不是現任的校長！」

「爲甚麼你要給他們寫甚麼介紹信呢？」我天真地說。

他笑笑地說，「我怎麼好得罪人呢？」我也只好苦笑。

在暨南就有不少人說周谷城先生是個圓滑的人，也該算是最聰明的角色，可是却時常做了最愚蠢的事。甚至連那位倫敦大學文學博士的副校長，他的親戚洪達先生也說他太圓滑了，這還有甚麼可說的？

後來鄭洪年校長離開暨南時，據說他也隨之而去，可是不久却以「中國通史」一書而獲知于世了。

李石岑談人生哲學

二十多年前，我負笈上海暨大，適值鄭洪年先生長校暨南，碩學通儒，雲集眞茹，盛極一時。譬如黃季剛李石岑輩，都是在學術界有着崇高地位的名教授。黃季剛先生講國

學，李石岑先生講「人生哲學」，此外還有一位講「哲學概論」的黃健中教授，也是一個知名之士，他原來是黃季剛先生的學生，同學選修的也不少，不過不及李石岑先生那麼叫座，那麼吃香，一個大教室擠得滿滿吧了。

黃季剛先生的「說文」和李石岑先生的「人生哲學」在課程表上是同一時間上課的，選讀「說文」就不能選修「人生哲學」，甚至連旁聽也不可能。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得兼，我也就只好退而求其次，捨魚取熊掌，選修了李石岑先生的「人生哲學」。

初見李石岑先生，有點覺得出乎想象之外，他的身材並不魁梧，尤其是那一臉的斑蝕，紅白相間，斑駁有致，看起來簡直像地圖。同學中口德不修的，居然在背地裏起給他一個「地球牌」的渾名。李先生原是精研哲學的人，對人生問題大概有過很透澈的了解，因此便有許多獨特的見解。對人生的看法，總是很隨便，他爲人有風趣，懂幽默，他明知頑皮同學叫他「地球牌」而不動氣，也不忌諱自己貌寢。他的口才很好，每次上課，總是座無虛席，同學們爭先恐後地預先趕到教室去佔座位，人人唯恐落後向隅。每每下課後，男女同學們便一窩蜂似地圍住他，問東問西，沒有一個完。原來是一節課的，往往也會耽擱到兩節課的時間。他第一次來上課所發下的講義，是一份參攷書目，盡是中外哲學名著，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少說也有百多部。其中所選只有一部是他自己的著述。他的演講集和論文集都不在內。他教我們選購或向圖書館借閱都可以，不過須以一年爲期分別研讀完畢。他說這一百多部哲學名著流覽過的話，對於哲學，纔算入了門。其實他後來陸續發下的講義，就是後來他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那部鉅著「人生哲學」的初稿。他講書很快，並不按

照講義，又有條理，又有程序，侃侃而談，如長江大水，滔滔不絕，引人入勝，大家都集中精神屏息靜聽。事後我讀了那些哲學名著之後，纔恍然李石岑先生在課室裏已把那些名著的精華全給我們解釋清楚了。

有一次，課後無事，我和一位同學到他的寓所去看望他。傾談之下，他便提到男女之大欲上去，他問我們有沒有愛人？那時我不過是個十八九歲的青年，經他一問，反而覺得有點赧然臉紅起來。可是他對我們指着他自己的臉孔說：「你們瞧，我生得那麼醜，還要跟女人談情說愛，而你們還怕甚麼？跟女人談情說愛，不一定要有潘安之貌，用不着膽怯，用不着害羞的。」

我當時對女人的看法，總覺得是神聖不可冒瀆的，所以連女同學，也不大理睬。當時有許多女同學還笑罵我自視甚高，目空一切。其實我對女人都有點像敬神鬼而遠之的觀念。可是李先生則不然，他說：「你不要把女人看得太神聖，女人是人，你也是人，男人與女人，只要朝夕相聚，總不能不生感情的！」

「李先生，追求女人可有甚麼秘訣麼？」和我同去的同學說。

「那裏有甚麼秘訣不秘訣，只要你懂得運用『體貼溫存』四個字吧了。女人所需要的，就是這四個字的功夫！」他若無其事地說，「只要你對她處處關心，處處體貼，便無往而不利了。」

「如果碰到那些眼高於天的女人，這四個字也未必有效吧？」我說。

「你瞧我，老實說，我這副『地球牌』面孔，照理女人看見了大概總不會喜歡的。其實不然，我不瞞你們說，我現

在還有很多的情人呢！我無非善於在『體貼溫存』上用功夫吧了。無論怎樣傲氣凌人的女人，只要我跟她談上一兩個鐘頭，包管她會喜歡我的！」

他就是一個這麼有風趣，有幽默感的人，他的話一點不吹牛。他和我們談天，沒有師生界限，沒有嚴肅氣氛，妙語橫生，趣味盎然，和他接近，如坐春風中！

李石岑先生是那麼富於感情，為人又那麼牢落不羈，風度翩翩，所以到處留情，到處留有風流韻事。他最喜歡談戀愛問題，對生活既不拘形迹，也不檢點，因為多情，結果還是不免為情所累，惹了不少麻煩。他在大夏大學兼課的時候，就搞出了一樁桃色案件，鬧得滿城風雨。原來他跟一個情人叫童曼恬的女詩人發生了關係，有了身孕，後來不知怎的鬧到感情破裂。這位童小姐原來是著名學者楊東蓴楊人樸昆仲的親戚，因為看不過纔毅然為她出面鬧了很大的官司，終於賠償了三千元的生活費纔脫離了關係。那時他的經濟情形並不寬裕，為了這一場官司，平添了一身債，他後來竟迫得日夜寫作，企圖增加收入，償清債務；這樣一來，也就弄得心身交瘁，終於一病不起。當時上海時事新報還用了全版篇幅，以「著作等身，萬世師表」八個大號字作大標題，刊載他逝世的經過，同時還披露了他幾封情意纏綿悱惻，洋洋灑灑的萬言情書，女人之所以那麼傾倒於他，究竟是為了甚麼呢？讀了他的情書，實不難體會出來！自古多情空餘恨，像這樣的一個一代學者，我雖然親炙未久，對於他的「人生哲學」，尚難窺堂奧，不過其風流餘韻，倒令人追懷不已。

像李石岑先生那樣的一位學者，平日師生間相處得如朋友那麼不拘形迹，與當年另一位不修邊幅，生性狂放的目無餘子的了不得的學者黃季剛先生，在暨南簡直成了很強烈的

對照。黃先生在暨南教「說文」，對中國的文字學講得非常精密，但在同學心目中這麼了不得的學者，其實也沒有甚麼；自然心得是更其談不到了。黃先生在暨南就有過不少膾炙人口的趣事。暨大教授人人都須佩掛一枚徽章，以資門警識別，獨黃先生不肯佩掛。他初到暨大上課，剛入校門，校警看到他胸前沒掛校徽，以為他是閒人白撞，便阻止他入內。他說：「我是黃侃，只有你不認識我！」門警却不通融，說，「你既是教授，應該有一枚校章的！」

他悻悻然地說：「我硬是不掛那種東西，你不給我進去，我就不進去！」說着掉頭便走，幸而給認識他的同學看見，關照校警，纔冰釋這一場誤會，可是黃教授自始至終在暨大是唯一不佩校章進出校門的教授。

有一次，黃健中先生從教室下課出來，碰見黃季剛先生，他一見便老氣橫秋劈頭便問：「你教甚麼？」

「哲學概論。」黃建中教授恭恭敬敬地說。

「你自己懂不懂？不要在教室裏向學生瞎吹！」季剛先生毫不客氣地說。

當時弄得黃健中先生十分尷尬，在學生面前幾乎下不了台。

他的三不故事，也最為有趣。有一次他對同學說，他有三個原因不來上課。一，生病不來，二，天氣不好不來，所謂天氣不好，是：下雨天，他不來，落雪天他又不來，天氣熱他也不來！三，便是不高興不來。他就是那麼狂放，可是他在我們狂放的同學的心目中，也不過像黃健中先生在他的心目中一樣。世事說起來，往往就是那麼令人哭笑不得的！

沈從文像小商人

一九二九年，中國文壇出現了一個多產小說作家，良友、新月、春潮、小說月報等雜誌都先後發表了他不少的作品，這個著名多產天才作家就是沈從文。那時他在吳淞中國公學當講師，後來又兼了暨大學院的幾點鐘功課，講授「中國小說史」。他雖然發表了不少的小說，陸續出版了好幾種小說集，但是，說來慚愧，我卻沒有注意到這個作家的作品，常常忽視了他的小說。記得那年夏天，學校放了暑假，我假期無事，天天躲在圖書館裏，饑不擇食地濫讀名家小說。有一次，我在暨大門前一家書店買到沈從文的短篇小說集「老實人」，一個同學見了對我說，「這個人的小說你怎好買來讀，他的小說句子和語法都很不易讀，你不相信，且讀讀看，看你讀不讀得下去？」爲了好奇，我索性把他所有的集子都全買了來，甚至連刊載着他的作品雜誌，都一一尋到買下了，預備一口氣把它有系統地讀完。因爲我當時聽了那位同學的批評，覺得毫無道理，一個編輯可能疏忽地登載了一篇文句不易讀的小說，難道所有刊載他的作品的雜誌編輯都一樣疏忽麼？可見這自然是那位同學的偏見了。可是當我第一次讀了他在小說月報發表的那篇「菜園」之後，我覺得我是喜歡這位作家的，對於自己以前的忽視他的作品，感到了很大的懊悔；於是一篇一篇地讀下去，愈讀愈愛，愈愛愈不忍釋手，非但我自己在狂讀着，還介紹同學讀，覺得不讀這種小說，真有點辜負作者！這一個暑假，我就消磨在閱讀小說上，尤其是大部份時間花在閱讀沈從文的小說上。

秋季開學以後，我選讀的課程也全選定了，後來纔聽得同學說，沈從文到我們的學校來當講師，他上課的課室，剛巧

就在我住的寢室前面那一間祇容廿多個同學的小教室。我住的那座宿舍，分上下兩層，一共有四十二間房子；樓下一排是二十一間房子，樓上一排也是二十一間房子，每排房子的前座則全是教室，樓上是五間大教室，一間小教室，樓下前座也是一樣。只是宿舍和教室中間隔了一條很寬濶的長廊。每間房子可供四名學生住宿，我住的那個房子很小，原來是二個服侍我們茶水和打掃的茶房住的。後來茶房因為在工作上感到不方便，便搬到樓下的一個小房子去。我却和一個同學住那間四十二號的小房子。我的房子對面，就是那一座小教室，供中國文學系的學生上課，那些同學多數穿藍布長衫上課，看起來簡直像一羣酸氣很重的秀才，跟西裝畢挺的或校服燙得發亮的西洋文學系同學，倒成了很強烈的對照。甚至連那些教授也是那樣的裝束。譬如那個有名的詞家龍沐勛、陸侃如、陳柱尊等都是在那個小教室進進出出的。

那時西洋文學系主任是葉公超，他當時叫葉崇智，公超是寫文章用的筆名，現在曉得葉崇智這個名字的人恐怕不多了。因此新月社的許多作家都在豐大當教授，如梁實秋、羅隆基、潘光旦、衛聚賢、梁遇春、和沈從文等都是。在文學教授和講師當中，我相信沈從文和已故的梁遇春最年輕。大概那時還未到而立之年，我當時很懊悔沒有選讀沈從文的「中國小說史」，但是因為近水樓台的原故，在沒有功課的時候，我便經常跑到對面的小教室去旁聽他的功課。

沈從文的「中國小說史」，每週只有兩節，我當時之所以要去旁聽，老實說，無非是為了讀了他的小說，想瞻仰其人的言論風采吧了。誰知一聽，竟認真地聽下去了。他的講義編寫得又非常精細，足與魯迅後來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媲美。聽了半年的課，講義居然積成了足足一大厚冊。

這本講義，可惜已燬於日軍南侵的炮火中了。

這位農村作家現在還在我的記憶中保留着的印像，便是他的樣子是那麼樸實，不肥不瘦的中等身材老是穿一件陰丹布長袍，或深藍嗶嘰長衫，西裝褲，黑皮鞋，提着一個大布包袱，匆匆地顯得很忙碌，看起來倒有點像收賬的小商人，或是出堂的理髮師，他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視眼鏡，兩隻大眼透露着深遠的智慧和怡然自得的光芒。當他和你說話時，白白的面孔上，不時地泛出安祥的微笑。那時他大約是二十八九歲的樣子。據他說，他在二十歲以前，曾投身軍旅，當過司書和屠宰稅的收稅員。二十歲時纔開始寫作，他的文章最初是在北京的晨報副刊和現代評論上發表的，雖然稿酬不豐，但他却發生了很濃厚的興趣。他說「這種新的希望使我有生氣。」

據他的妹妹沈岳萌的「沈從文——我的二哥」文中說：「我們姊妹一共有九個，我是最小的，二哥是第四。因為把姊妹除外，單算哥哥。二哥在第二。我們皆生長湖南邊境，一個約有三千人家的小城裏。那是一個野蠻的地方，山是高山，水是深水，草木都會螫人。一到了夜裏，狼就從城牆缺口處爬進來吃小豬，各處都可以遇到蜈蚣和蛇。地方是雍正時去開闢的，名鳳凰府，別名縝篁城，到民國以後，現在名鳳凰縣。因地方為前清屯戍之處，經營制度，所有居民，除少數紳士與江西賣布人以外，其他每戶皆有子弟入兵籍。」

沈從文的文章輕易不用「的」字，誠如蕭乾所說，這個「的」字照文法家說，是應該放在形容字下面，但文法是給守法不甚嚴謹的人預備的，那階段我們皆須經過，這個「的」字往往成為歐化文中句的致命傷，在流暢的行文中簡直像一粒粒攪在米飯裏的砂粒。破壞了文章的流暢。他的文字之所以

會那麼有光采富血肉，就是爬在那個上面。他的風格，行文那麼奇突，那麼詭譎，用語又是那麼高雅，那麼典麗。簡鍊處，表現了謹嚴；精密處，顯示出繁豐，像橄欖那樣耐人咀嚼，耐人尋味。

他曾與胡也頻、丁玲在上海創辦「紅黑出版部」，出版了幾種小書，創刊了「紅黑月刊」，可惜出不到三期，結果還是關了門。他的作品結集計有「鴨子」，「十四夜間」，「蜜柑」，「老實人」，「入伍後」，「不死日記」，「雨後」，「神巫之愛」，「一個天才的通信」，「石子船」，「旅店及其他」，「主婦集」，「阿黑小史」，「從文甲集」，「從文子集」，「記胡也頻」，「欽官日記」，「沈從文習作選」，「邊城」，「八駿圖」，「黑鳳集」，「記丁玲」，「春燈」，「湘西」，「湘行散記」，「月下小景」，「從文自傳」，「長河」，「阿金」，「昆明冬景」，「黑夜」，「新與舊」，以及和蕭乾合著的「廢郵存底」等八十多種。七七事變以前，他擔任北京大學教授，還替天津大公報編輯「文藝」副刊，因為他當時提出了文壇上的京派和海派問題，惹起了一場熱烈的筆戰，哄動一時。抗戰後，他自武漢輾轉而至昆明，由昆明而至重慶，致力於抗戰建國的文化工作。復員後，他重返北平，就又開始著作生活，但是作品寫得很少，這時期他只寫了「主婦」，「虹橋」，「芷江熊公館」，「憶北平」，「憶昆明」，「論現代詩」，「從現實學習」等篇。這些作品都未曾結集出版。他的作品充滿了自由思想，尤其是他那篇膾炙人口的「從現實學習」，後來所引起的是非，也是那麼膾炙人口！他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據他自己說無非是試疏理個人游離於楊墨以外種種，寫了一個小文章，用作對於一切陌生訪問和通訊寄托的責備與希望回

答。不過他這篇文章對於一個志在文藝的年青讀者，多少有點裨益，那是應毋庸議的事。

顧仲彝、洪深不教戲劇

我在暨南大學念書的時候，先後曾師事過三位英文教授，這三位教授都不是以英文名於時的老師，第一位是鍾作猷教授，是個詩人氣質很濃厚的人，他的上唇和鼻孔下面蓄着濃黑如墨的鬍鬚，他那時年紀還很輕，看起來似乎還未到而立之年。我們覺得那兩撇鞋刷也似的黑鬍子長在他的唇上，覺得很不相稱，也覺得很不順眼。有一次，他忽然把兩撇黑鬍子剃掉了，顯得年輕了許多。我們揶揄他，說他的鬍子早就應該剃掉了，幸而現在割了鬍子却没有棄袍，他却坦然地說，我們學校裏因為有許多女同學聽他的課，所以非長起鬍子顯不出老成。這一次，他之所以把鬍子剃掉了，因為他最近要到愛丁堡大學去繼續念書。他的功課將要交給顧仲彝先生接替了。我們當下聽了，覺得有點悵然。他教我們的英文，是採用牛津大學出版的那部「黃金庫」的詩選作課本的，幾乎天天讀詩，有時還選了一些小泉八雲在東京帝國大學關於詩歌方面的講義給我們作補充讀物；有時碰到他高興，還選譯了郁達夫的短篇小說「過去」與「薄奠」以及徐志摩的詩歌發給我們念，希望我們把它對照讀，看看有甚麼地方譯錯了的沒有。我今日之所以懂得欣賞一點英文詩歌，會讀幾篇英文小說，未始不是這位先生之所賜哩。可惜他教了我們一個學年英文竟到愛丁堡去了。

不過，他穿着西裝褲子，身上罩着玄色的長衫，裏面的白襯衫的領子却反到長衫的領子外的那種瀟灑的打扮，的確是很富詩意的，留給我們的印象也很深。據說他以後就一直

留在愛丁堡，林語堂編人間世的時候，他還有過幾篇文章迢迢地從愛丁堡寄回來發表。

第二個學年到來接替他的功課的，便是顧仲彝先生，顧先生是名噪一時的戲劇家，大家都知道，他會寫會譯，而且還會導演。他在暨南却不教戲劇，他教的却是必修科的英文，但他也不選戲劇教我們，他選蘭姆的伊利亞隨筆集和莎士比亞樂府作課本，却不選莎士比亞戲劇。在教室裏簡直談都不肯談一談戲劇。這頗使我們感到大大地納罕。雖則有時候他也選一些短篇小說給我們讀，可是那些小說都是舊得了不得的古董，譬如亨利詹姆士的「老四眼」咯，巴蕾的「丈夫的著作」咯之類，文章是有趣的，可是却不能滿足我們的求知慾，倒是他在課外對於我們的戲劇的指導，可以彌補了這個缺陷。暨南每年演戲的機會可真多，校慶要一連二三天演戲，雙十節也要演上二三天的戲，我記得我們都有機會粉墨登台大過戲癮，而每次演戲，總要麻煩顧先生，不是要他給我們選劇本，便是要他給我們導演，有時找不到適當的劇本，還要他傷腦筋，給我們編一個新劇本。有一次他剛巧教我們念完了梅利美那篇「馬杜法高」的短篇小說，我們覺得這篇小說的內容很好，而且也很富戲劇性，可惜就是沒有劇本可供上演，誰料他聽了我們的意見，竟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給我們編寫出來，那就是後來收在他的一本劇作集裏的「劉三爺」，這本劇本，在抗戰時期，還出了很大的風頭；有些人把他的台詞添改了一些與抗戰有關的意識，也就成了抗戰名劇，那齣戲就是「錶」。我相信有許多人看過了，也有許多人演過的，顧先生的為人很和易，我們從來沒有看見他生過氣，他教書的時候如此，他導演的時候也是如此，從來沒有責備過誰。雖然同學有時也會跟他抬槓。自然全校的戲劇的演出，

差不多全是由他導演的，他的勤勉實在使我們佩服，他很忙，教了書還要改課卷，要導演，還要編劇，他在暨南，就這樣產生了許多蜚聲劇壇的劇本。

一九三零年春天，他在沉寂的劇壇上掀起了復興的波瀾，給垂危的劇壇無異打了一支強心針，他選出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用上海戲劇協社的名義，和應雲衛先生聯合導演，搞得轟轟烈烈，在中國戲劇運動史上寫下新的一頁。

顧先生上課時，總是那麼一本正經，不苟言笑。但是他給我們排戲的時候，却常常談笑風生，前後判若兩人，老實說，在我個人來說，在排戲時獲益似較他上英文課時候為多。他的譯著不少，大都偏重於戲劇方面的為多，只有哈代的一部短篇小說集和法朗士的「樂園之花」兩部不是戲劇。此外據我所知的，他還用了一個顧德隆的名字為商務印書館譯過不少地理叢書，諸如緬甸一瞥，南美洲一瞥之類的著作。

我上了顧先生一年多的英文課，然後我便選了另一個教授的英文課。這位教授却是大名鼎鼎的戲劇家洪深先生。他生得肥頭胖耳，加以個子也是胖胖的，一副近視的粗邊玳瑁眼鏡加在鼻樑上，驟然看起來，真有點像孫科。他雖然是留美學戲劇的，但我從來沒有看過他穿西裝，老是棕赭色的長衫一襲。他的功課總是排在晚間七點開始！跟教人生哲學的李石岑教授一樣，我們每天晚上幾乎都要上夜課，不是上李石岑的「人生哲學」，就是上他的英文。

他每天上課和別的教授所不同的地方，便是上他的課的同學，總是非常踴躍，把科學館的大教室擠得滿滿的，但他仍然要逐一點了名纔講書。他教英文簡直像在演戲，聲音

的抑揚頓挫又彷彿是在舞台上念台詞，有動作，有表情，上他的課也最使人感到趣味盎然。

有一天晚上，他從上海跑到暨大來上課時，已經遲了卅分鐘了，他是從不遲到的，可是這天他却破例遲到了。他一上課，名也不點，便向我們道歉，說是他來遲了，因為他去南京路大光明戲院看了五點的一場電影，那場電影是羅克主演的「不怕死」。看到電影的內容，使他氣憤不過，來上課的時候，說氣還沒有平下來，他說完了，下課鐘也響了，第二天早上看報纔知道洪深那天是和鄭小秋同去大鬧大光明戲院的，當場慷慨激昂地演說一番，然後要觀眾向戲院當局交涉退票。這事件一連在報紙上熱鬧了半個多月。大光明戲院也鐵閘深鎖，直至風平浪靜之後，纔照常營業，洪深也就很得了上海市民的喝彩，大大出了一次風頭。

洪深雖然在美國哈佛大學讀戲劇，和美國著名劇作家奧尼爾同學。他時常對我們談戲劇，談奧尼爾，他的戲劇編寫得並不錯，他回國初期發表的那齣有名的「趙閻王」，雖然得到了不少佳評，可是後來竟給袁昌英在獨立評論上提出真憑實據說該劇脫胎自「瓊斯王」，予以無情的指謫，頗熱鬧了一陣。這場筆墨官司雖然鬧了不久，也就不了了之。他後來編的戲有幾齣很有名的如「五奎橋」「香稻米」和「包得行」等，因此有人也懷疑不是出自他的手筆。

他雖然是著名的戲劇家，暨大同學演戲也從不找他導演，我們的同學都覺得他的戲劇理論雖然很好，他教英文時口講指劃，手足並用，無異演戲。他也寫過一部談甚麼電影和戲劇表演法之類的著作，內容很不錯，但他自己的表演，却不見得高明。記得有一次暨大的致遠堂放映了一部中國影片，是他和楊耐梅主演的「愛情與黃金」，是當年上海明星公司

出品，其中有一個是他在公園裏向楊耐梅求婚的場面，楊耐梅坐在公園裏的長椅上的右端角上，他却坐在長椅的左端盡頭處，兩人中間的距離，足足有三四尺遠，那時候還是默片，銀幕上有字幕，看到他求婚的場面，同學們却哄堂大笑。

第二天，我們在課室裏談起表演術，我向洪深先生說，像他在影片內的樣子求婚，說起情話來不是要放大喉嚨麼？

他却很幽默地說「of course!」

「在實生活來說假如放大喉嚨來求婚，楊耐梅不是會被嚇走！」一個同學說。

「of course!」他說，「你說得非常對，我不否認。」

「洪教授，你的意思是說不合情理麼？」我說。

他還是一句「of course!」

我們都知道「of course!」這兩個英文字，是他的口頭禪，他幾乎沒有離過口。

「那麼，既不合情理，爲甚麼不演得合情理一點？」一個同學說。

「of course!」他坦然地說，「演戲是演戲，理論是理論！你們不能那麼認真看的！尤其是求婚！」

我們立刻哄堂大笑起來。

抗戰發生了，他幹戲劇工作也幹得特別起勁，他原本就是不甘寂寞的人，自然很積極；此外還在現代書局主編「光明」半月刊，彭成慧兄的一篇小說「請你把我的棺材抬回唐山去！」就是在「光明」上發表而露了崢嶸的頭角的。

後來，在抗戰的大後方的重慶，他還鬧了一次服毒自殺的事件，却又大大地轟動了一番，出了十足的風頭，他畢竟是個不甘寂寞的人。

不過，最感覺得費解的，便是暨南大學當局當年怎麼會讓這兩位名滿中國的戲劇家教英文，至於戲劇的課程，却由另一位在徐志摩的新月書店出版過一本「國劇論集」的余上沅教授擔任，我到現在還不明白。

張資平教地理

在暨南讀書的那幾年，我個人對於生活方面的享受是不滿足的，人家有錢去看海京伯的馬戲團，看郎德山技術團表演，一張二塊錢的票子還要說便宜的，在我則只有聽同學們談談觀感的份兒。同學們可以花一塊錢門票去四川路青年會聽甚麼博士的學術演講，而我却只有第二天看看報上發表演詞的福氣，我在暨大的那幾年的生活，是那麼刻苦，可是對於求知慾，不是自己吹牛，我是覺得還相當滿足的。當同學們花錢去青年會聽學術演講的時候，我却常常到課室去旁聽那些人家覺得是冷門的或是不發生興趣的功課。老實說，我當時實在覺得旁聽自己沒有選修的功課，是無異聽了一場不花錢的學術演講。那些主講的教授，何況又多是一些學有專長的通儒。我那時對於旁聽那些冷門的功課，實在感到有說不出的興趣，因為自己選修的課程，往往要花費精神去應付，彷彿是為了學分，為了考績而進修的，至于旁聽的功課，是用不着耽心考試，也無所謂學分，聽了也就算了。有沒有心得，也只有自己纔曉得分寸，在我旁聽的功課當中，有一門「地理」，使我直到今天還念念不忘。

那位講授地理的，正是地理學者周傳儒先生。我雖然沒有選修地理功課，但是我却足足旁聽了一年。我相信他是一定會覺得我這個學生，最會給他打麻煩，而我所向他提出的問題也最多，一直到這一門功課結束了，他纔發現我原來是旁

聽生而感到惋惜。我相信他對我的印象一定相當深刻，祇是他對我的惋惜的表情，一直到今天，我還依稀在眼前。

他講授地理實在是別開生面的，他每次上課，沒有發講義，也沒有帶課本，甚至連掛圖也不帶。他人既生得矮矮胖胖的，一頭亂髮，那副面容跟橘子皮那麼粗糙。他穿的雖然終年是一樣的西裝，那條黑領帶老是歪歪斜斜的結在頸上，拖在胸前，那個領帶結却似乎永遠總是不整齊，像這樣不修邊幅的一位道貌並不驚人的教授，却是滿腹天文地理。一開口，就像天花亂墜，一面口講一面在那塊又長又大的黑板上畫地圖，那條長江分出些甚麼支流，這些支流可有多少長度，那裏是平原，那裏有沼澤，那裏有山，他都一一註明尺碼，彷彿是他曾經在那些地方下過測量的功夫似的。有一次有一個同學對他說，何必那麼辛苦，要費那麼大氣力，自己繪地圖？找一張地圖一面講一面指示不就省事麼？

「你以為我連掛圖都不知道用麼？」他笑笑地說：「那些掛圖大畧看看倒是無所謂，如果要是靠着來講書，却一點用處也沒有。」

接着，他便告訴我們，說我們天天在這裏上課，可是暨大和真茹的地理知識，一定會有許多人攪不清楚的，他希望我們在星期日就勘測一下真茹和暨大的地形，繪一張畧圖，我們都依話辦了，我們都以為這還不容易麼？連勘測的功夫也省畧了，自己自以為是的隨便繪了一張畧圖。結果纔發現我們自己所繪的天天都在那裏生活的地方，却連方向也攪錯了。他一一給我們指出，纔知道甚麼事不親自經歷一番，是不會澈底瞭解的。他說念地理如此，搞甚麼學問也應當如此，是要用功夫的，不應該自以為是的隨意指鹿為馬。

有一次，是快近暑假的時候，也快要舉行考試了，而他

的「地理」却快要講到甚麼雲岡石窟上去了。他就老實不客氣地對我們說，他需要請一個短時期的假去旅行，到下學期他纔來上課，考試也不舉行了，將我們平日的作業的積分撥作成績就行了，待下學期結束纔一併舉行考試。他同時還告訴我們，對於雲岡石窟，他並不澈底了解，他希望找一位對於地質學有研究的教授代他講授。同時他還告訴我們，他到過雲岡石窟二次，這次還要去作最後一次的考察，他就是這麼一位篤實的地理學者。

後來來代課的教授也是一個矮矮的胖子，沒有蓄髮，穿西裝倒比周傳儒先生來得整齊，領帶結也打得還像樣，祇是看看去，一點不像教授。說得刻薄一點，倒有點像買辦，像商人。他講書的時候，口沫橫飛，那滿口帶了客音的國語，在江浙同學聽來，總以為他是四川人或是湖北人。而我是客家人，自然一聽，就知道他是道地的客籍人了。

這位教授，我們起初并不知道他甚麼名字，他初來上課，教務處既沒有派人帶着來作介紹，他自己也沒有作過自我介紹，乾脆得很，他一來，就滔滔不絕地在講述雲岡石窟的地層是如何如何，並且說出許許多多的與地質學有關的名詞，甚麼沖積期化石咯，甚麼冰河時代咯，我們初次聽來，倒覺得耳目為之一新。他在黑板上的繪圖，也繪得很熟練，看樣子，一點也不比周傳儒先生繪的遜色，只是他那口國語，聽來有點不中聽，這算是美中不足的地方。他說，「西北方氣候很乾躁，雨量又少，河道又少，只是在大同附近有一條水，也可說是河瀝，叫做武川河的，在地圖上看起來，有時還找不到，在軍用地圖上看來，倒像×毛那麼粗！」聽到這裏，班上的十多個客籍同學，都不約而同地哄然大笑，他自己也不禁失笑起來。只是那些江浙同學，却有點詫異。

他所說的×毛原是用客話說的，如用國語說就會成了陰毛；江浙同學，自然聽不懂，不但不會失笑，反而會詫異我們無緣無故的哄笑了。課後經我們一說穿，那些江浙同學纔知道我們之所以哄然大笑，原來是事出有因的。

這位買辦型的教授一直教到開始放暑假，他纔不再來，而我們並不知道他到底是誰。甚至我們跑到教務處去查詢，教務處負責人還誤會我們要挑剔教授的甚麼毛病，也不願告訴我們。他們理直氣壯的說，反正是代課的教授，你們也不必理會是張三李四了。這就是他們唯一的答覆。

第二學期開學後不久，周傳儒先生又回到暨南來教地理，他自然又是繼續講雲岡石窟。有一天，班上的一位客籍同學憤憤然地說：「申報自由談上張資平的小說被腰斬了，實在可惜！」

「反正我不看，又有甚麼大不了的。」一個同學插嘴說。

「不看張資平小說的，簡直是道學先生！」那個同學氣忿忿地說。

「那也不見得，」我說，「我就是看過張資平的小說而不喜歡再看張資平小說的人！」我有點不平地說。

「你這話是怎樣說？」他不服氣地說。

「我讀過他的短篇小說『梅嶺之春』，覺得還不錯，接着便買到他的長篇小說『苔莉』，讀後印象還好，可是當我讀完了他那部『最後的幸福』以後，也就沒有再讀他的小說的興趣了。」我說。

「你爲甚麼不看他的『上帝的女兒們』？你爲甚麼不看他的『天孫之女』？」那個同學還是一本正經地說。

「後來我聽說他寫的小說，多是由日本小說脫胎出來

的，所以也就不再看下去了。」我說。

「那是人家造他的謠，」他說，「我相信黎烈文也是上了謠言的當纔腰斬了他那篇連載小說『戀愛與時代的歧路』的。」

「張資平是你的親戚麼？」我說，

「不，他倒是我們的教授！」他說。

「我可沒有上過他的課！」我說。

他失聲笑了起來，說，「我們上學期的地理代課教授可不就是他！」

「啊，原來他就是張資平！」我驚訝地說。

可是不說猶可，一說反而覺得他寫小說實在是一種浪費。他應該好好地攪他的地質學的，何必一定要寫甚麼三角四角的戀愛小說呢？而且還在文壇上留下了一個甚麼戀愛小說商的聲名呢。

鄧胥功的「要得」

暨南大學雖說是中國政府爲收容南洋各地僑生回國升學而創辦的一間大學。但在暨南，却不是採用標準國語講授的，只要那個教授是甚麼地方人氏，他就可以用他自己的家鄉方言講授。與國語教學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黃炎培先生四十多年前，跑到南洋來提倡國語，絕不想到四十年後，會說國語的却是南洋華僑。我初到廣州中大唸書的那年，國語簡直可以鎖進箱子裏不必動用。那些嶺表的碩學通儒在課室裏說的，都是一成不變的廣府話！傅斯年、魯迅、顧頡剛，當年在中大，學生聽課的不怎樣踴躍，言語倒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暨南，江浙籍的教授，說的是他們自己的家鄉方言，川籍的教授却是滿口「要得」的川腔！湘鄂籍的也是有他們

自己的鄉音！只是在北京住久了的教授的國語，簡直可以說教人聽出耳油來，在同學之間是說國語的，爪哇僑生的帶着濃重的馬來腔調的國語，教人聽起來，實在有點像聽法文，英屬僑生雖然會說國語，但彼此之間也不大說的，粵籍的就說廣州話，閩籍的說廈門話，菲律賓回來的僑生說的總是帶着很重的晉江腔。彼此的國語既然說得那麼拖泥帶水，便只好各說各的了。在暨南同學當中最流行的，便是客話，馬來話，和閩粵的方言！而僑生之間雖然方言各異，但學言語的天才，好像大家都不缺乏。因此在我們之中說上海話說得跟上海人一模一樣的，則比比皆是，同學要跟教授說話，先以國語，國語不達意，則改用上海話，如上海話又不適用，那麼只好各說各的了。至於教授們對學生所用的方言，只消三幾個星期，聽得不完完全全的，簡直是不會有！譬如劉質平和王隱秋先生說的正牌「上海閒話」，康選宜和鄧胥功教授說的「要得」的四川話，在我們同學當中，簡直沒有一個聽不出來的。

在這許多籍貫不同的教授當中，使我們覺得最有學一學的興趣，便是「要得」的四川話。

我記得那時我們必修科的功課，有二門剛巧就是兩位四川籍的教授主講的。康選宜先生主講的「三民主義」，老實說，我們都沒有興趣。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但爲了學分，爲了要畢業，因此不能不虛應事故一番，別人我不知道，在我自己來說，每週一節的「三民主義」，康先生雖然費盡氣力，口沫橫飛地很吃力的在講，而我却不發生興趣。而最使我發生興趣的便是他講書的神態。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還依稀留在眼前。他那一口川腔，我聽了一年也聽得和他說的一樣爛熟。有時我們同學開甚麼同樂茶會，餘興的節目，

我常常還要表演一番，弄得同學們哄堂大笑！可是聽了一年的「三民主義」還是依然故我，一點心得都沒有，只求得了二個學分也就心滿意足，因此誰也不跟康先生打麻煩！

至於鄧胥功教授呢，他在暨南講「教育學大綱」。他的確是一個在日德學教育的教育家。我進了暨南，纔知道他一向都是主講這一門功課，他在暨南的歷史很久。據說，他從德國回來不久就到暨南，人胖胖的，活像一位紳士，四十多歲的年紀，留着兩撇黝黑鬍子，襯着那一副茶晶眼鏡，我聽了他一年的功課，就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的笑容，莊嚴得像德國人那樣！也認真得跟德國人一樣！他的「教育學大綱」講義，可以說是一部篇幅不少的著作。據說他對我們講授的時候，已不知道修改過多少次，覆印過多少次。有一次，有一個同學天真地說，「鄧先生，你這部講義爲甚麼不送去出版呢？」他却坦然地說，「現在還未定稿，讓我多講幾次，看看有甚麼毛病，修改修改，然後纔打算出版。目前是不會出版的！你們發覺有甚麼異議的地方，請你們不客氣地對我說，等我好好地修改修改。」

這話一說，那些天真的同學，果然在課後去孜孜不倦地研讀起來。我自己也翻看了一遍，唯恐給他問起，說不出所以然來！有的同學還一本正經地在寫意見書，讀後感。有一次，我們班裏的幾個同學，聚在一起聊天，話題一談就談到了「教育學大綱」，我說，「這部書比較偏重德國教育，毛病是有的，就是材料太舊，你想，鄧先生留學時期，最多也不過廿多歲到卅歲左右，而今年已經四十多了，這些材料還是從前他留學時代的東西，現在的德國和十多廿年前他留學時期當然不同了，德國的教育也不知進步了多少，改革了多少，而我們現在還把他們的舊材料下功夫去研究甚麼，何

必花費那些時間和精力？要研究嘛，還是研究今日的德國教育的趨勢，不是較有意思得多嗎？所以我倒不能像你們那麼肯花那些精神和時間！不過爲了學分，虛應一番，倒也不妨的！」我當時這麼隨意說說，座中的幾位同學也首肯我的見解不錯。我實在沒有想到後面還有文章好做的。一個同學把我這番說話，像留聲唱片一樣在大庭廣衆中照樣說了出來，幾乎闖了禍。原來我們班上每學期結束了之後，放假之前，一定要舉行一次聯歡茶會，教授同學全部出席，鄧胥功先生那天也出席茶會，在席上很高興的告訴我們同學，說他的「教育學大綱」已經出版了，裏面改正了不少的地方，相信錯誤仍不免，希望在座的同學多多貢獻寶貴的意見，等再版時可以增訂一番。話說得非常客氣和謙遜，他說完了，同學間還響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他纔從容地坐下。這時突然有一個同學立刻站起來貢獻一些寶貴的意見說，「剛纔聽到鄧教授的話，我們覺得很高興，只是這部書，我覺得材料太舊了。」於是把我說過的話，照單發付，我當場真是替他扼腕，這些話怎好說的？他一定會碰大釘子。

當他把我說過的話照單全收之後，又照單發付了一遍，他才坦然地坐下，果然鄧教授也就站起身來質問他道：「××，你的意見很不錯，只是希望你把它仔細給增訂一下，修改一番！」

「增訂，修改，我是不會的！」那個同學硬梆梆地說，「只是我說的材料太舊，有沒有說錯呢？」場面差一點就弄僵了，幸而主席打了圓場，大家纔嘻嘻哈哈了一陣。

抗戰時期，鄧教授回到成都去教書，有些同學告訴我，他碰到鄧教授，他還再三地探問起那個同學的下落，盛讚那個同學的坦率和爽直，但鄧教授一直沒有想到，那個同學對

他的大著，連看都沒有看一看！

京片子和衛生學

在暨南的芸芸教授當中，女教授佔的數目雖然不多，但著名的女教授，倒也有十幾位，如蒯淑平，馮沅君等都是。我在暨南的那幾年當中，雖然沒有選修過她們的功課，却旁聽了兩位女教授的功課，時間也不長。在暨南，有兩種課程是特殊的，一是「國語」，一是「衛生學」。擔任這兩門功課的都是女教授，前者是陳衡粹先生，後者是楊先生。

起初我聽同學們說，陳衡粹先生教「國語」教得非常好，我沒有選修，很覺可惜。但事有湊巧，她上的「國語」課，剛巧和我所選修的課程，時間並不衝突，因此，我纔能夠旁聽。本來選修她的功課的同學並不多，只有二十來個，但是旁聽的同學數目却多上了一百有奇，後來聞風而來聽講的同學，還是絡繹不絕，愈來愈多。我開始聽講的時候，適值開學後的第貳週後，每週只上課一節，貳週也不過講了二次吧了。還是跟初開講時無異。那天我去上課，一坐下，陳先生便來了。她長得很漂亮，身材很苗條，人又斯斯文文的，她的裝扮跟當年上海女人的打扮大大的不同，樸素中帶了點端莊，那瓜子形的臉上薄施脂粉，却顯得很嫵媚，她那一口悅耳的京片子，簡直就教人聽出耳油來。難怪同學們那麼賞識她，稱讚她好得了不得。

當她教「國語」時，她並沒有教甚麼注音字母，我以為錯過了機會，沒有念注音字母。問了問同學，纔知道她並沒有教注音字母，據說她第一次上課，就問同學們有那一位不懂得注音字母的，如果沒有人不懂，她也就不再浪費時間了。他教「國語」時，就把北方人說的京片和南方人說的

「國語」差別很大的地方列舉了出來。例如北方人說的「一會兒」，南方人往往就把「兒」念了一個單獨的字音，念成「一」「會」「兒」，因此很難聽。這個「兒」字，在北方人說來，其實就是會字的語尾的捲舌音。在文字上本來不應該寫出來的。就是寫成了「一會兒」，也不應念「一」「會」「兒」的，北京人說話對於名詞差不多都是捲舌音，如椅子，他們是念作「椅子兒」的，「桌子」是念作「桌子兒」，諸如此類，如果要寫起文字來。那麼簡直滿篇都是「兒」「子」了，說得大家哄堂大笑。她還說南方人說國語常常把動詞的「倒」字，「倒轉來」的「倒」字，倒茶的「倒」字念成「倒霉」的「倒」字也是很大的錯誤。南方人說的「包子」原來就是北京人說的「饅頭」，南方人說的「戒指」就是「頂針」，南方人說的「留聲機」，在北方便成了「話匣子」，她說了許多諸如此類的名詞，當她說到北京的一種食品「窩貼」的時候，她說她在南方就沒有聽過類似的名詞。我說廣東人有一種「粉果」和「水餃」，樣子跟「窩貼」大概差不多的吧？但「國語」却沒有這種名詞。這種都是屬於特殊的名詞。如北方的「涮羊肉」，和廣東的「龍虎鬥」，還不是照字念。她主講的「國語」却教我們懂得了北京的許多事事物物和名詞，使我們後來在寫作上沒有因濫用名詞而鬧笑話。不過可惜的是她只教了三個月便告假回北京，說是她胃裏生了瘤，需要到協和醫院去開刀割治。這樣一走，以後就沒有了下文。

此外我旁聽的另一位女教授是楊先生，名字已忘記了，人也長得很漂亮。她是廣東人，那時還未結婚，是留美的學生，選修她的「衛生學」的同學也特別多。我爲了好奇和湊熱鬧，也抽空去旁聽了二次，却想不到選修她的功課的同學

會那麼踴躍。她上課的課堂是在科學館最高的一層，四樓的朝北的一個大實驗教室。大概是因為那個教室多的是插圖和有關「衛生學」的人身模型之類的儀器。可是我去旁聽了二次，却沒有看見她動用過那些設備齊全的儀器。我記得當年聽她講的功課，現在還繚繞在耳際。她說一個人要是不幸生了急病，而又是在三更半夜的話，最好是打電話到醫院裏去，召救護車來接送到醫院去，而最好還是要住頭等病室。花錢雖然多些，不過既然生了急病，却不能再顧慮到金錢的損失了，一個人最好就是不生病，如果想避免生病的話，那末吃東西就得格外小心，吃水果要削皮，不削皮就要用開水去消毒，兩手也要常常洗滌，最好還是要置備一瓶「萊沙」，以便吃東西前把雙手消毒過，如果上餐室或酒樓去吃喝，對於食具無法消毒的話，那末不妨向茶房要一盃開水，把食具作一番消毒功夫云云。我第一次去旁聽，就聽了這些「衛生學」。第二次去聽的，却是有關腸胃的衛生，那一次她說人體裏面需要清潔，要清潔無過於大小便的排洩乾淨，如果需要排洩暢通，那末每天至少非喝六大杯開水不可。因為我們人體裏面的機構就需要有這麼多的水分云云。聽了二次的「衛生學」，我覺得真值得擊節三嘆，但是以後也就不再去旁聽了。

後來我問了那些對於「衛生學」興趣很濃的同學，纔知道他們之所以能夠那樣有興趣聽得下去，原來是有不在酒的醉翁之意的。

彭家煌教國音

陳衡粹先生離開暨南之後，她主講的「國語」並不懸空，接講的是一個「國語專家」馬國英先生，馬先生原本是國語研究會的會員，而且關於國語的著述，曾寫過十多部專書在

中華書局出版，他一來主講就要同學們念注音符號，而且還要我們購買他所著的國語著述作參攷，他在黑板上寫甚麼解說時，並不寫漢字，橫寫着那些草書體的注音符號拼音字。他教我們要看懂這些用注音符號寫成的拼音字。他自己的國語講得自然很合標準。有一次，有一個同學請他寫出他自己的名姓注音符號拼音字，他照例地由左往右寫了出來，那個同學也真頑皮得可以，由右往左念，於是這樣一來，也就念成了「英國馬」，弄得他啼笑皆非，但他立即糾正說，絕對不能這麼念注音符號拼音字，除了直行寫以外，寫橫行一定要由左往右寫，所以念起來，也得由左往右念。糾正雖然糾正過了，可是那些喜歡胡鬧的同學還是故態依然，常常在背地裏稱馬國英先生為「英國馬」。本來「國語」這門功課，無異教人說話，教小學生說「國語」比教這些大學生實在容易得多，也比較有趣得多。講理論，沒有那許多理論可發揮，照會話念，念一二次，也就念完了；他的著作，每個同學都照他自己挑選的全買了來念完了。但同學們的國語還是說得不標準，還是那一口藍青官話。廣東籍同學還是說廣東口音的國語，客籍同學還是照樣說客家口音的國語，閩籍同學又是那一口福建口音的國語，能說標準國語的同學，實在是鳳毛麟角，寥寥可數。馬先生這樣吃力地教了兩個多月，便告了病假，以後也就不見他再來上課，大概他以爲這些孺子不可教也難說。這期間，我本來就不想再去旁聽這門功課了，有一天在教務處的佈告牌上看到通告，纔知道國語以後由彭家煌先生主講，請同學們注意。於是我就又再興起嚮往的心。

彭家煌先生是一個小說家。那時他的小說常常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上看到，現代書局也出版了他的二本小

說，一是中篇小說「皮克的情書」，一是短篇小說集「茶杯裏的風波」，開明書店出版了他的「慾魚」，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了他的「火神廟」，他的小說帶着很濃重的憂鬱氣氛，彷彿有點像柴霍甫的小說，即使是「情書」，那樣粉紅色的艷麗的題材，也教人看得有點憂鬱。對於他的小說，我可以說是他的一個忠實的讀者，他的小說，我從沒有輕易放過。這樣的一個小說作家，居然要教「國語」，在他自然是無可奈何的事！

他第一次給我的印象，便是不修邊幅，他的頭髮原本是剪光了的，現在也已草似的長的高高的，兩道濃眉配着兩隻深陷無神的眸子，說話是無精打彩的，慢吞吞地，他的兩頰和兩頰長滿了短短的虬髯，于思滿臉，看起來真有點像仙人掌。那黝黑的膚色，就顯示出是睡眠不足和營養不良所累積的結果。加上那滿臉無精打彩的神氣，就活像他的小說所給予讀者的氣氛和情緒。

他那一口湖南口音，和那所謂「標準國語」，根本就是大相逕庭格格不入的。他本來是不應該教甚麼「國語」的。後來我纔知道生活的逼人，實在是無可奈何的事，他對我們說，他之來教國語實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他對國語並不是有甚麼研究，祇是馬先生病倒了，一時找不到適當的人來代課，找到他，他也就只好硬着頭皮，勉強答應下來，自知教得當然不會好，只是爲時也不久，還有一個多月，這門功課也就可以結束了，那麼他才敢勉爲其難，而來聊充濫竽的。語氣之間，無非是希望取得同學們的同情和諒解而已。

他教國語還是採用了馬國英先生編的那本國語讀本，照字讀，同學跟着念，他本來就是那麼木訥，也不懂得青年學生的心理，自然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同學們在半途抽籤的也

就漸漸地多了起來，等到學期考試的時候，這一門功課，聽者寥寥，實在使人有點冷落之感。

秋季開學後，彭家煌先生的踪跡也不在暨南看到了，這門「國語」功課，因為一時找不到適當的人擔任也就暫行結束了。

過了兩個多月後，我忽然看到莊心在和潘子農徐蘇靈在南京創辦的矛盾月刊出追悼彭家煌先生特輯，使我驚異得很。原來彭家煌先生還是矛盾社的同人之一，因害了嚴重的胃病逝世。他那面影，那皮黃骨瘦的丰采，就又重新浮上了我的腦海來，使我唏噓不置。

章克標登龍有術

暨大的文學院，雖然禮聘了不少著名的學者和文學家任教，但理學院的教授，後來在文壇上喧噪一時的，也有過好幾位，例如那時剛從日本的工業專門學校回來的沈端先先生，他一回上海，就到暨南任教，那時他還未曾着手搞文藝，也未曾從事介紹日本作家的小說；他做了戲劇家，編劇，當導演，自然也是後來的事。有一位後來名氣很大，蜚聲國際的，便是蔣彝先生，他那時在理學院當數學教授，我和數學之類的學科最無緣，因此我既沒有聽過沈端先的課，也沒有聽過蔣彝的課，據說蔣先生教書也很有風趣，現在讀其文還可想見其人；那時，他還未做過官，也不懂得裝啞。自然，到倫敦便成了「啞行者」，英美讀者都爭先購讀他的著作，致名噪一時，也是後來的事；據說他離開暨大後，曾到過江西九江當過甚麼縣長之類的小官，因為他喜歡說話，而且說得太多，提出過不少建設性的建議，而遭到上司的不滿，碰了釘子，然後丟官，纔知道做官的不易，從此三緘其

口，而後纔到倫敦去讀書，以「啞行者」作筆名以志終生不忘的。像這樣有風趣的教授，當年他在暨大就是教最乏味的數學。而我也就有失之交臂，以未嘗聽他的功課爲畢生一大憾事。

此外，還有一位章克標先生，我也是沒有上過他的課，他是在理學院教數學，此人雖然是個算學家，但畢生恐怕是以文藝見稱。讀者也多以爲他是文藝作家，而不知他的本行，却是令人頭痛的算學。

他在暨大理學院教書的時候，也常常在「一般」月刊上用「豈凡」的筆名寫雜文，後來「一般」停版了，他還把這些「風涼話」集成單行本；在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他雖然愛寫雜文，說風涼話，其實他的雜文並不見得怎樣出色，我不喜歡讀他的這類文章，總覺得他這類文章，既無風趣也不幽默，就有如算學那麼枯燥。他後來在邵洵美辦的金屋書店出版過一本厚達四百餘頁的專挖苦郁達夫追求王映霞的長篇戀愛小說「銀蛇」，這部小說的內容是因爲郁達夫本身的故事有趣，而又充滿了盎然的醋意，我却能一口氣把它讀完了，比之「風涼話」實在好得多，也有趣得多。他發表「銀蛇」的時候，已經離開暨南了，作品也發表得最多，差不多凡是雜誌都有他的譯作；就在這時期，他介紹了夏目漱石的傑作「哥兒」，森鷗外的「倫敦塔」。那時他初學法文，一面念，一面譯出來的莫泊三的散文「水上」，也是在這時期相繼出版的東西；可是不久之後，突然有一天早上，上海申報第一版上，出現了一長條廣告，原來是章克標謀職啓事：

「敝人攻習算學，曾任大中小學教員，稍弄文墨，並有編著譯作出版，粗通日語，畧識英字，編輯有小經驗，經營缺大手腕，辦事容可對付，交際全無本領，潔

身自好，有類狂狷，守約重諾，形同僞善。數年來藉筆耕以爲生，號稱自由職業，實爲體面乞丐。茲爲生活，欲求職業一個，報酬必須計較，工作要有範圍，如有意錄用，請投函×××轉交便妥！懇託介紹，甚怕麻煩，且登廣告一試！」

這廣告一經登載出來，文化圈中人識與不識不禁譁然，認爲老章憤世嫉俗，大發牢騷，聊博世人一粲而已。但從這篇廣告看來，却比之他的規規矩矩的「風涼話」風趣得多了。這時他實在並沒有失業，還經常爲邵洵美辦的「金屋月刊」料理編務，後來一九三三年八月間邵洵美的新時代圖書公司創刊了一種旬刊「十日談」，那時被魯迅嘲爲新詩人邵洵美的幫閑專家的章克標是主編。他在新時代圖書公司就出版過一部「文壇登龍術」，洋洋十餘萬言，分訂二大冊，連史紙線裝本，定價大洋十大元，預約半價，出版後一紙風行，洛陽爲之紙貴，有讀了此書還以爲是作者的自吹自擂的法術，顧名思義，「文壇登龍術」說穿了，也不外是憤世嫉俗之作，而章克標之文名會那麼響亮，倒是拜「文壇登龍術」之賜，也是他所始料不及的。我記得當年章克標出版這一部「文壇登龍術」的時候，曾在林語堂主編的「論語」半月刊上登過廣告，解題和後記，解題的開頭第一段，好像是：

「登龍是可以當作乘龍解的，於是術便成了乘龍的技術，那是和騎馬駕車類相似的東西了。但平常乘龍就是女婿的意思，文壇似非女性，也不致於會招女婿，那麼這樣解釋，似乎也有引起別人誤會的危險……」

這一段妙文也就惹起了魯迅的「誤會」，引用來作嘲笑邵洵美的大好資料。

他在「十日談」的創刊號就開了一欄「文壇畫虎錄」，

把許多文壇的人物，盡情嘲笑一番，雖然文章都是外間讀者的投稿，但隱含有「畫虎不成反類犬」的諷嘲之意，倒是很顯然的。

章克標個子瘦瘦的，頭上蓄着當時稱作陸軍裝的髮型，終年穿着不會發光的黑皮鞋，一套長袍老是顯得那麼陳舊，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的近視眼鏡，其貌不揚，但有點像當年上海灘上的跑街型的人物。

章克標雖然是一個算學家，他在文壇上，雖然名噪一時，大家知道他，也是爲了他那部「文壇登龍術」，說起來也夠悲哀的！

陶冷月專畫冷月

一九二七年，鄭洪年當校長時期的暨南，學生團體之多，學生課餘活動的頻繁，在江南八大學當中，可以說是無可匹敵的。鄭校長尤其不惜擲資供給學生團體作經常費用。所以暨南學生團體所聘請的顧問，往往也不是義務性質的；譬如暨南特有的國畫研究會和西畫研究會也堪作一個例子。國畫研究會會員，名義上只有二十多名，實際上經常去繪畫的，只有寥寥幾個，而會員月捐雖說是每名只收二角大洋，即使繳齊了，也派不了甚麼大用途，而況繳會費的，往往也只是有名無實。而國畫研究會的那位顧問，却每月須花三四百塊錢聘請來的。他不是別人，倒是一位國畫家陶冷月先生。西畫研究會則聘請了那時剛由法國回來的邱代明先生主持。並且各自有聲有色的闢了一個設備一應俱全的畫室，專供同學們按時學畫。

陶冷月先生是蘇州人，個子矮矮的，平頂頭，他很喜歡同學臨場看他揮毫作畫，他住在暨南教職員宿舍裏的一個大

房子。本來是兩個人共住的，因為他要繪畫，學校當局也就特別優待，讓他獨佔一室。他每天都在臥室裏作畫，除了每天下午四時到五時或六時，他纔在國畫研究會的畫室裏作畫，用功之勤，也的確使同學們敬佩。他還可以一面作畫，一面跟你談天。他絕不會因為有了客而擱筆應酬，來客也往往是欣然而來，看畫聊天，用不着客氣，寒暄，興盡便飄然自去，連招呼一聲往往也乾脆沒有。他自己呢，百事不管，祇管繪畫，他時常叫同學們每晚空閒時，到他的宿舍看他作畫。有一次我應邀而往，我還未到，而他早已繪了兩幅山水了。他的臥室，四壁掛滿了他自己的作品，大幅小幅幾乎應有盡有，房子中間放着一張大畫案，上面擺着很講究的文房四寶，中間還夾雜着一塊很大的調色瓷碟，裏面擱着幾片靛青和一大塊藤黃，此外還有一大盂的清水，用以洗筆。案上永遠攤着一張潔白的宣紙，即使不作畫時，多半也擺在那裏，大概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許是等待靈感一到便一揮而就。但是在我看來，陶先生作畫，似乎並不需要甚麼靈感不靈感，他繪畫就像我們上課一樣，無須靠靈感的。室內祇有一把椅子，和一張單人小鐵床。他似乎永遠不坐椅子的，我就從沒有看見過他坐在椅子上。他作畫的時候居多，而作畫的時候又往往站着在揮毫的，那張椅子也就是只讓來客坐，而來客也都是站着的多，所以他那張椅子，就形同虛設。那天晚上，我到他的宿舍去時，早已有了兩位同學先我而在，這兩位同學可以說是他的得意門生。我之參加國畫研究會，不過玩耍而已，並不存心想做畫家，說起來，我的來意單純得很，不過是想聽聽那些關於圖畫的理論而已。所以我從來就沒有畫過一張圖畫！在會員當中，我可以說是荒唐的一個！他們必恭必敬地站在案前聚精會神地看陶先生揮毫

時，而我却默然地站在他們的旁邊，靜靜地看着。在那盞大約只有廿五枝燭光的蛋黃燈光下，繪山光月色，真是別有一番情趣。好容易等他畫完了，大家纔招呼說話，原來那兩個同學是來繳畫卷的，他一打開，就口講指劃地說這裏不對，那裏的顏色不夠深，我看了他們的畫，也不外是那種陶冷月型的山水和月亮的靛青畫！

「你這個月亮畫得畧大了一點，山高月要小，纔顯得出『冷』來！」陶先生說，「如果小一點也就很好了。不要緊，不要灰心，再畫，多畫了一定會畫得好！就像寫字一樣，字寫多了，一定美！」

那兩個同學沒有說甚麼，只是好的好的答應着。

「同時你們這兩幅畫，氣韻也不夠，你們瞧，是不是會覺得畫上有甚麼東西不夠似的，那就是氣韻！」陶先生接着說，「作畫之先，先要胸中有畫，然後纔下筆，胸中無畫，那就不要作畫！一勉強，畫下來的畫，也就不是氣韻不夠，就是筆力不夠遒勁。」

那兩個同學還是在點頭。我想插嘴問問氣韻是怎樣的，怎樣纔看得出來？我心裏又這麼想，這兩個同學的畫，跟他畫的，就看不出有甚麼不同，總是同一個模型的東西，如果和他的畫一起擺在那裏，也許會亂真，我想說出我的意見，但是我却没有說。

「你的畫呢！」猛不提防陶先生會向我討畫，使我大大喫了一驚。

「我沒有作畫的興趣，」我坦然說。

「一時沒有興趣倒不相干，有興趣時就作畫，」他說，「你不知道作畫是最有興趣的工作，你瞧我，我除吃飯睡覺，簡直沒有一個時辰不作畫！」

他簡直就沒有想到我們千里迢迢負笈歸來，並不是專爲的學繪畫的，我壓根兒就沒有當畫家的念頭。我心裏這樣暗暗地說，但我還是默然。

「也許你還未領悟到畫畫的興趣，你慢慢培養起來，一定會高興作畫的！」他說，「你多看幾回我作畫，慢慢地你也會拿起筆來的！」

「陶先生，繪國畫有甚麼用場？」我好奇地問。

「咦，你怎好這樣問？」他驚訝地說，「繪畫可以陶情養性！」

我默默無語。

「繪畫對於陶冶性情的三昧，你還不了解，」他說，「你試試繪幾筆，然後你慢慢就會了解，就會領悟的。」

「但是……」我話還未說完，他就打斷了我的話。

「但是甚麼？」

「我們不能夠像你那樣，除了陶冶性情之外，你可以繪了一張一張的畫有出路，你的畫簡直就是你的生命。」我越說越不像話。

「咦，你怎麼會這麼說的？」他更驚訝起來。

「陶先生，你不知道，你那一大把的狼毫筆，你那方講究的硯台，你那一大幅一大幅的宣紙，我全買不起；還有畫了的畫要裝裱，我也花不起那些錢。我是個苦學生，我跟其他的華僑同學不一樣，他們經濟有來源，而我要自食其力，過工讀生活，所以我要多懂一點東西。花那麼多錢纔能學的東西，我學了却不能謀生！陶先生，要學到像你那樣，的確不容易，你畫了幾十年畫，好容易纔成爲一個畫家！我做不來，我加入研究會，不過想求點知識而已，並不想成爲一個

畫家。我自知也成不了一個畫家！即使花得起錢，我自知並沒有那一份的天才！」

「你喜歡學甚麼的？」他問我。

「文學。」我坦然地說。

「文學和藝術，全是那麼艱苦的工作。」陶先生說。

「我知道，不過文學是我性之所近，我比較喜歡。同時文學比較容易有機會學，除了時間之外，不必化那麼大的本錢。我要看書，圖書館有的是，我用不着花那麼多錢；我的寫作還可以賣點錢補貼每個月的開支，同時我還在一家大書店裏當校對。來維持我的苦學生活。」

「哦，原來如此，難怪你會那麼說了。」他恍然地說，「那末，你要繪畫也可以，紙和顏色我這裏有，我可以送給你用，筆，我也可以送一套給你，你要繪畫用的東西，缺乏甚麼，你可以告訴我，祇要你畫畫。」

「謝謝你，陶先生！」我說，「我所缺乏的就是那份天才，我連月亮也畫不圓！」

「你應該知道時間加上努力，就是等於天才。」他循循善誘地在鼓勵我。

我還能說甚麼呢，也就只好跟他作畫，畫，畫，畫的，一直繪到可以畫得像他畫的那一種山水和月亮，我感到沒有甚麼意思。

我記得他對我說過，他的名字叫冷月，他的畫一定有冷月，這是他自己的作風，也可以說是他的商標。老實說，我覺得他的畫是那麼單調，那麼乏味！不久陶先生也辭職回蘇州去過賣畫的生活。圖畫研究會主持人換了謝公展先生，我也沒有那麼便當，要甚麼有甚麼地繪畫，因此我也就從此不

再畫甚麼圖畫了，一直到現在我所學得的一點皮毛功夫，早已原封送還給他。細想起來，實在辜負了陶冷月先生諄諄教導的一片苦心！





·乙 編·

秋野社的一羣

文藝團體，在暨南之多，如以「雨後春筍」來形容最爲恰切。在許許多多的文藝團體之中，最爲外間人士所熟知，與外間的文藝界人士較多接觸的要算是「秋野社」。

秋野社成立於一九二七年秋，發起人是陳翔冰，鄭吐飛，陳雪江，江道章諸兄，大多數都是西洋文學系的同學和教授。按月出版一冊秋野月刊，足足就出了二年多纔因經費支絀而告停刊，此外還經常邀請文藝學術界知名之士到校作專題演講。初期較多聘請文藝界人士演講，「孽海花」作者東亞病夫的曾孟樸曾虛白父子和已故詩人徐志摩，魯迅等人都會先後到過秋野社演講。他們的演講詞都曾在「秋野月刊」上發表。我記得東亞病夫當時講的，好像是和「孽海花」有關的問題。徐志摩則朗誦了他的一篇散文新作「秋聲」充數，魯迅講的「文學與政治的歧途」最初就是發表在秋野上的，而筆錄者，好像是章鐵民先生。鄭振鐸也曾被邀演講過，可是因爲他是文學院的系主任，所以也就引不起同學的注意。

學術界人士如胡適與張競生也曾先後被另一個文藝團體邀請，他們的演講最叫座，也最轟動。那時暨南大禮堂的致遠堂還未落成，全校同學爲了聽胡適和張競生的演講，幾乎把那座大飯堂擠破了。魯迅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廿六日在暨南講的那篇有名的「文學與政治的歧途」時，聽衆也比不上那樣踴躍，與胡適和張競生比起來，簡直是天淵之別了。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魯迅再度在暨南講演了一次，那次講題是

叫作「發牢騷」，「暨南週刊」上刊登過筆錄稿，是章鐵民先生的手筆，但後來魯迅的著作集子却沒有見到這一篇講稿，大概是漏掉了，這次演講，因為環境不同，却贏得了不少聽衆的喝彩。

「秋野」當時的確是很有朝氣的一個青年作家的文學團體。只要翻開每期的「秋野」月刊，就可以看到夏丏尊，徐志摩，張鳳，梁實秋，葉公超，章衣萍，章鐵民，汪靜之等人的作品，那幾位主持人却幾乎期期都寫了很特色的文章。陳翔冰兄每期負責寫一篇文學評論，言論很精警，見解也很透澈，鄭吐飛兄每期發表一篇充滿了熱帶情調的短篇小說，後來這些小說都曾在真美善書店結集出版，現在大概已成了絕版書了。那時翔冰兄偶然也寫寫新詩，「緬甸潑水節」便是很叫座的作品。他後來出版了一部「春夜小曲」收在秋野叢書裏。陳雪江兄是負責寫雜感文章的，他的嬉笑怒罵的雜文，也頗得讀者的歡迎。還有一位遠在東京留學的陳谷川兄，也是每期寫一篇小說。那些小說多數是描寫他從軍時期的生活經驗。寫作家生平的江道章兄，風度翩翩，的是一位濁世佳公子，此公善詞令，據說後來去搞外交，也可以說是人盡其才呢。還有一位精於攝影的戴淮清兄專寫文壇消息，介紹新著，只是後來他轉學燕大去了。我當時在秋野社也不過是一個小夥計，興趣好時也偶然胡縐幾首詩，聊作「秋野」補白之用而已。

「秋野」的一羣，實在人數不少，有男有女，其中有一位姓徐的小姐，他是徐元度教授的妹妹，也是西洋文學系的同學，眼睛大大的，風姿不凡，當他扮演「王昭君」在舞台上出現時，的確顛倒了台下芸芸衆生。還有一位劉覺女士，個子小小的，一表斯文，她是暹羅華僑，詩文寫得很有一

手，後來就與翔冰兄共諧伉儷，當她和翔冰兄搞戀愛的時候，在梁實秋先生上課的教室裏的黑板上，就有過一幅漫畫，畫的就是翔冰兄和劉覺女士的素描肖像，下面題着「女文豪嫁男文豪」的嘲笑的手筆，這兩位文豪，後來「終成眷屬」，也是秋野社裏的一件韻事，翔冰兄是仰光僑生，抗戰時期，曾偕劉覺女士北返參加抗戰工作，夫婦倆幾次路過檳城，重晤之下，我纔知道他離開暨南後的歲月，原是在仰光搞建築工程，這簡直有點跟英國作家哈代相似。翔冰兄的詩好，文好，他的小說，甚至他的那部在真善美書店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一個叛逆的女性」，老實說，我實在不敢恭維，據說抗戰勝利後，他當了一家甚麼銀行的行長。而後來轉讀銀行系的江道章却進外交部作官去了。所學非所用，一至於此！

在「秋野」上寫小說寫得最出色的，便是鄭吐飛和陳谷川，谷川兄在馬來亞教過書，桃李滿天下，後來回到暨南主持南洋文化部工作。他樣樣都好，做人也很有風度，同學對他都當「老大哥」般尊敬，同學中有甚麼糾紛解決不了的，只要他一句話，無不迎刃而解。他為人很豪爽，常常嘲笑翔冰兄是市儈化的詩人，他一生過着不安定的生活，在抗戰前他曾出任星粵日報的社長，在籌備出版期中，適值日軍侵粵，他便輾轉入抗戰首都，以後一直下落不明。

鄭吐飛的為人也很風趣，他不但寫得一手好文章，還能夠打得一手好籃球，當選手。他精通馬來文和荷蘭文，譯過不少馬來情歌。後來還出了一本結集。他原是爪哇的僑生，在暨南的爪哇僑生當中，中文寫得那麼有分量的，他算是一支大手筆，他個子魁梧，頭髮如一團亂草，從不梳理，同學戲呼他『土匪』。他和我認識之後，纔知道他原名並不叫

『吐飛』，『吐飛』是『土匪』的諧音而已。

陳雪江是馬尼拉華僑，在菲律賓的華僑當中，福建晉江人最多，他自然也是晉江人。在暨南時，身體本來就不大好，瘦骨嶙峋，有時演話劇，我們找不到適當的女主角，還強要他充任女主角，其人面孔白白的，兩頰終年緋紅，活像擦了胭脂那麼艷麗，可惜他離開暨南，回到馬尼拉去養病，不久也就傳來了埋骨異域的噩耗。

秋野的一羣，在暨南不久却風流雲散，各奔前程去了。三十多年來，世事如轉蓬，仔細思量起來，實在教人不免有人生聚散無常的感慨！

徐志摩朗誦秋聲

一九二八年春，上海新月書店忽然在望平街申報館對面出現，那是一間鋪面很奇特的房子，門口開得很大，門前的左右兩升牆分嵌着兩個大而無當的櫥窗，裏面零零落落的擺了幾部徐志摩的詩集和散文集，一進到房子裏面，只見右首是一個長櫃台，當作欄杆似的隔開了。櫃台後，擺着幾張辦公桌，有些人在握管寫着些甚麼。至於左首是一張又大又長的桌子，上面擺滿了新月書店出版的新書，四周圍的牆頭上又是一排的書櫥。全是同樣的新書，買書的人，自己選擇了自己所喜歡的書，送到櫃台前去付賬。店夥總不會來跟你找麻煩的，也不致老是站在你的身邊，兩眼老像釘賊似的釘着你的，你翻完了那些書籍，不購置一冊便飄然走出，誰也不理會你；因此那時我經常最喜歡拐進新月書店去翻書，而且經常看到一個長臉孔，長鼻子，一頭沒有膏沐過的亂髮，戴着粗邊眼鏡。穿着長袍的面目清秀的中年人坐在櫃台後聊天，這個人後來我纔知道就是徐志摩。因為那年春天，秋

野社第一次邀請名人作公開演講時，他就是第一個受邀演講的人，那時暨南的大禮堂致遠堂還未興建，無論甚麼集會都是在大飯廳舉行，那天的集會自然也是在大飯廳舉行的。徐志摩到校演講，倒是相當轟動的學校新聞。許多同學平日喜歡讀他的詩的，自然踴躍出席，就是許多喜歡他的散文的同學，也欣然出席，我對志摩的詩歌並不怎樣喜愛，倒是他的散文，我有相當的好感，那天我以為他會談詩，他却談詩，他一來，坐了一陣，主席講完了開場白，他便從容地步上講壇去，行了禮，說了幾句客套，便從那件深褐色的長袍的衣袋裏，掏出一束白紙，展開了，朗朗地吟誦起來，他的聲調的抑揚頓挫，聽起來倒是很舒服的，但是內容是甚麼，却聽不清楚，那份稿子，大概是三頁原稿紙，不一會功夫便吟誦完了，他纔說今天念的這篇散文，題目叫做「秋聲」，後來在秋野上發表了，纔知道是一篇詩一般美的散文。據溫寧源說：「他的散文比他的詩更能顯出作者的性格，讀他的散文，我們宛然如見他整個性格的光輝，他的聲音容貌，似一一呈在眼前——他的活潑，靈動，嘮叨，興奮，及其談鋒之自在如意——這些都在他的散文裏見到了，他的詩却反似與他的性格相隔一層，他的詩似他的作品產物，他的散文却似他的自身。」難怪他念得那麼悅耳。有些沒有出席的同學，後來聽到說徐志摩的演講是吟誦散文，都認為沒有聽一聽這位詩人的吟咏為恨事！那時徐志摩是在光華大學教課，當年他是被譽為新月派的大詩人，語絲社的朋友嘲笑他為「詩哲」。因為印度詩聖泰戈爾來華演講時，他嘗擔任翻譯，當年的小說月報上還有過一篇他紀錄泰戈爾的講稿，可惜這篇文章都沒有收集起來，現在自然更不容易再看到的了。

有一次，我奉了暨南文藝研究會之託，去邀請志摩再度

到校作專題演講。那天，我和一個同學到法租界福煦路他的寓所去拜訪他，我們一進去，就看見志摩在寫着甚麼，他一看見我們的到來，立刻停了筆招呼我們。寒暄了一番之後，我們便把來意說明了，他很誠懇地告訴我們，日期不對，他不能來，因為那天他剛巧有約會在先，說着還翻了翻一本小記事冊。他說改一個日期，他便能來，不然就留待將來有機會再來。接着，我們還聊了一會天，和我同來的那個同學忽然發出奇問，他說，「徐先生，你的大名，志摩兩字的取義，是志在『摩頂放踵』呢？還是志在做詩人王摩詰呢？」

志摩聽了，笑笑地說，「你要怎樣想都可以的，可以隨你的便！」

「這樣說來，其志不小呀！」那個同學天真地說。

志摩笑得很響，一個病態的林黛玉型的女人，這時大概是爲了笑聲所擾，而從裏面走出客廳來。

志摩立刻給我們介紹了，纔知道是他的太太陸小曼。

我們辭別出來之後，我對那個同學說，「小曼很美，難怪志摩那麼愛她！」

志摩的外型，跟邵洵美差不了多少，他的天真和坦率，和郁達夫也很相像。據何家槐說，他有一次從杭州鄉下到上海來，興沖沖地携了一筐梨子送到法租界福煦路志摩的家裏去，剛巧他不在家，他便把梨子留下，想留下一張便條，便拉開他的抽屜，取出他的信箋來寫條子；後來，志摩恰巧從外面回來碰見了，便責備他，說他不應該私自拉開他的抽屜，即使是小曼也不敢這麼做，因為夫妻間也應該有那麼一點秘密的。當時說得家槐慚愧得簡直無地自容。由此也可以看出志摩的天真，因為這一份天真，所以不免常常會遭受人們的誤解。畢竟志摩是不失赤子之心的人，只是一腔淳樸的天真，

對於環境，非常好奇，真偽不辨，醒夢不別，永不恨人，也永不想人會恨他。

家槐的成名作「貓」，就是採用志摩供給的材料寫成的。據說是泰戈爾來華時，泰戈爾對他說的故事，志摩原想自己動筆寫出來的，後來不知怎的，一直沒有機會寫出，反而把這個美麗動人的故事，鼓勵家槐去寫，並且還多方給他以指示，稿子寫好後，送到志摩那裏，志摩便把他介紹給小說月報，誰知竟成了家槐成名的傑作，也使家槐以後寫的小說，總是覺得不滿意。雖然這也可以說是累了家槐，但決不是志摩本意所及的了。

在當年，文人當中，被目為文壇富翁的，除邵洵美外，便是志摩。他是大學教授羣中唯一有自己的汽車的人。他曾寫有長詩「想飛」一篇，想不到竟成了他的讖詩。後來他果然因乘搭飛機赴北京，中途遇霧，飛機撞山，機毀人亡，時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遭難的，年三十六歲，郁達夫在一篇追悼他的文章裏說他死得恰好，因為詩人和美人一樣，老了就不值錢了，況且他的這一種死法，又和拜倫，雪萊的死法是一樣不平凡的。但是人們却惋惜是詩人不幸的遭遇。

志摩字章埈，浙江硤石海門人，著作計有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散文集「落葉」，「自剖」，「巴黎的鱗爪」，「秋」，小說集「輪盤」，戲曲「卡昆岡」，日記「志摩日記」和「愛眉小札」等書行世。

會孟樸談孽海花

記得一九二八年春，暨南大學秋野社邀請「孽海花」作者東亞病夫到校演講，到會聽講的同學不少，除幾十個社員

外，大都是文學院的同學居多。那天陪同東亞病夫一齊來的，還有一位三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據主持人的介紹，我們纔知道是東亞病夫的公子，曾虛白。東亞病夫原名曾樸，字孟樸，江蘇常熟人，在清末曾創辦小說林社，編譯了不少新學書籍，尤其是文學作品介紹得不少，影響當時文壇頗鉅。一九二七年後，復重理舊業，與虛白創辦真美善書店於上海棋盤街，編輯真美善雜誌。

東亞病夫當時給我的印象是：個子很瘦弱，臉色也不好，唇上垂下兩撇稀疏的鬚鬚，穿着長袍馬褂，戴着瓜皮小帽，說話慢吞吞的，有點像接不上氣。雖然當年不過五六十歲左右，却覺得他的形容與他的年齡並不相稱，好像顯得格外蒼老，和他的公子曾虛白比較起來，却顯出了很鮮明的對照，虛白先生的臉色紅潤，雖然也是穿長袍馬褂，但並沒有戴帽，頭髮梳得很伏貼，可以容光煥發作形容。那天虛白先生並沒有作專題演講，只是陪伴着孟樸先生。

東亞病夫那天講的，就是他那部成名巨著孽海花修改的經過。

他說：「『孽海花』原是我在光緒三十二年初，一時興到之作，那時社會的思潮，個人的觀念，完全和現時不同，我不自量的奮勇繼續，想完成自己未了的工作。」他說他修改的動機有三：「第一是爲了把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事業提得太早了。興中會的組織，大約在光緒庚寅辛卯間，而廣州第一次的舉事，事實却在乙未年十月，這書叙金雯青中了狀元，請假回南，過滬時就遇見陳千秋，以後便按叙青年黨興中會的事。雯青中狀元，書中說明是同治，戊辰年與乙未相差幾至三十年，雖說小說非歷史，時期可以作者隨意伸縮，然亦不宜違背過甚，所以不得不把他按照事實移到中日戰爭以

後，既抽去了這麼一件大事，篇幅上要缺少兩回的地位，好在這書裏對於法越戰爭叙得本來大畧，補叙過去，並非蛇足。第二，原書第一回是楔子，完全是憑空結撰，第二回發端還是一番議論，又按叙了一段美人談嫁醜狀元的故事，仍是楔子的意味，不免有疊床架屋之嫌，所以把它刪了。其餘自覺不滿意的地方，趁這再版的機會，也刪改了不少。看起來，第一編幾乎大部是新產品了。」

「孽海花」這部小說開始於金洵掄元。金係指吳縣洪鈞嘗典試江西，丁憂歸，在蘇州納名妓傅彩雲爲妾，後奉命使德，携以俱去，稱夫人，在私生活上鬧了很多的笑話，歸國後，洪在北京死了，傅不安於室，旋與家人俱返蘇，至申逸去，重張艷幟，至此遂中斷。這部小說可以說是政治歷史小說，是一部膾炙人口的小說，內容以名妓而功在於國的賽金花爲主角，貫串全書，將晚清數十年間歷史及社會百態，用諷刺詼諧的筆法寫出，不僅文字優美，且見解精當，觀察深刻，描寫生動，初由「愛自由者」開端，「愛自由者」原名金松岑，又名天鬬，即金一，在當時思想亦頗進步，曾著有文集二種，又編譯「自由血」一種，係俄國虛無黨史，宮崎寅藏之「三十三年落花夢」亦係他在晚清時所譯，可見他的胆識與孽海花作者頗有相似處，他曾發起此書，寫了四五回，自覺魄力不夠，纔改由東亞病夫接寫的。

據阿英的「晚清小說史」內所說：「孽海花二十四回，首五卷十回，光緒乙巳（一九〇五）由小說林社出版，丙午年（一九〇六）續出次五卷十回，雜誌小說林創刊，又續作四回，丙辰（一九一六）強作解人以此四回，並作孽海花人名索引表，「孽海花」人物故事考證八則及證續十一則合刊孽海花第三冊。一九二七年著者主編之眞美善雜誌出版，再

賡續十一回，又修改前書成一九二八年修改本，真美善書店出版，刊十五卷三十回，與原來計劃之六十回仍相差約二分之一。」

「孽海花」在當時影響極大，不到一二年，竟再版至十五次，銷行至五萬部之多，即後來的增訂版也再版了好幾次。

曾氏曾說明他寫作「孽海花」的技術：「這書主幹的意義，祇爲我看着三十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這一時期內飛也似的進行，我就把這些現象，合攏了他的個影或遠景，和想連繫的一些細事，收在我筆頭的攝影機上，但它自然一幕一幕的展現，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

「孽海花」當年出版後的確轟動一時，錢玄同胡適推爲中國第一二流小說，足與世界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見新青年），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畧一書內評爲結構工巧，文采斐然，惟形容時復過度，亦失自然。胡適以爲這書是集合了許多短篇故事聯綴而成的長篇，和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是一樣的結局，並無預定的結構。曾氏加以辯正，他說：「我的結構和儒林外史等雖然同是點綴多數短篇成長篇的方式。然組織法彼此儼然不同，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線，穿一顆算一顆，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鍊；我是盤旋着穿的，時接時斷，東交西錯，不離中心，是一朵珠花；儒林外史等是談話式，談乙事不管甲事，就談到丙事，便把乙事丟了，可以隨便中止，我是波瀾有起伏，前後有照應，有擒縱，有順逆，不過不是整個不可分的組織，却不能說他沒有複雜的結構。」但文藝批評家阿英對孽海花却推崇備至。他說：「孽海花所以能得到這樣熱烈的歡迎，原因當在思想方

面，技術的成功，題材的現實，自然也是一因。此書所表現之思想，其進步與激急，是超越了當時一切被目為第一流的作品而上之，即李伯元、吳趼人亦不得不屈居其下，孽海花表示了一種很强的革命傾向，他寫當時的革命運動，敘述了自明亡後的中國會社秘密史，對於這些組織，除掉為清室服務的，他都採取着一種同情的態度，且多暗助。他對孫中山史堅如推崇備至，孽海花作者之傾向革命，傾向共和，在這些地方，是更易於看到。孽海花不比當時秘密發行的文學作品，是公開發賣的，在清室的淫威之下，作如此描寫，作者之思想膽識，也就可見了，胡適因其間含有一二迷信要點，便以之論斷全書，說作者是『老新黨』真是奇突之論。」

其實此書在寫作方法上當然免不了有缺點，那就是在若干部份，還不能完全的使政治與社會的事態與書中的人物，建立一種不可分離的關係：但在描寫上的最大成功，是在描寫當時京城內外的一班知識份子，官僚與名士，他們的生活，思想，以至於一般的風氣轉移。曾孟樸則活生生的刻畫出許多「作態名士」，極是生動，孽海花在這一方面是擅長的。大概由於名士大官達人要裝點風雅，這風氣在當時就很盛。真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了。

關於孽海花，原有許多掌故可談，據說清末孽海花中輟後，初有續作二種：一為碧血幕（小說林）和新孽海花等書印行。均係信口胡謔，不值一顧。「新孽海花」為青浦陸士諤所著，（改良小說社，一九一〇），情節雜湊，文筆庸陋，與原書立意完全扞格，都已自行消滅。包天笑著的碧血幕（小說林）未完卷，後復有燕谷老人著續孽海花，瞿兌之校訂，由真美善書店出版，著軼與曾著相侔，取材亦富，值得介紹。

燕谷老人即海虞張鴻，字隱南，與曾孟樸同是常熟世家，且以同科發跡，久官郎署，熟悉清京掌故，曾氏晚年，曾以續孽海花委託，可見他老人家續著此書是很夠資格的。

「續孽海花」，雖貫串脈絡，仍不能踵武曾氏，要其穿插時事，記錄晚清故事，有裨國史，不能不謂精心傑作。張氏續書由三十一回起至六十回止，與金松岑曾孟樸預定的全目數量相符，但所敘事實，僅止於庚子事變，與他在楔子內所舉舊鑒以後及辛亥革命情形，都沒有寫出，書成於民國三十二年，初在中和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刊起，每期刊一回，連年刊載，未刊完而張氏則於壬午年一月間病逝，身後始出單行本，續書每遜原著，張氏此作，因亦當爲苛論也。

續孽海花，最大的貢獻就是搜羅許多史料能記人不知，詳人所未詳，所著可補正官書的缺陷，其牝牡飄黃以外，別饒佳境，張氏以七十高齡，在烽火連天中成此巨帙，實難能可貴。

唯曾氏著孽海花一書，原甚自喜，入民國後，續有所作，並對舊作加以修改，前成二十四回，後續寫十一回，共三十五回，全印本則止於三十回，其下五回，僅見於當年的真美善雜誌。孽海花刊完後，續發表魯男子，全書三十萬言，雖亦爲曾氏之巨著，似不及孽海花著名。

一九二九年，我曾因介紹暹馬文學作品於真美善雜誌，往曾氏滬寓法界馬司南路奉訪，惜曾氏父子因事外出，致未及一晤，遂將稿件留下，事後因人事更迭，南返後更無從請益。據孟樸先生說，他四十歲始學法文，五十多歲，居然能夠譯介法國文學名著，如囂俄全集等，均在真美善書店陸續刊行。

曾氏父子所創真美善書店在當年的出版界，別樹一幟，

所出書籍，均爲好書，似無門戶之見，甚至當年張若谷編輯女作家專集曾遭各方所詬病，該書亦祇有眞美善書店才敢出版。

孟樸先生生於一八七一年，卒於一九三六年。享年六十有五。

其子曾虛白，於抗戰前曾在滬創大晚報，一紙風行，人手一份。據一九五七年十二月間報載，最近任職美國奧立根大學教授九年之東方語言學教授魏利司，精通中、英、法、德、日、西班牙及冰島語文，擬翻譯「孽海花」一書。

張競生開美的書店

不久以前在西書店偶然看到了那部精裝燙金字的美國金賽博士的鉅著「男子的性行爲」，不禁使我想起張競生博士來。

我記得是在一九二八年的秋季開學後，暨南文藝研究會要邀請名人演講，規定每月一人，最初是請胡適博士，接着便請張競生博士，那次受命前往邀請的，一共是三個代表，我也忝居一席，我們原本不知道張競生的寓所是在法租界的，於是便相約到上海四馬路美的書店去拜訪他，那知到了美的書店，招待我們的是一個講着廣東國語的經理；我們把來意告訴他之後，他才告訴我們，張競生並不住在店裏，他的寓所是在法界薩坡賽路，接着他還看了看牆頭上的掛鐘，告訴我們可以在店裏稍候一陣，他今天來過電話說就要到店裏來了。於是我們就自由自在地翻閱書架上的新書。我當時還選購了一套彭兆良譯述葛理士的性學小叢書。

我們和他見面，正是他在上海四馬路青蓮閣附近創辦美的書店，出版「新文化月刊」，出版「美的人生觀」和「第

三種水」等書，還介紹了英國葛理士那部性心理學的時期。那時美的書店在不大講究佈置的新書店陣容中，的確算得是一間名符其實的「美的書店」；它不但佈置得新穎，美化，就是所出的書籍，也另有一種風格，封面尤喜採用英國薄命畫家皮亞斯侶的插繪，使人愛不釋手；而且還打破了中國商店的傳統，在上海破天荒聘用年輕女店員，後來這種風氣才跟着慢慢傳開去，繼而創造社開辦的「上海咖啡」，才聘用了女招待，但却不像美的書店的女店員那麼一本正經，那麼有規有矩，雖然當年魯迅就曾嘲笑過，說是有顧客到美的書店去，對女店員調侃，語氣意義雖涉雙關，但女店員却規規矩矩若無其事地照實回答。

張競生開辦的美的書店，生意雖旺，但是官司却打了十多次，成為當年上海報紙上的頭條新聞；每次開庭，報紙上總是務求詳盡連篇累牘地大事渲染，張競生的名氣能夠那麼響亮，那麼家喻戶曉，這未嘗不是一個原因。我們在那裏等了不久功夫，張競生果然從外面進來了，他的個子並不昂長，只是很壯碩，跑路也是雄糾糾的，有點像歐州人那種高視闊步的神氣。大概四十多歲的樣子，紅光滿面，神采斐然。

當下那個廣東經理給我們一一介紹，他隨即很客氣地招呼我們隨意坐下，不必拘禮，他顯得很爽快，我們把邀請他到暨大去作專題演講的來意向他說明了後。他立刻答應了，「但是我講什麼好呢？」他說。

「隨先生的方便！」我說，「題目倒不妨留到下星期演講時才公佈吧！」

他連聲稱善，說，「這樣也好，這樣也好，反正我現在還想不出要講什麼好！」

我們還告訴他，我們很喜歡讀他主編的新文化月刊，他點點頭。我還問他，他編的性史二集，性藝等書，爲什麼不在美的書店出版。

他告訴我們，那些都是一些下流胚子冒用他的名字亂搞的東西，並不是他編的，他說着還慨嘆他的著述想不到會得到這樣相反的影響。

我們告辭出來以後，回到暨南大學便立刻出通告，說是張競生博士定於本月×日星期六下午三時到校演講，希望同學踴躍出席，講題却沒有寫出來，立刻引起同學們廣大的歡迎，大家都在熱烈地期待張博士的到來。

那時暨大的大禮堂致遠堂還未落成，集會都是假座大膳廳舉行的；好容易等到張競生博士到校演講的那天，午飯過後，同學們果然踴躍出席，大膳廳已經被同學們層層密密圍住，簡直是圍得水洩不通，可見當時同學是如何地渴望一瞻張競生博士的丰采。我雖然是一個跟張博士接洽來演講的主持人之一，但那天我却因爲擠不進膳廳去，所以沒有辦法聽得他的名言讜論，還是事後聽同學說，才知道那天他演講的好像是「青年與讀書」之類的題目，有些同學還失望地說：「我以爲他是講性學的，早知如此，我也犯不着擠得一身臭汗，罰站了那麼久，聽他的演講了。」

現在提起張競生這個名字，恐怕今日的青年人，很少知道他到底是誰？但在四五十歲的讀者羣中，我相信沒有人不知道他的，他當年因爲編了一部「性史」而竟告名滿天下，大家都挖苦他是「性學博士」，其實他並不是什麼「性學博士」，他是在民元到法國的老留學生，在巴黎大學研究哲學，他所考取的學位，却是哲學博士，他回國後任北大教授，最初在北京晨報上發表了「愛情定則」，主張：愛情是有條

件的，是比較的，可變遷的，夫妻爲朋友的一種。在三四十年前封建氣息濃厚的中國社會，他發表這種主張，簡直是被視爲惑衆的妖言，立刻遭到幾百個讀者無情的圍攻，在報上鬧了個多月，雖然有識之士深表同情，周作人先生當年還寫了一篇文章替他辯護，但還是消弭不了這些譴責。

張競生博士編的那部「性史」，雖然使他名噪一時，其實他這部名著在今天看起來，却是卑之無甚高論，沒有什麼意思的東西，不過在當年却幾乎瘋魔了每一個青年讀者，尤其是那篇署名小江平的文章，簡直是最膾炙人口的東西。董二嫂也就成了讀者有口皆碑的人物，那篇文章的體裁是自述偷嫂的經歷，那位小江平寫的文章，在文化圈子當中，後來大家都知道是出自法國留學生金滿成的手筆。不過是一篇對性愛寫得比較露骨的小說吧了。

· 丙 編 ·

雨巷詩人

現在四十歲上下喜歡涉獵文藝的人，大概很少不知道戴望舒其人，也很少沒有讀過他那首膾炙人口的成名詩作「雨巷」的。他因為「雨巷」成名，而致被人稱為「雨巷詩人」，可是這位詩人遠在一九五零年便去世了。在他離開這個苦惱人世之前，他一生所過的，可以說是沒有歡樂的人生。

我認識戴望舒，還是在暨南做學生的時代，讀了他當年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那篇「雨巷」，頗心儀其人，劉呐鷗創辦的水沫書店刊行「新文藝」月刊，和以後施蛰存主編的「現代」上，也陸續發表了他不少的詩作，可是似乎都比不上那首「雨巷」的膾炙人口。這首詩一直到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還能夠朗朗上口，念得出來，我相信目前有許多文藝青年或者多不知道這首名詩是怎樣的，特為錄出：

「撐着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
有
丁香一樣的顏色。
丁香一樣的芬芳，

丁香一樣的憂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徬徨；

她彷徨在這寂寥的雨巷，
撐着油雨傘
像我一樣，
像我一樣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淒清，又惆悵。

她靜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飄過
像夢一般地，
像夢一般地淒婉迷茫。

像夢中飄過
一枝丁香地，
像我身旁飄過這女郎；
她靜默地遠了，遠了，
到了頽圯的籬牆，
走盡這雨巷。

在雨的哀曲裡，
消了她的顏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她丁香般的惆悵。

撐着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飄過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着愁怨的姑娘。」

記得那是在一九二九年的一個星期六下午，戴望舒的第一部詩集「我的記憶」在水沫書店出版了，我從真茹到上海逛書店，順便逛到水沫書店去買這部詩集，就在那裏意外地認識了望舒。

那天我選購的書，計有劉呐鷗譯的日本新感覺派的小說集「色情文化」，他自己寫的「都市風景線」和戴望舒的「我的記憶」，此外還有好幾本代售的文藝雜誌。

當我翻開「我的記憶」在仔細看「目錄」的時候，一個穿着嗶嘰西裝的二十多歲滿臉麻子的人走前來，態度很安詳地問我：「你是在那一間大學念書的？念文學麼？」

我當即被驚覺了，雖然覺得這個人有點冒失，但却覺得這個人並沒有惡意，也就坦然地告訴他。當時我不過是個十八九歲的學生，正是一個喜歡讀詩歌寫抒情詩的文藝青年。

「你喜歡這個作者的詩麼？」他說着指指我手中那本淡紫色封面圖案很精緻的詩集。

「是的，我讀過他不少的詩篇，我頂喜歡他那一首『雨巷』和『林下小語』。」我說。

「這部詩集收輯了他發表過的詩篇不少，大概你會感到滿意的。」他不憚煩地說。

「你也喜歡他的詩麼？」我說。

「這個作者你認識嗎？」他說。

「不，」我說，「沒有見過。我只約畧知道他是震旦大學出身的，法文根底很好的詩人。」

「你喜歡李金髮的詩麼？」他突然這樣轉口問我。

「我看不懂他的詩，他的『食客與凶年』，『微雨』我不懂得好處在那裏，大概好處就在看不懂，因此我不喜歡他的詩。」我說，「他寫的詩是那麼晦澀，使人不容易懂，我有幾個同學，和他是同鄉，據他們說，李金髮寫的詩，連李金髮自己也不懂的。如果人人都看得懂了，就容易看出高低來，人人都看不懂，那纔莫測高深，誰也不敢枉評一句，說他的詩寫得不好了。」

他聽了哈哈地笑了一陣。

「那末這個人寫的詩就很容易看得出好壞了。」他說着又指指「我的記憶」。

「這個人的詩，是取法象徵派的，但注重整齊的音節，教人可以看得懂。」我說出了我的意見。

「你寫作麼？」他問我。

「課餘時間偶然也學寫一點，」我說。

「你喜歡寫什麼？小說？詩歌？」

「什麼都寫，詩歌也喜歡寫一點，」我說，「不過寫詩不容易，沒有靈感就寫不出來。」

「都在雜誌上發表麼？」他說。

「是的，申報，語絲，青春月刊等都經常投稿。」我坦率地說。

「好極了，你的作品署的什麼名字？」他說。

「那倒不一定，差不多一篇就署一個筆名，發表了也就算了。」我說。

這時他便向我請教姓名。我告訴了他，而他却没有告訴我，祇是從那一疊放在書架上的「我的記憶」的書堆裏，抽取了一冊，給我簽了他那個響亮的名字，說是贈給我的，叫我用不着化錢買了。這時我纔知道他原來就是戴望舒。可是我却有點失望，對於這個「雨巷詩人」，在我的腦海中一定是和他的詩篇一樣有色有美的，却没有想到是個生着滿臉麻子的人。

後來我聽說，他這時期追求施蛰存的妹妹施絳年不遂，而正在改變方向追求以「南北極」一篇小說名噪一時的穆時英的妹妹穆麗娟。這些詩就是爲了謳歌戀愛而寫的詩篇。畢竟皇天不負苦心人，他和穆麗娟終於成了眷屬，可是却不是幸福的，因此而使這位「雨巷詩人」過了一生沒有歡樂的日子，以後變成了鬱鬱寡歡沈默無言。

一九四〇年冬，住在上海極思非南路卅三號的穆時英，突然遇刺殞命，麗娟帶了五歲的朵朵從香港趕到上海去料理喪事，據說離港前望舒夫婦還吵了一場大架，因爲望舒不願意她返滬。麗娟在上海的期間，認識了一個大學生朱，他們竟互相熱戀。

一九四一年春，我從報上才知道他在香港星島日報編副刊。那時他曾經爲了家庭和妻子服過一次毒，他給他的妻子的遺書寫道：「從我們有理由必須結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預見這個婚姻會讓我們帶來沒有完的煩惱。但是我一直在想，

或許你將來會愛我的，現在幻想毀滅了，我選擇了死。離婚的要求，我拒絕，因為朵朵已經五歲了，我們不能讓孩子苦惱，因此我用死來解決我們間的問題，它和離婚一樣，使你得到解放。」

遺書裏面提到的朵朵，就是望舒的長女，那時纔五歲左右，後來叫作詠素，現在應該是一個亭亭玉立的廿多歲的年青女郎了。當時這封遺書，和他的服毒，始終沒有感動過留在上海的穆麗娟。她給戴的回信却寫道：「六年前，和今天一樣，你也曾經自殺過，當時我答應你的要求，因此我們結婚了，今天我將堅持自己的主張，我一定要離婚，因為像你自己所說的那樣，我自始就沒有愛過你！……」以後望舒趕到上海去，並不能拆散這一對誓同生死的大情人，最後望舒拜訪朱的衛道的父親，老人家雖然答應驅逐這個壞兒子，但也警告望舒，必須好好地管束自己的妻子。

結果這個羅密歐的朱離開上海，輾轉到大別山跟日軍火拚去了。麗娟却没有和望舒見面。當年李士羣要望舒參加敵僞的工作，說：「保證穆麗娟回到你身邊。」他堅決地說：「我還是不能那樣做。」就這樣地拒絕了。結果呢，直到香港淪陷，他們的關係纔那麼解決了。於一九四二年秋和宇宙風的編者某氏結了婚。

一九四四年六月間，望舒在香港渡着悠長而寂寞的歲月，思念他的妻子，也苦念那個從小跟着母親在一起的，始終缺乏一種完整的家庭的溫暖的女兒。他寫了一篇題名「示長女」的詩篇。這首詩並不是頂好的，而感情却是那麼親切。

「記得那些幸福的日子！

女兒，記在你幼小的心靈：

你童年點綴着海鳥的彩翎，

貝殼的珠色，潮汐的清音，
山嵐的蒼翠，繁花的繡錦，
和愛你的父母的溫存。

我們會有一個安樂的家，
環繞着淙淙的泉水聲，
冬天曝着太陽，夏天籠着清蔭，
白天有朋友，晚上有恬靜。

歲月在窗外流，不來打攪，
屋裏終年長駐的歡欣，
如果人家窺見我們在燈下談笑！
就會覺得單爲了這也值得過人生。

我們會有一個臨海的園子，
牠給我們滋養的番茄和金筍
你爸爸讀倦了書去墾地，
你媽媽在太陽陰裡縫紉，
你呢，你在草地上追彩蝶，
然後在溫柔的懷裡尋溫柔的夢境。

人人說我們最快活，
也許因爲我們生活過得蠢，
也許因爲你媽媽溫柔又美麗，
也許因爲你爸爸詩句最清新。

可是，女兒，這幸福是短暫的，

一刹那都被雲銷煙埋，
 你記得我們的小園臨大海，
 從那裡你們一去就不再回來。
 從此我對着那迢遙的天涯，
 松樹下徘徊到暮靄。

那些絢爛的日子，像彩蝶，
 現在枉費你摸索追尋，
 我彷彿看見你從這間房，
 到那間，用小手揮逐陰影，
 然後，緬想着天外的母親，
 把疲倦的頭攔在小小的繡枕。
 可是，記着那些幸福的日子，
 女兒，記在你幼小的心靈：
 你爸爸仍舊會來，像往日，
 守護你的夢，守護你的醒。」

一九四六年勝利後，望舒重返上海，他已經和另外一個女人結了婚，和穆麗娟補辦了離婚手續。可是望舒第二次的結婚，也並不幸福，年青的妻却是一個不大有教養的落後的女人。因此給望舒帶來了更大和更多的苦惱。一九四八年冬終於還是分了手，各奔前程。望舒到了北平，第二年春天的二月廿八日，因了宿疾哮喘病的復發，死在協和醫院裏。他生前說過：「不要替自己辯護，時間長了，別人自然會瞭解你。」這無異是他的自白。

這個對於中國新詩運動有過不少貢獻的雨巷詩人，就這樣地結束了他的沒有歡樂的一生。

邵洵美金屋藏嬌

記得是在一九二九年春的某一天下午，我閒着無聊，忽發奇想，獨自一個沿着上海靜安寺路無目的地隨意跑去，跑過了哈同花園不遠，一間牆壁髹漆着金黃色的，櫺窗佈置得很雅緻的書店陡的出現在眼前，抬頭望了望門楣上的牌匾，赫然有着四個黑色光澤燦然的長宋字，纔知道原來是「金屋書店」。在當時金屋書店出版的書籍，最精緻也最講究，書頁不是用古雅的米黃色的書紙，就是用粗面的重磅厚道林紙，雖則是薄薄的一本三四十頁的小書，看起來，却顯得又厚又可愛，封面又是在芸芸的出版物當中，別出心裁，使愛書家常常不忍釋手，因為書籍的品貌既然如此不凡，那麼書價也就貴得非常可觀；在當年的出版物當中，除創造社的書價較貴之外，要算金屋書店的書價最昂。我那時雖則是個窮學生，但並不吝嗇幾個買書錢，金屋書店出版的書籍，除了「金屋月刊」之外，幾乎全部都買齊，它的書籍，封面也最奇特，如滕固的一本短篇小說集「平凡的死」，就是一張黑封面畫上一口大紅棺材，四個白文的書名，這部小說之所以不會暢銷，就是那張封面嚇人。此外還有一本邵洵美的文藝論集，叫做「火與肉」的，封面用的是大紅紙，中間貼上一張小方形的金色紙，上畫有作者寥寥幾筆的畫相，既沒有書名，也沒有作者的名字，我當時覺得很新穎，也很夠刺激，因此從那天開始便愛上了「金屋書店」出版的書籍。那天，我記得買到邵洵美的「一朵朵的玫瑰」譯詩集，是英國詩人彭司的名作，和沈端先譯的廚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記」等七八本書，連一向不大注意的「金屋月刊」也一一搜購齊全，就在那當兒，一個穿着皮袍子的中年人，從外面安詳地

踱了進來，在他的瘦臉上顯得有點蒼白，好像剛從床上起來患貧血症的人的那種臉色，他的清秀而蒼白的臉上，最使你覺得觸目的，便是他下頷的那幾根疏稀的山羊鬍鬚，和他那個高聳的希臘人特有的鼻子，我一見到他，就使我想起那本「火與肉」封面上的作者素描，他就是那張素描的模特兒，他的舉止很瀟灑，尾隨着他進來的，剛巧是我認識的一個朋友，那個朋友看到我，立刻向我招呼起來，據他說是剛陪邵洵美跑西書店，順便趖到這裏來看看，說着他還給我介紹邵洵美。看到他那副形容，你決不會不想到「詩人」這個字眼的。寒暄一番之後，他就問我買了一大包什麼書？我告訴他，其中有二本是他的「火與肉」和「一朵朵的玫瑰」。

「這兩本書還可以看看的，可惜你買了，不然我可以送你的。」他說：「你覺得我們的書有什麼不好？」

「漂亮，講究，」我說，「愛書家一定會當作奇貨呢。」

「所以咯，金屋所藏的，就是這些『嬌』呢。」他慢條斯理地說。說得大家笑了一陣。

當我們告辭的時候，他還頻頻地說着「忙什麼，忙什麼」，彷彿是相熟了許久的朋友一樣。

那年初夏，我在西藏路寧波同鄉會舉行的一個藝術展覽會上，又碰到了邵洵美。那天參觀的人很多，他穿着一套米黃色的紡綢長衫，腳上穿着一雙黑布鞋，站在江小鵬爲他彫塑的半身石膏像前，在和朋友周旋，江小鵬先生也在場，邵洵美問我這座塑像是誰？我告訴了他說，「塑得太像了，跟你簡直一模一樣！」

「你說錯了，」他說，「你應該說牠會比我活得更長久呢。你不會反對這說法吧？」

「我不以爲然！」我說。

「你這話是怎麼說的？」他說著露出一點驚訝的神色，看了江小鷄一眼。

「這座塑像是藝術的傑作，它的生命應該是永久的，但是難保不出意外，摔在地上碎了，不就完了麼？」我說。

「你的想法也很幽默，」他說，「不過，這種意外倒不是江小鷄和我願意有的」。說得大家又是一種會心的微笑。

後來他問我還有沒有常去「金屋」，我說因為路途太遠了，來去不便當，所以不常去。

他說，金屋最近出了一本章克標的「銀蛇」。他告訴我，「銀蛇」的內容是描寫郁達夫追求王映霞，章克標失戀的故事，憑這個故事，就值得我去跑一趟遠路的。

他就是那麼有風趣的人。

後來我回到馬來亞，不久他創辦了「論語」，並且還和溫寧源、林語堂辦過一本英文月刊「天下」，「天下」真是一本有分量的刊物。美國作家項美麗到上海時，跟他搞得很好，艷事也不少，外間自然也有不少蜚短流長的謠言，文化圈子裏的朋友大家都知道。項美麗寫的「Steps of the Sun」，書中主人公隱約還是他的影子。

我記得他在「論語」上寫過一篇文章談到「璜在中國」的作者林克萊脫（Eric Linklater），其中有幾句話寫得很得體，他說，「他誠懇又爽直，不喜歡說希望人家一定笑的笑話，不多談自己的成就，不想講淺薄的警句，對於他所討厭的東西沒有絲毫的惡意。」這幾句話，簡直可以移作他自己的描繪，邵洵美的生活簡直與「紅樓夢」所描繪的大觀園裏的生活無異。他的家也無異文人藝術家談藝論學的沙龍，客來客往，川流不息，乘興而來，興盡即返，毫無俗套，亦無拘束。他原來是在英國牛津大學學文學的，回到上海以後，

便以「天堂與五月」一部詩集出現於中國文壇，一九三零年秋創辦時代印刷廠，創刊第一本幽默雜誌「論語」，由林語堂主編，這已是在金屋書店結束以後的事。一九三五年抗戰時期，「論語」主編先後由陶亢德林達祖負責，他也是第一個在中國採用影寫版出版七色版的時代畫報的人；滬戰時，「論語」和「時代畫報」則由邵洵美自己主編。一九三九年邵洵美自己主編「論語」，每期撰寫的「編輯隨筆」，評論時事，非常精警叫座。同時還創辦了詩歌月刊出版社專出版新詩集，他抽鴉片，太太是晚清名臣盛宣懷的孫女，魯迅會嘲笑他是文壇富翁，並不言過其實。

他有一首詩題爲「女人」的，寫得很美，我依稀還記得：

「我敬重你，女人，我敬重你正像

我敬重一首唐人的小詩——

你用溫潤的平聲，乾脆的仄聲，

細縛住我的一句一字。

× × × ×

我疑心你，女人，我疑你正像

我疑你一彎燦爛的天虹——

我不知道你的臉紅是爲了我，

還是爲了另一個熱夢。」

他在當年的中國文壇之所以被稱爲唯美派，可見也並不是毫無理由的。

記得他在「文藝畫報」上有一篇談赫理斯的傑作「我的生活與戀愛」的文章，才知道他藏有這部珍本書；我立刻去信給他，託他代爲尋找這部書時，他來信告訴我，「這部奇書我所知道的，上海現存三部，一部最近給一個美國富商購

去，一部爲我所購藏，法租界霞飛路的 L. E. O. 書店還存有一部。你不妨去信碰碰運氣，定價每冊約二百法郎（共四冊）可購得」云云。等到我去了信，才知道珍本的「我的生活與戀愛」已給一個美國行商購去，現在還能購得的是法國翻版的平裝本，售價二百法郎共四大冊，當我每次讀到這一部奇書時，實在不能不想起邵洵美。

蔣光慈印象

記得是在一九二九年春夏之交的時候，我爲了「檳榔月刊」的編輯工作，致時常在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後面的一條短街裏的現代書局編輯所進出，在那條短短的不滿百碼的短街裏，時常總不免會碰到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漢子，頭戴一頂陳舊的濶邊氈帽，那頂氈帽低低地幾乎壓近眉稜上，他的面目雖然還相當清秀，兩隻眼睛却炯炯有光，老對着向他迎面而來的人，放着警戒性的光芒。他的兩手，分插在大氅的兩隻袋裏，那件大氅跟他的帽子一樣陳舊；不但陳舊，而且似乎有些地方還發着油光的樣子，顯然是有些地方的絨毛早已脫剝落了，但是他那副神氣，却帶着了濃重的紳士氣派。因爲彼此互相照面的次數多了，有時，不知不覺地，自自然然地無意識地點點頭，打了招呼。老實說，我幾次想向編輯所裏的人探問一下，却老是爲了一些瑣屑的事，而往往把疑問忘得一乾二淨了。那時現代書局編輯所裏的人，彼此能有碰面的機會的實在不多，而最常看到的，便是後來到北平調查業務死在那裏的老闆洪雪帆先生和經理盧芳先生，畫封面的畫家鄭人仄兄，有時也偶然會碰見了郁達夫和滿臉都是鬍鬚根的楊邨人。有一次，我又照例送稿到現代書局編輯所，正要告辭出來的時候，這個時常碰面而不相識的人，居然進

到編輯所的二樓來了。

他一進來，對甚麼人也不打招呼，似乎是對於所內的任何一個人都很熟悉似的，東站站西站站，有時凝然地聽着人家在談話，從那神氣看來，似乎是看到我這個陌生人，便裝着不說話的神氣，我彷彿覺得他的銳利的眼光不時在打量我，彷彿要想知道我到底是甚麼人，大概因為我當時的衣著相當的整齊和講究，完全不像那些不修邊幅的文藝青年的緣故。那天他始終沒有跟我搭訕，他匆匆地從一張堆滿了校樣的桌子上尋出了一束校樣，看了看，便塞進大氅的袋子裏，昂然地離開了編輯所。

他走了以後，我私下裏向正在畫着封面畫的人仄兄打聽他是誰。人仄兄却一壁畫畫，一壁放低了聲音告訴我，他是「新流」月刊的編者，他還告訴我說，這人脾氣古怪，不大愛理會別人。常常來了話也不說一句，拿了「新流」的一部份校樣便寂然地走了；有時他碰到老板，纔會跟老板搭訕幾句，否則他可坐上老半天，默然地不說一句話的。

他說完了，還問我要不要跟他認識？他願意給我介紹，當時我支吾地沒有表示。其實，啞子吃湯圓，自己肚子裏有數。原來這位「新流月刊」的編輯就是蔣光慈。當他脫離了創造社和錢杏邨等幾個文藝青年組織太陽社，在北四川路創辦太陽書店的時候，刊行了「太陽月刊」，猛力地提倡大眾文學，語絲社的朋友就會和蔣光慈這一夥人，開了不小的玩笑。記得當時還是錢杏邨開的霧，他那時也不過是十八九歲的青年，寫了一篇批評，題目是「死去了的阿Q時代」，把魯迅攻擊得體無完膚，語絲社的一批朋友，那時正跟創造社開火，後來才轉到太陽社這一批作家的身上，尤其是那時又碰巧蔣光慈改了名字，由蔣光赤改成了蔣光慈，語絲上的大

大大小小的文章，也就毫不留情地，對這位畏首畏尾的作家施予猛烈的反擊。那時我還未見過蔣光慈，但對於喝「上海咖啡」，而提倡大眾文學的創造社諸公，對於描寫無知無識的人，而滿口都是大學教授的文縷縷語氣的小說，實在看不入眼，於是也就在語絲上參加了筆戰，因此，鄭人仄兄的答允介紹，我始終支吾地沒有什麼表示，也就是這個原故。

我對於蔣光慈的小說的注意，說起來，還是一九二六年春間在廣州讀了他在創造月刊上發表的那篇力作「鴨綠江上」才開始注意起來的，接着先後便搜讀了他的「少年飄泊者」，「紀念碑」，「野祭」等書，到後來，讀到「菊芬」，便大失所望了，從此也就不再購讀他的小說，等到他後來發表的那些「最後的微笑」，「麗莎的哀怨」，簡直有鼓不起興趣閱讀的感覺。等到我和他見面的時候，也就已經完全失去了一個讀者對作家應有的那份仰慕和尊敬的心情。雖然那時他出版的小說竟致一年內重版了六七次，而我却連看一看的興趣都沒有。

後來，我聽到人仄兄說，他上日本去了，他和吳似鴻結婚了，於是再也不會在那條短街裏見到他。也不會在現代書局的編輯所樓上碰到他了。

有一次，當我到現代書局編輯所去交涉一部稿子的出版的時候，光慈出于大家意料之外地飄然地來了。這次他那張瘦長的臉上，那隻大鼻子的鼻樑上，戴上了一副細邊的近視眼鏡，我才知道他原來是近視的，而出外却老是將眼鏡收藏起來。

這天他似乎很高興，說的話也很多，他把挾帶了的一部稿子放在桌上，封面寫着那矯健的鋼筆字：「異邦與故國」，他說他上日本去，纔產生了這一部日記。洪雪帆還為

我們介紹認識了。

「我們從前是時常碰面的」，他用着那帶安徽口音的普通話坦然「只是不相識吧了。」

「我久仰了，我讀過你的『鴨綠江上』，『少年飄泊者』，印象都很好，只是後來讀到你的『菊芬』和『麗莎的哀怨』，却把我的好印象粉碎了。」

「你喜歡讀普希金麼？」他說。

「他的『甲必丹之女』我讀過的，」我說，「他的幾篇短篇小說也讀過的。」

「普希金，生前人家對他不了解，」他慨嘆地說，「他死後，讀者纔了解他呢，我想我的命運也是跟普希金一樣的！」

他的口氣倒不小，我心裏這麼想，他不自負爲莎士比亞，或者巴爾扎克，左拉，總算是客氣的吧？

「我從前跟你開過玩笑的哩。」我說。

「在甚麼地方？」他焦急地說。

「語絲上的那位辛木就是我。」我坦然地告訴他。「說起來，真是抱歉！」

「我們真是不打不相識呢。」他勉強地笑着說，「老實說，你的文章雖然抓到了我的癢處，但是還不過癮。」

從他的那種不遜的口氣，實在使我覺得有點那個，雖說那天還談了不少閒話，但我對他那種空想的不切實的大衆生活的描寫，實在不敢恭維；雖則那時他剛在北新書局出版的「衝出雲圍的月亮」正是一紙風行的時候，我却沒有細讀。因此當他問我有沒有讀到這部小說的時候，我也不遜地說，「對不起！我還沒有讀這部書的心情。」

從那次以後，我和他也就不再會面了。這期間他編輯

雜誌，出版了不少的譯著，但都吸引不了我的注意。後來，直到我看到「大風」雜誌上吳似鴻寫的一篇文章，纔知道蔣光慈已于一九三一年五月進上海同仁醫院醫治腸結核，六月三十日逝世了，享年纔三十歲。

據吳似鴻的文章有這麼一段描寫，「光慈的爲人，和他的思想完全相反，是很守舊的，他的理想中的女性，是一個具有良妻賢母的資格，能料理家務，終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閨房裏伴他著書的女性。這，我却辦不到，因此在他的晚年，每有和我意見相左的地方。」從這一段簡單的描寫，也不難想像蔣光慈的爲人了。

與豐子愷的「緣」

記得我在中學讀書時期，最喜歡閱讀的雜誌，除「創造月刊」，「學燈」和「覺悟」的合訂本之外，便是「文學週報」和「一般」。尤其是「文學週報」，更是愛不釋手，初出版時，是一張半開的小報型的週刊，疊摺起來，就像一本卅二開的版式的薄薄的刊物，後來出了二卷，纔改成卅二開的裝訂本的小冊子，它最吸引我的，便是經常刊登的「子愷漫畫」，作者署名TK兩個英文字母，也就是豐子愷先生的英文名的另一寫法。子愷的漫畫，別創一格，簡簡單單的幾筆，畫得有聲有色，輕鬆雋永，猶爲餘事，像「無言獨上西樓」，「燕歸人未歸」，「翠拂行人首」，「花生米不滿足」等幅，畫中情景，實在令人不容易忘記。我喜歡那些漫畫。我常常爲了欣賞一幅漫畫而悠然神往。老實說，我之所以不憚煩地按期購閱「文學週報」，也只是爲了「子愷漫畫」。後來「一般」出版了，豐子愷先生的漫畫和散文也陸續在這一風格別緻的雜誌上發表，於是我又多添了一種麻

煩，按期搜購「一般」；爲的是對於「子愷漫畫」之外，又爲的是耽讀他的散文。於是我成了「文學週報」和「一般」的長期讀者，一直到這二個刊物停止了纔終止。後來豐子愷先生的漫畫集和他的散文結集，差不多成了我書案上不可或缺的讀物，甚至他那些關於藝術和音樂的理論譯著，我都一一購讀，因此對於這方面的常識，使我無形中增加了不少。我可以說是豐子愷的讀者，就是到現在，自己脫離了學生生活廿多年，空閒時還是喜歡反復披閱他的作品。他的文章和他的漫畫一樣，順手拈來都有妙趣。他的漫畫，只消寥寥幾筆，就可以表現了世態的一角。他的散文也是這樣，如「大賬簿」，「樓板」，「剪網」和「嗑瓜子」等都是，同時也可以令人看出他獨具慧眼，別有匠心，刻劃世間的一切衆生相。由於我對於豐子愷先生的作品的愛好，心儀其人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說起來，不禁使我想起了卅多年前關於他的一段往事來。

那是一九二九年秋，那時出版界出版的新書很流行豐子愷先生裝幀的封面，上海世界文藝出版社，接受我的詩集「夢囈」的出版，也希望我最好能夠找到豐子愷先生的一幅封面，因此，我特地在一個星期六下午趕到江灣立達學園去找了一位認識豐先生的同學陪同去訪問。那天，豐先生剛巧到上海去了，沒有見着，只得悵然留下一張便條，把來意也順便簡畧地寫上了，並且還託那位同學把我的來意親自面達一番，結果第三天，我在暨南接到那個同學的來信，纔知道豐先生已一口答應給我畫封面，畫好了就立刻寄來，不必我爲了一幅畫而跋涉長途，特意抽暇從真茹迢迢地跑到江灣去；如果有空閒的話，倒不妨去玩玩的，豐先生也很歡迎我的過訪。就在那一個星期日，我特意提早趕到江灣去；找到那個

同學，一道去訪問豐子愷先生。

豐先生那時住在立達學園附近的一間一樓一底的平房，也就是他的文章常常提到的江灣緣緣堂，那座房子並不講究，佈置得很脫俗，質樸中使人感到美化，只是我從豐先生的隨筆體味過那種情趣，因此一到，便覺得一點不陌生。那時豐先生也不過三十多歲，沒有留鬍子，談風很健，而且說話雋永有風趣，使人有着說不出的親切之感。

他聽了我的來意後，立刻從抽屜裏取出那一張據說剛畫好的封面畫交給我，問我喜不喜歡，如果不喜歡，他可以重畫。我接過那一幅畫一看，原來畫面上畫了一個大紅心，中間有四根絃線，大紅心後畫有一男一女分站左右，用手撥弄心弦，還有幾隻蝴蝶在心弦上面飛舞。在畫面的下右角還署了TK兩個英文字母。書名則另用一張白紙橫寫了「夢嚙」兩個字。他告訴我把封面套色印較好，如果那兩個字認為寫得不好，也可以改用鉛字印的。豐先生總是那麼謙遜，那麼客氣。在那時的我，以為只要求得豐先生一張畫也就心滿意足了。他還指指點點地對我說，那些地方應該套印什麼顏色，什麼地方應該不套色，不憚煩地一一指點，唯恐印得不美，而且說得非常仔細，非常鄭重。我呢，只是一味唯唯稱是，高興得連話也不會說。

辭別了他的緣緣堂之後，我趕到上海，立刻把這張封面送到四川路底的世界文藝出版社去。然後纔回到真茹。可是後來詩集出版的廣告在報上登出來之後，纔知道書名已經被改掉了一個俗不可耐的名字，我立刻趕到出版社去，才知道那張豐先生畫的封面並沒有採用，據那些市儈說，「夢嚙」這書名並不容易吸引讀者，市儈畢竟是市儈，除了看在錢面孔上，甚麼也不管的。我一氣之下，立刻把那張封面畫取了

回來，並且給豐先生去了信，說了許多抱歉的話，並且還把我保留那張封面的意思告訴他，說是我希望出第二本詩集的時候，一定要把他用上。所以把原畫保留了下來，沒有再寄回給他了。據說，豐先生並不珍惜自己的作品，而且非常願意慨贈友好，他沒有把作品藏之名山的想法，他認為最好的藝術作品，應該得到很好的流通，應該公諸同好。他是一個不驕傲，不自滿的藝術工作者。他從來作畫也並不留稿。他給印刷所之類，一講丟失的作品，數目也不少，這是他回信給我才知道的。並且還希望我不必因些小事而悵然難堪。可是我對於寫詩全是即興之作，高興時偶一爲之，並不像詩人要作詩就作詩，要寫就寫。因此，從第一部詩集出版後，一直過了廿五年後的一九五五年，才出版了第二部詩集「美麗的肖像」，可是保留下來的豐子愷畫的封面，還是沒有用上，因為那張封面畫在日軍南侵的炮火中跟許多珍貴的絕版書一齊失掉了。說起來，真是一樁永遠無法彌補的抱疚的事！

一九五〇年春，中國正是烽煙四起的時候，豐先生携眷南行，抵達香港便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嘆，那時他寄來了一張漫畫「扶得醉人歸」和一篇「藝術的不朽性」的散文，還有近影一張，託一個朋友代爲換取一點生活費，那個朋友便把這些東西全部寄了給我，我纔知道豐子愷先生一別廿多年，已經成了長髯飄拂的長者了。時光畢竟無情，歲月並不饒人，他那次給我的印象，依稀還留在腦際。我記得他有篇隨筆，題名「緣」，他說：「無論何事都是大大小小千千萬萬的『緣』所湊合而成，缺了一點就不行，世間的因緣何等奇妙不可思議！」我之得與他有過那次的會見，照他的說法，也許就是「緣」吧？

好久沒有看到豐子愷先生的消息了，最近看到他的公子華瞻譯的格林童話全集，才知道他在隨筆中所寫的那位小主人翁已經長大成人，也在大學畢業了，而且還有著作行世。那些童話集也有不少豐子愷先生的插畫，但看起來，並不像在「文學週報」作插繪的漫畫那麼趣味盎然了呢。

豐子愷先生在「漫畫創作二十年」一文內說：「古人說：『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我近來在漫畫寫作上，也有今是昨非之感。但也不完全如此，在酒後，在病中，在感動之下，在懊喪之餘，心情常常變換，筆調也時時反覆。」我想這正可以說是他的作品的一個很好的註腳。

滕固在伏見丸上

一九三〇年夏天，我南行省親，從上海踏上了日本郵船株式會社管轄下的伏見丸的三等房艙，纔發覺到同房艙的一個搭客，早就先我而在，他是一個中年男子，身材壯碩，看樣子，簡直是個商人，衣著樸實，一見面，他却向我很客氣地招呼起來，寒暄一番之後，我纔知道他姓鄧。據他的自我介紹，他原來並不是商人，而是復旦大學的教授。船啓碇後，他纔告訴我，他以前在日本讀過書，給我交換了一張名片，他說他很抱歉他的名片沒有漢字，只有英文，因為利便在歐洲使用。他的名片印得很簡單，只有一行「George K.Teng」的名字，而我以後總是稱呼他鄧教授而不名。

船中的生活，過得很無聊，第二天午飯前，鄧教授已不知去向，能搭訕的中國朋友一個也沒有，我在甲板上居然能夠花了一個上午時間，把李何林編的那本厚厚的枯燥的「魯迅論」一口氣讀完了，正預備回到飯堂去吃午飯的時候，鄧教授剛巧走到甲板上來。他說他剛從一號客艙的圖書館看書

出來。他一眼看到我手中的那本「魯迅論」，便搶過去翻了翻，然後在我身邊的一張帆布躺椅上坐了下來。

「密斯脫溫，你研究文藝的麼？」他劈頭便這麼說。

「有點喜歡涉獵吧了。」我客氣的說，「說不上甚麼研究的。」

「我不知道你喜歡，不然，我們早就應該好好談一談了。」他說，「我以為你是念什麼政治經濟那一套東西的。」

「你不是在復旦教政治經濟麼？」我驚訝地說，因為他和我初見面時，便說他是在復旦教政治經濟的。

「不，我原來是搞文藝的，」他說着，從襯衫袋內取出一張他自己的名片，在空白的地方寫上兩個漢字，然後問我說，「這個人你認識麼？」

我接過名片一看，只見名片的背後寫着兩個豆大的字：「滕固」。

「這個人我不認識，」我坦然地說，「不過他的小說，我倒看過幾本。」

「他的小說你喜歡麼？」他說。

「他是創造社初期的作家呢。」我說，「後來不知怎的却不見他在創造月刊發表作品了。最近倒常常在小說月報和邵洵美主編的金屋月刊上讀到他的小說。」我說。

「他的小說，你有印象的，是那幾篇，你可說得出來麼？」他吐了一口煙圈說。

「這個作家的小說，我是喜歡的，他有一本『迷宮』，裏面有一篇叫『壁畫』的，寫得真是好極了，那篇叫『迷宮』的小說，我倒看不出什麼好處來。還有一篇叫做『百足蟲』，也是一篇很好的小說。你讀過麼？」我說。

「讀過的，我也有同感。」他說。

「最近他有一部叫『睡蓮』的長篇小說，我却覺得糟透了。這位作家好像不擅於寫長篇小說的。我讀他的長篇小說，總覺得好像缺少點什麼，正如吃什麼羹湯，鹹味下得不够似的。」我侃侃地說出了我的意見。

「你的意見很不錯，我亦有同感。」他說。

「這個作家還有一點怪，他的書名不是奇特的，便是美麗的，譬如『死人的嘆息』咯，『平凡的死』咯，『銀杏之果』咯，都是屬於奇特的一類，譬如『迷宮』咯，『睡蓮』咯不是很美麗麼，他最怪的一部書便是那本『平凡的死』，封面是漆黑一團，中間却畫了一口大紅棺材，這封面真是嚇煞人。這真不脫唯美派作家的本色。」我說。

「你的心目中以為這個唯美派作家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說。

「唯美派作家的派頭，總跟英國的王爾德，皮亞斯萊這些人差不了多少的咯。我想，這個人一定是又高又瘦的，唇紅齒白，頭髮留得長長的，梳得有條不紊，穿著也很瀟灑，簡直像舞台上的小生型的那種人。」我說。

「有許多人跟你所想像的一樣，這一點，我跟你却不同，」他說，「你現在說的這個人，就是我！」

「你就是滕固！」我簡直不相信地吃驚地說。

「是的，我就是滕固！」他坦然地說。我真有點懊悔我的孟浪，懊悔剛才我對他直言不諱。

「也許你是不會相信的，」他說，「許多朋友也跟你一樣，他們對我的印象跟他們所想像的完全不同。」他說。

「這真是意外！」我說。

「是的，你說的一點也不錯！」他說，「我還有一個名

字叫做『若渠』，最近的一期小說月報上，我有一篇叫做『鵝蛋臉』的小說，那是描寫一個病人的錯覺，什麼地方都看到那一張熟悉的女人的『鵝蛋臉』的故事。這篇小說，我自己很滿意，我已將它連同已發表過的七八篇小說，編了一個集子賣給邵洵美的金屋書店去出版，這次到歐洲去，幸虧靠了這筆稿費作盤纏呢。」他說，「書將來出版了，我一定寄贈一冊給你，請你指教。」

「這次到歐洲去預備逗留幾。」

「打算在柏林大學讀二年書，再考一個博士回來，」他說。

「還沒有家室的人，實在是最適宜於讀書的。」我說。

「啊！我已經結婚了。我的太太原是黃炎培先生的丫頭。你看見了一定會覺得又胖又醜的。」他說，「要是我的太太，人人都覺得美的話，我又怎能放心到歐洲去讀書呢？」

我真有點不相信我自己的耳朵，我也想不到他是個這麼坦率 and 風趣的人。

「不過，你不曉得醜即是美，美即是醜。」他說，「這正是唯美派的真諦！」

「這無非是自己的文章，人家的老婆都是好的觀念作祟吧了。」我說。

「不，我一點也沒有騙你！」他說，「這次我之所以會到歐洲去念書，也無非是環境使然，中央通緝我，我不得不逃到國外去避避風。」他說，「現在船走得遠了，我總算脫險了，所以我也無須隱瞞了。」他說。

「中央爲什麼通緝你呢？」我好奇地說。

「你沒有看到申報上的新聞麼？我就是那個被通緝的江蘇省黨部秘書長。」他若無其事地坦率地說。

我真想不到一個唯美派作家對政治竟會那麼有興趣，居然會做起官來。

「我想，你以後從德國回來，還是好好地搞學術好了，別做什麼官了，省得惹上了那許多無謂麻煩！」我說。

「你說的不錯，實在應該好好地研究學術才對，我今年三十歲了，如果還不好好地努力一番，將來一定是一事無成的。」他很感慨地說。

「本來玩政治就無異玩火，常常自己也不免會給火灼傷的。」我說。

「啊，是的，」他突然轉換了題目說，「你是南洋僑生，南洋不是有不少異國情調的文學作品麼？」

「有是有的，可是，照我看來，却看不見有什麼傑出的東西，不過有幾首馬來情歌倒不錯，」我說。

「不久以前在申報的副刊『藝術界』上有一篇介紹馬來情歌的文章是不是你寫的？」他說，「那些情歌，看起來實在不錯，你爲甚麼不把它編成一個集子出版呢？」

「大概這部小冊子，下個月就可以出版了，」我說，「屆時當寄奉一部，請你指教指教。」

「客氣，不過，我倒想徵求你的意見，我想把它譯介一些在德國的雜誌上發表，賺幾文稿費用可以麼？」他說。

「當然可以咯。」我說，「你還是把在德國的地址寫下來吧。」

這時午飯的鈴聲已經搖響了。我們的話題也就中斷了。

以後的日子，我們相處得很好，還有那位伏見丸的船長，和那位到法國去的日本畫家龍田次郎君，差不多三天兩日裏總要到我們的房艙裏來聊天，據滕固兄的介紹，我才知道船長原來是他在東京帝大念書時的同學，因爲有這一種因

緣，因此我們在船中的生活也過得相當舒適，船上的侍役們上上下下都對我們另眼相看，特別客氣。滕固兄的日文說得簡直跟日本人一樣好，我對他表示了我由衷的敬意；他告訴我，他的日文實在比不上陶晶孫的好，陶晶孫因爲久住日本，日文太好了，好到連日本的許多作家往往也覺得比他遜色。只是他日文那麼好，而中文却差得多了，老實說，他的中文寫起來，簡直像日文，所以他在中國，讀者是不會喜歡他的。他在創造社出版的幾部小說，都沒有銷路，可見並不是沒有原因的了。不過在中國作家當中，像他那樣多才多藝的實在找不到幾個；言下之意，他對陶晶孫實在是五體投地佩服的。

我到檳城時，他和同船的日本畫家龍田次郎君一同陪我上岸，因爲我是識途的老馬，他們也就在檳城作了一次很暢快的遊覽。他到柏林不久，便寄了一本他在金屋書店出版的小說集「外遇」，裏面果然收了「鵝蛋臉」那篇小說。

一九三三年春天，他考取了柏林大學的哲學博士銜返國，我不久也回滬渡假。那時他住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的中華學藝社三樓上。一天黃昏，我和彭成慧兄相約去看他，他在寓中很寂寞，在閒談中他出示了在德國雜誌上發表的他的許多著作，同時還告訴我，他已根據了我那本小冊子「南洋戀歌」的譯本，譯了一部德文本在柏林出版，那本書出版後，當寄贈一冊給我。

那天我們談了許久，我無意中間起他的出處，他告訴我不久還要到南京去走一趟，希望我最好能陪他一道去走走，但我並不能如他所願。他到了南京並不寂寞，原來他當了內政部次長，這次入京是去履新的，我事後纔恍然。可見冠蓋滿京華，斯人並不憔悴。臨行前一天，我還獨自去看過他一

次，那天徐悲鴻和邵洵美都在座，濟濟多士，的是熱鬧。

抗戰時，政府遷都重慶後，有一天，我接到他的一封信，備述抗戰生活比他在柏林吃黑麵包皮時差不了多少，這封信也可以說是他給我的最後的絕筆，不久在報上，竟看到他患了腦膜炎病逝的噩耗，享壽還不過是不惑之年，殊覺惋惜。若渠兄在政治上的建樹，實在比不上在文學上的建樹，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却又比不上他在學術上的成就。他從德國回來，等身的著作，都是以學術文章為最多，後來轉向于考古，成績斐然，他在德國的著作也以考古為重要。即使在中國的出版界來說，也是以學術著作佔多數，我相信使他不朽的，便是這些學術性的著作，而不是小說；小說在他這時看來，也許是屬於雕虫小技了吧？但是他的小說在今日看來，為讀者所知的，恐怕只有被選進中國現代作家小說集裏的「百足虫」和「壁畫」兩篇而已。

文藝茶話

一九三三年春，上海的一班文人和作家舉辦了一個集會，叫做「文藝茶話」。記得當時的發起人是章衣萍，孫福熙輩，第一次的集會地點假座法租界法國公園舉行，也只有法租界當局對於這類文藝性質的集會容易瞭解，容易商量，肯慨然把那樣美麗幽靜的法公園的一角撥借給這班作家文人集會，作吵吵鬧鬧之所；而且每月還要經常舉行一次。第一次集會是在二月中旬的一個下午，那天參加的文人作家不少，差不多在上海的作家都參加了，其中還有不少各大學的文學院的學生，出席的人，每人須繳茶資五角，被邀作專題演講的作家學者也不例外。參加者無須事前報名，臨時參加也可以，像這樣的集會，大概跟法國作家的沙龍座談的性質，相差不多。

的。第一次集會後，作專題演講的作家的講稿還被彙集起來，刊行了一本刊物叫「文藝茶話」，刊物內容，除了三四篇專題的講稿之外，還有作家的印象記，手蹟，和筆札之類的文字和那天集會活動的插圖等，頗能引起讀者的興趣。我起初並沒有參加，只是喜歡看看「文藝茶話」那本刊物。第二次集會也是在法公園，第二次集會的人比第一次更多，南社的作家如柳亞子，林庚白，胡懷琛等也有出席；從來不肯照相的巴金，在那次集會上，也給人拍了照刊在第二期的「文藝茶話」上，只是面部還是不能給讀者窺一個全貌，給報紙遮了個半面，有點教人覺得煞風景而已。

第三次集會，不知怎的，改在美專舉行，這次我是給會今可兄堅邀了去的。那天還有從日本剛回來的崔萬秋兄的演講。同去的還有彭成慧兄，那天集會是在下午四時舉行，我們一行到達時，幸而離集會時間還有十分鐘，人却已到了不少，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的便是快近四十歲還未結婚的林庚白；他是會史上最活躍的一個人，那天他大概剛剪了髮，所以顯得容光分外煥發，穿着一套褐色的團花皮袍，雙袖反捲，顯得異常瀟灑。他的談風很健，爲人也很風趣，跟他的裝扮配合起來，十足像一個詩人。但是跟風塵滿面的崔萬秋兄却成了很強烈的對照。他那天談的題目好像是「詩話」。此公對於詩歌的研究是有他的獨特的見解的。他甚至連杜甫也不放在眼裏，自鄼以下更無論矣。他是那麼自負，他的才華是那麼煥發；記得那天當他說到「十年前論今人詩，鄭孝胥第一，我第二。倘現在以古今人來比論，那末我第一，杜甫第二，孝胥還談不上」時，還引起了哄堂的笑聲，但他却若無其事地說，「我比杜甫強，並不是我的才華比他強，而是我的處境，是杜甫所沒有的，以時世來說，倒是我獨佔了便宜，而

爲杜甫所沒有的」。後來他還口占了一首詩，說是他對詩的主張，詩云：「論詩不我宗，詩亡在旦夕，古人著爲詩，非但拘一格。作者同其人，意境有什百。矧乃今異古，人事窮變革。空前成茲世，矛盾供刻劃。古人之所有，今人盡已獲。今人之所有，古人不可得，意境到情辭，一一換顏色。豈徒物非古，什出千智識。古亦一仁義，今亦一道德，閉關古中華，互市今古國，墨守一家言，於古已耳食，今情作古語，虛僞無氣力。淺者况空疎，古籍紛作賊。又不解經史，諸子亦莫悉。勤取古詩詞，句摹而字勒。譬彼黃口兒，背書或寫默。門戶傍老輩，標榜號法則。嗚呼邦之恥，安得濁流塞！」

從他這首詩看起來，才華是不錯的。他逝世後，開明書店曾出版「麗白樓自選詩」，惜收集的詩作並不多。不過凡所抒寫，什七皆古人之所無，或今人所未言。此公那時並不曾擔任什麼職務，官也不做，飽食終日，談詩而已。因此人家說他狂妄，不過他的確是有摧倒一時豪傑的勇氣，像這樣的一個才華煥發的人，可惜後來在太平洋戰爭初起時，竟在香港慘遭日軍的槍殺，想不到死得那麼壯烈！

我記得那天演講的人，還有申報主筆陳彬龢先生，這個人頭顱很大，額角很高，長袍，布鞋，顯得很樸素。此公枯坐在那裏，話不多，顯得很沉默似的。據今可兄的介紹，纔知道他是一個日本通，他和萬秋互相恭維是日本通，萬秋兄留日十年，對於日本的風土人情自然非常熟悉。陳氏大概是研究日本問題頗有心得，自然被稱爲日本通。這兩位日本通在抗戰時期也就各奔前程；萬秋到了重慶，陳氏留在淪陷區，由此也可以分別出這兩個日本通對日本看法怎樣的不同了。那天集會，在席間，陳氏很客氣，他說他在一個真正的日本通面前談日本的事，頗有班門弄斧之意云云，那次他談的日

本問題，也不外是些很平常的話；他說日本是怎樣怎樣的一個強國，中國是怎樣積弱，以一個積弱的國家跟一個一等強國對抗，無論如何是會吃虧的；可是後來這個積弱的國家抗戰了八年長，終獲勝利，也是陳氏所始料不及的吧？

那天除了這幾個人演講之外，最後還有一個譯辛克萊的余慕陶，演講「中國文學往那裏走？」此公西裝革履，鼻樑上還架了一副墨晶眼鏡。他那一口客家普通話，很容易教人聽出他是道道地地的廣東梅縣人。我雖然坐在對面聽他的演講，可是他到底說了些什麼，我一點也記不起來了。我眼望着他的演講的姿態，腦子裏却在想起一段關於他的故事。那一段故事，還是三天前一個和他很熟識的朋友說的；說是他和余慕陶同住在一家蘇廣成衣舖樓上的亭子間，那時他正好在譯辛克萊的長篇小說「錢魔」，書差不多要殺青了，有一天他和余慕陶把房門鎖上了，一道外出。回來纔發覺他那部向朋友借來的韋氏大字典失了踪。余慕陶發起急來。「字典失了不相干，可是這部書稿怎樣還能譯得下去呢？」他立刻去找房東，要他賠回字典。結果還給房東奚落了一番，轟了出來。那天他來演講「中國文學往那裏走？」正是事後的第三天的事。我心想他那天如果講「韋氏大字典失蹤記」一定會比較精采得多；不然，我也不致聽不下去呢。後來第三期文藝茶話出版了，看了那篇講詞也只是覺得卑之毋甚高論。因為中國文學到底「往那裏走」呢？他始終沒有交待清楚。

情書一束

在書攤上偶然購得港版的「情書一束」一冊，不禁使我想起作者章衣萍的往事來。

「情書一束」原名「桃色的衣裳」，是當年在北京的北

新書局出版的，後來北新遷滬，再版的「桃色的衣裳」纔改了「情書一束」的書名，可是經此一改，這部小說竟然暢銷起來。我初讀衣萍的作品，還是在中學時代，他最初的一部作品是四十八開的「深誓」，其中收有「懷一個燒餅店的小朋友」，是一篇寫得很好的小品文。我當年讀過的衣萍的作品，直到今天還沒有忘記的便是這篇小品。我那時之所以喜歡讀衣萍的作品，也就是由這篇小品所引起的，其實他那部「情書一束」雖然名氣很大，我却沒有留下甚麼印象，雖則當年衣萍很重視他這部作品，拚命宣傳，一時說是北大俄文教授柏偉烈給他譯了俄文，一時又說是已有了英法日的譯本出世，可是我却始終沒有看到過這幾種版本，後來北伐成功了，又聽說成了禁書，因為是禁書，所以也就立刻不脛而走起來，本來不注意的讀者，也爲了好奇心的驅使，爭相購置一冊。其實這部書自始至終沒有被禁過，還是一版一版的印下去。甚至連後來出版的散文集如「櫻花集」，「古廟集」，「秋風集」等也接二連三地暢銷起來。讀衣萍的作品，就像吃冰淇淋，入口即化，看完了也就不會留下什麼印象，只是他的造句很簡潔，那種長達五六十個字一句的歐化句子，在他的文章裏是找不到的，據他後來對我說他這種文體，是當年他在北京替胡適抄寫過不少的文章，多多少少受到的影響，衣萍之所以會有「我的朋友胡適之」的句子出現在他的文章內，也是賢者不免的。

我認識衣萍，是他在暨南大學當鄭洪年校長的秘書時。那時衣萍住在上海施高塔路，可是幾乎常常到我們的宿舍來找住在我寢室隔壁的章鐵民和徐元度聊天，說到得意處，簡直是笑聲震瓦，有時我偷閒也進去參加擺龍門陣，真是海濶天空，無所不談。記得有一次談起衣萍的文體，我說他那種淺

顯的文句，最適宜於寫兒童文學。他應該走孫毓修的路子，中國的兒童讀物也最缺乏。在座的章鐵民也頗以爲然，衣萍自然首肯，「一·二八」後，他果然出版了不少兒童文學叢書。我相信衣萍在文壇上的地位，將來恐怕不會是「情書一束」，倒是那一大堆的兒童文學叢書吧。

他在暨大當秘書時期，一星期還兼了兩節選修的「國學概論」，我雖然喜歡他那種流暢如話的文章，可是對於他講授「國學概論」卻沒有選聽的興趣。況且他的功課都排在下午四時，上完了課，便是晚膳時間，後來我也曾偷閑去旁聽了幾課，結果還是大失所望。原來他把「國學概論」取銷了，改授了修辭學。我聽不出甚麼道理，想不再聽下去了，不料他却宣佈他自己健康不好，要長期請假到吳淞海邊去休養，他介紹了汪靜之來繼續他的課程。這樣一來，他那個在教室裏穿着大氅和戴着風帽的影子也就在暨南消逝了。

「一·二八」戰役發生後的第二年春天，我從南洋北返渡假，到上海去看戰跡。到了上海匯山碼頭的時候，已經快要亮燈了，彭成慧兄還在苦等，一見面他就告訴我，已經給我在永安公司的大東旅社開定了房間，同時還告訴我衣萍打算晚上到大東旅社來邀我去吃飯談談。我們到了大東，行裝甫卸，衣萍飄然來了。一見面，他就沒遮攔地對我說，「怎麼，還是光棍一條麼？怎麼沒有帶了南洋姑娘回來！」

「你別急，南洋姑娘倒有幾個，你來遲了，她們都找朋友去了。」成慧故意跟他開玩笑說。

「那可惜，可惜，她們回不回來？」衣萍焦急地說。

「那我可知道了，她們也許沒有這麼快回來的吧？」我也像煞有介事地說。

「那末，我們去吃晚飯去吧，南洋姑娘看不到，我的肚

子也餓起來了。」衣萍說。

於是我們一行三人，跑到附近的大三元去吃晚飯。

點菜的時候，衣萍坦然地說他什麼也不吃，只要一個清燉鹿根鴿子。

所謂「清燉鹿根鴿子」，也不外是淮山杞子之類的中藥燉鴿子吧了。菜餚來了，他就一個人吃像冬瓜那麼大盅的燉鴿子。

在吃飯的時候，我們喝了幾杯高粱，因此大家也有點酒意，話也多說了幾句，尤其是衣萍牢騷也最多。他說看情形，上海是不能再住下去了，中日的戰事，終有一天會重新爆發起來的；他說我可以回到南洋去，彭成慧回到廣東海豐去，再不然還可以到海外去，他自己除了到西南去，恐怕不會有甚麼出路的，他說他最近還走不成，他答應給兒童書局寫的稿子都快要寫完了。他的太太吳曙天又生了蟲脹病，大腹便便，艱於行走，這是他最傷心的事。那天晚上我們在南京路大三元一直談到九點多鐘才踏着月色回到大東旅社。

一回到旅社，衣萍就又記起所謂南洋姑娘來，他連連地說着怎麼他們還不回來呢？他打算坐等到十一點鐘，要是還不回來的話，他便應該回去了，成慧兄却惡作劇地向我作了個眼色。

「啊啊，沒有女人真無聊，幾條光棍棍打棍有什麼意思呢？」衣萍慨然地說。

「你覺得無聊，還是給我寫幾個字留作紀念吧。」我從行篋裏取出一本紀念冊請他留字。

他接去翻了一翻，對成慧兄說：「我沒有帶鋼筆，你有鋼筆麼？」

成慧兄從衣袋裏把那支派克鋼筆取下來遞給他，於是他

就在我的紀念冊裏寫上了幾個雞蛋那麼大的字：「推倒一時豪傑，開拓萬古心胸」把上下款都加上了，然後纔把紀念冊交還給我。成慧兄却替我接過去看了。

「啊，我的新鋼筆呀！」成慧兄失聲地叫起來，「我這樣尖幼的鋼筆尖，竟給你寫成了像兩條鐵軌似的開了叉。」說着還把鋼筆在紙上試了幾試。

「這就叫做開拓萬古心胸，」衣萍幽默地說。

成慧兄滿臉露出了啼笑皆非的神氣！

衣萍果然逗留到十一點打響了纔願意走，臨走時，堅要我和成慧叫德士陪他回家，以免曙天誤會他在外面跟女人胡鬧，說起來，衣萍倒有點怕曙天的。

我假期滿後，重行南返，後來，抗戰軍興，衣萍果然早已先行入川。還聽到說他在成都開了一家書店，抗戰勝利後，有一天在報上看到中央社的一條電訊，說衣萍患了腦溢血逝世，說是和家人吃晚飯時，伏在飯桌上死去的。衣萍本有肺病，可是却不死於肺病，而竟死於腦充血，我相信服補多少都有關係的。現在看到故人的遺著，真不免有點撫然，誠如陸放翁說的：「舊朋雲散盡，我亦感飄零」，真是一點不錯呢。

崔萬秋的啓事戰

在三十多年前，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過一種在學生界中銷行最大的學生雜誌，主編是楊賢江先生。他的帶感情的文筆是最吸引讀者的。我當時正在中學念書，也是學生雜誌的一個長期讀者。我最愛讀楊賢江先生每期必有的社評和柳克述先生的論著。那時學生雜誌經常有兩個學生作者的文章出現，那就是崔萬秋和葉靈鳳。後來，楊賢江去了日本，柳克

述的論著也在學生雜誌上不大看到了，崔萬秋和葉靈鳳也似乎擱了筆，這時的學生雜誌可以說是星光暗淡，沒有什麼精采可說了，這時剛巧創造社成立了，我便以創造月刊代替了學生雜誌作唯一的課外讀物，才知道葉靈鳳已轉到創造社去了。

後來我負笈上海，在暨南讀書，對於出版界也比較有較多的接觸，那時筆名「東亞病夫」的曾孟樸、虛白父子創辦了真美善書店，創刊了「真美善」月刊，我因為崔萬秋經常有日本名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的長篇鉅作「母與子」，和中篇小說「一個忠厚老實人」先後連載，也就作了「真美善」月刊的一個長期讀者。以後，他譯的夏目漱石的「草枕」和「三四郎」也陸續在真美善和中華書局出了單行本；那時我的求知慾非常旺盛，加以自己又是一個窮學生，不容易有買書的閒錢，但崔萬秋這些翻譯的日本名著，都成了我案頭上百讀不厭的好書；因此纔漸漸知道譯者遠在日本廣島高師讀書，也漸漸知道那時武者小路實篤也是在廣島。對於日本文學，我最先接觸的，便是武者小路實篤和夏目漱石的作品，後來才逐漸涉獵其他日本作家的著作。

迨到一九三一年秋間，曾今可創辦了「新時代月刊」，才第一次讀到崔萬秋的短篇創作小說「紅一點」，以後也陸續看到他的小說在「新時代」月刊發表。據說新時代書店正預備印他的單行本的時候，曾今可和他忽然發生了小糾葛，兩個人也就因此鬧翻，各走極端了。

我雖然耽讀崔萬秋的譯品，但他的短篇創作小說，也實在寫得很精彩，就以他那一篇「紅一點」來說，一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今日，我還保留着很深刻的印象。

記得是在一九三三年春，有一天，我和成慧兄到武定路

新時代書店去探訪曾今可，在那裏，纔知道了崔萬秋已經返滬了。那天，曾今可的案頭上正堆着不少女人的精緻的小錢包，和一些精緻的摺扇。有些錢包是用玻璃珠子串綴成的，顏色各異，但是却製造得很小巧玲瓏，使人把玩不忍釋手。

「你買那麼多的錢包幹什麼呢？」成慧這樣問今可。

「那是萬秋從日本帶回來的，」今可坦然說，「他要送給女朋友的。」

「哦，」我說，「他女朋友可不少呀，難怪他的小說幾乎篇篇都是寫女朋友的。」

「噢，對了，你們可以多等一會，他要到這裏來的，你們認識麼？」

我和成慧都表示和他沒有見過面。

「那好極了，等一等，他來了，我跟你們介紹，你們可以認識認識的。」今可說，「他要出席今天的文藝茶話，談談日本文壇的近況，我們等一會可以一道去的。」

過了約莫半個鐘頭，一個個子矮矮的，穿着灰黑條紋的大筆，戴了頂潤邊氈帽的漢子走了進來，今可站起身來給我們介紹，我才知道這個漢子是山東人，面孔瘦削，有點黧黑，並且還有點小麻子，如不仔細看，是不大容易看得出來的。山東人多彪形大漢，他却生得那麼矮小，很像日本人，誠如相書上說的北人南相那副形容，他就是崔萬秋。我私下裏想，這個人竟會有那麼許多女朋友給他作小說材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當下我們除寒暄了幾句以外，看看時間也不早了，他要趕到假座美專舉行的文藝茶話去講話，於是大家也就匆匆地各自上了黃包車。

散會我和成慧，一同搭電車到北站，然後轉搭火車回真

茹，萬秋要到四馬路中華書局去看朋友，於是我們便同行。可是因爲車子人很擠，我們也不便談話，便相約改天有空到他的寓所去探望他，臨分手時他告訴我們，他暫住在左舜生先生的家裏，是在愚園坊六十八號，袁道豐先生也是和他一同住在那裏。

過了兩天，恰巧是星期天，成慧邀約我去看萬秋。我們是上午十一時到了愚園坊，叩了門，一個江北娘姨走了出來。

我們把來意說明，娘姨便告訴我們，說崔先生一早就出去了，左先生也不在家，什麼人都不在，就只留下她一個人在家。

我們遲疑了一番，正預備轉身回去的當兒，娘姨立即說，「你二位先生可以上樓上去，坐等一會，崔先生也快要回來吃午飯的了。」

我們對娘姨表示要是逗留得不久，我們就等，要是等得太久了，我們便改天再來好了。

娘姨一面聽我們說，一面領着我們上了樓，她就又說，「崔先生就住在這裏。你們坐一會，我去倒茶。」

我們上到了樓上，只見一座樓就是一個大廳子，沒有房間，廳子裏有一張帆布床，一張單人小鐵床，一張書桌，一座籐書架，放着幾本厚厚的西書，顯得很凌亂，有二三張籐製的安樂椅，沒有秩序地被冷落在那裏，顯然使人看出了那是單身漢子住的地方。

我和成慧坐在那裏，等候了約莫半個多鐘頭，還不見萬秋回來；這時，我覺得肚子也有點餓意了，便留下兩張名片，寫上幾句留言交給娘姨然後走到外面去了。以後，爲了人事的票六，也就一直沒有機會再去看過他。這期間，我們

從報上知道他在大晚報編副刊。一九三三年二月間，他和曾今可爲了銀錢而發生了小糾葛。

有一天，萬秋忽然在上海申報上登了啓事，指謫曾今可冒用了他的名字，自己做了一篇序，而在自己所做的序裏又大大稱讚了自己的詩一通，甚至硬把日本一個打字女郎和一個中學教員派做「女詩人」和「大學教授」，把自己吹捧得無微不至云云。

今可也不甘示弱，第二天就在申報上登了方寸大字的「曾今可啓事」的答辯，說是「不能應付朋友無窮的借貸，以致報怨」云云。你來我往，差不多成了啓事戰，魯迅還嘲笑說這一年可以說是「啓事年代」。

原來崔萬秋所揭發的，也是在「新時代月刊」刊載過的所謂飯田教授和女詩人對「兩顆星」的譯稿，這些風風雨雨，也就成了當年文壇上的鬧劇。

而今事隔廿多年，偶一憶及還覺得有趣。只是萬秋與今可早已分道揚鑣，各奔前程。今可在台，萬秋在日。學而優則仕，據說萬秋現在已貴爲駐日大使館的參贊了。文章自然是許久難得再看見了，不知萬秋在日本案牘勞形之餘，仍致力於武者小路實篤和夏目漱石作品的翻譯否？

曾今可宣告文壇下野

一九三一年秋，朱梅子從檳城鍛羽返滬，在法租界環龍路開辦了馬來亞書店，刊行了馬來亞半月刊雜誌一種，並陸續刊行了不少東南亞國家的翻譯小說，的是熱鬧了一番。當時馬來亞半月刊的主編是曾今可，因爲朱梅子邀約的關係，我經常給馬來亞半月刊寄稿，也就因此而跟今可成了神交。後來，朱梅子結束了馬來亞書店的業務，到比利時去學釀製

啤酒，今可就另起爐灶，在武定路創辦了新時代書店。刊行了新時代月刊，而我也就無形中成了新時代月刊的撰稿人之一。那時已是一九三二年春間的事。我給新時代月刊先後選譯了托爾斯泰的八篇短篇小說，這些小說後來集成集子交給女子書店印單行本，現在這本書已成了絕版書了。

那時在新時代月刊寫稿的人頗不少，如崔萬秋、趙景深、彭成慧、章衣萍、梁得所諸兄都是經常有作品在那裏發表的，後來今可不知怎的忽然高興起來，出了一冊「詞的解放運動專號」，招惹了一場是非，遭到魯迅的嘲笑與抨擊，在文壇上，頗為熱鬧了一陣。那時新時代書店的業務似乎很鼎盛，出版的單行本也不少，但似乎都是曾今可自己的作品居多。我記得他的第一部書是一部短篇小說集叫做「法公園之夜」，第二部書是「愛的三部曲」，是一部詩集。這部詩集，居然一口氣印行了三版，幾達一萬多本，詩集而能這麼流行暢銷，在當時，實在算得是奇蹟。有人說是他和魯迅爲了詞的解放而筆戰的收穫。又有人說是這首敘事詩雖然寫得好，但是他給朋友也送了不少，而我倒覺得他這部詩集之所以暢銷，詩寫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廣告做得出色，能夠收相得益彰的效果，也是一個主要原因。當時這部詩集的廣告文字，是作者自撰的，說是作者寫好這部長詩曾在法國公園交給詩中的女主人翁閱讀，徵求同意出版，女主人翁不但不允許作者出版，而且還將原稿擲在法國公園的小河中，幸而作者手急眼快趕忙截回，原稿才不致遭殃。原文已記不清楚了，大意彷彿是如此。作者的爲人本來是很坦率天真的，從他的文章的字裏行間也往往不難窺出一斑。

一九三三年春，我返滬渡假，纔跟作者晤面。原來他是一個小胖子，圓圓的臉孔，很飽滿，只是一頭亂髮，參雜了

不少的星霜白髮。看起來倒像一個商人，不像是一個詩人。不過那份天真和率直，是一個詩人所不能缺少的那份素質，他是不會沒有的。這一年他出版的一本詩集「兩顆星」也是爲了邵洵美的一句話而立刻付印的。據說有一次，他把這部詩稿交給邵洵美過目，邵洵美看完了，說是「兩顆星」這首詩是我今年所讀到的詩歌中最好的一首好詩。它有點像法國詩。因此他也就把「兩顆星」立刻付梓，這部書出版了不久，還是二版三版地印下去，老實說，他的舊詩寫得不錯，他的舊詩比新詩寫得高明，但他的「兩顆星」却比「愛的三部曲」寫得好，我對於「愛的三部曲」看不出他的好處。今可是帶有點以詩人自居的神氣的。接着他又出版了一部「落花」，是詞集，是一部四十八開的袖珍本，這部詞集是不錯的，只是書後附錄了一大堆的「好評一束」，却使那本詞集遜色不少。大概作者爲了篇幅不夠而添上了這些「好評」，雖則是廣告性的文字，倒是使人覺得有點無聊。那些所謂「好評」，大都是摘自友人來書的字句。

一九三三年秋間，新時代月刊竟出了厚厚的一冊「無名作家專號」，惹起了文壇上的非議，自然是不在話下的。今可爲人的天真處由此也不難看出來了。

一九三四年春，局勢很惡劣，加以那時又是「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相繼發生以後，禁談國事，他在新時代月刊新年號裏發表了一首新年詞「畫堂春」：

「一年開始日初長，客來慰我淒涼！偶然消遣本無妨，打打麻將。

「且喝乾杯中酒，國家事管他娘；樽前猶幸有紅粧，但不能狂！」

不料這首詞一經發表，便引起讀者的誤會，差不多全國

的報紙雜誌都一致對他作無情的攻擊。但他却没有聲辯。

因此一提起曾今可三個字就不免使人想起他的名句「國家事管他娘，打打麻將」來，全闕詞，人家反而記不起，而這一句詞在今日年紀三四十歲左右的讀者，大概很少人不知道的，不過直到抗戰勝利後，邵洵美編的論語，他有篇聲辯意味的文章發表，說他填這闕詞時，適值國際環境和國內情形並不很好，那時的「國家事」，我們是不能「管」，也無從「去管」的。管不了就只好不管！「管他娘」就是這個意思。「客來」乃指「李頓調查團」，「紅粧」乃喻「蘇聯」。因為那時候不能把這些意思明白地說出來，以致讀者知道他的意思的很少，誤會的很多云云。讀這篇文章，我們才知道抗戰期間，此公的息息無聞，才知道他始終在戰區擔任文化宣傳新聞等工作，勝利後任申報駐台特派員，不但沒有做過官，也沒有接收過甚麼，更不會做生意。這十幾年來的工作，可以作為給那些斷章取義，毒意地以「國家事管他娘，打打麻將」來罵他的人們一個最好的答覆。文章寫得很感慨，把積了十幾年的牢騷也發洩完了。

記得一九三三年七月十日，曾今可兄忽然在上海時事新報登了一則啓事：

『鄙人不日離滬旅行，且將脫離文字生活。以後對於別人對我造謠誣衊，一概置之不理。這年頭，只許強者打，不許弱者叫，我自然沒有什麼話可說。我承認我是一個弱者，我無力反抗，我將在英雄們勝利的笑聲中悄悄地離開這文壇。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我只當他是尊我為「英雄」。此啓。』

他這則啓事登出後，上海的小報都說他下野。抗戰事起，新時代書店也結束了。勝利後，他在台灣曾編過「正氣

月刊」，可惜已不如「新時代」當年的鋒芒畢露了。一別二十多年，此公諒亦已垂垂老矣！海天遙隔，近況如何，更無從獲悉了。

「何徐事件」的內幕

說起來，應該是迴溯到廿多年前的舊事了。那時大概是在一九三二年春間，中國文壇上忽然崛起了兩個青年作家，一個是穆時英，一個是何家槐，前者以「南北極」短篇小說蜚聲一時，後者則以短篇小說「貓」傳誦於藝林。穆時英那時是上海光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學生，何家槐起初是吳淞中國公學學生，後轉學暨大西洋文學系。同時光華中國文學系，還有一位默默無聞的青年作家徐轉蓬，後來也轉學到暨大念西洋文學，也就是造成了後來轟動文壇的有關著作權問題的「何徐事件」的一個主角。

有一次，徐轉蓬寫了一篇小說，竟從光華大學一連打了幾次電話到暨南找何家槐，說是有樁非常重要的事情要當面一叙，害得何家槐慌張得連課也不上，從真茹迢迢地趕到光華大學去，一見面纔知道他寫好了一個短篇小說，他自己覺得非常滿意，要家槐給他看一看。他之所以轉學到暨大來，能夠和何家槐較多接觸，據說也是原因之一。他常常喜歡把寫成了的小說，送給沈從文和何家槐去評定。穆時英後來也想轉學到暨南來，據說他在光華考試的成績並不好，雖然那時他已是名滿中國的小說作家，但他的國文分數却不及格，他的主任錢基博先生只給他批了五十九分，簡直氣得他啼笑皆非！

何家槐當年在暨大念書，據他說家庭環境並不好，他之所以轉學暨南，因為暨大是國立大學，學雜等費用的負擔比

較輕得多，貧寒子弟容易應付得來。但何家槐自從發表了短篇小說「貓」之後，雖則名噪一時，却帶給他不少麻煩。許多雜誌刊物又爭相羅致他的作品，當時一個月裏幾家雜誌同時發表了他的小說，也是常有的事。這頗使他覺得苦惱，他雖則常常躲在洪年圖書館樓上，在孜孜不輟地寫小說。還是窮於應付。真是「人怕出名豬怕壯」，有苦說不出。

家槐出身農家，所以帶了很濃重的泥土氣息，他對朋友很坦率，誠懇，忠厚，有一次我問起他「貓是怎樣寫成的？」他便坦然地告訴我，說那完全是得力於徐志摩先生的啓示，故事人物都是志摩供給的材料，他把這篇小說寫成之後，曾鄭重其事地再三修改，然後纔送給志摩去評定，志摩很賞識這篇小說，當即給他介紹到鄭振鐸主編的小說月報去發表了。他說這篇小說寫得那麼成功，而且能夠使他一舉成名，在他簡直是非常意外的。他還說他最覺痛苦的，便是恐怕以後所寫的作品趕不上「貓」那麼優秀，那麼值得人重視。其實他沒有想到莫泊桑雖然寫過四五百篇小說，而最膾炙人口的却是那篇「項鍊」。一個作家能夠產生一篇小說或一首詩，能夠膾炙人口的也就可以問心無愧了。

在何家槐正在窮於應付雜誌刊物的文債的時候，也就是徐轉蓬的創作慾最旺盛的時候，他幾乎每天可以寫出一篇小說來，但却找不到可以發表的地方給他發表，他曾先後把這些小說一篇一篇分別寄給「現代」，「小說月報」，「東方雜誌」，「申報月刊」，「文學」，然而都陸續退了回來。其中有些稿子還是經過沈從文仔細修改過的，認為是優秀的佳作。但他並不灰心，就又把它們分別用信封裝好交給何家槐，託他介紹發表。家槐當時也就在信封上把那些要寄給雜誌社的主編的名字填寫好了，然後寫上『真茹何家槐寄』的

字樣，便交由徐轉蓬自己去投郵了。可是後來那些文章居然一一發表出來了，但是却成了何家槐的作品。那時我們幾個搞文藝的同學都很清楚這件後來轟動了整個中國文壇的『何徐事件』的內幕，何家槐也一點不隱瞞地把這些前因後果清清楚楚告訴過我們。我們當時記得還曾表示了意見，說是雜誌編者以爲徐轉蓬也許是何家槐的筆名也難說，在編者方面也許認爲與其用一個陌生的筆名，倒不如用爲讀者所熟知的作者的原名較好，不過他應該去函詢問一個究竟的，可是當時徐轉蓬也認爲我們的猜測是合情理的，他認爲誤會且由他誤會，反正文章有讀者，即使是用什麼名義發表也不在乎的。這是徐轉蓬的豁達處。可是文壇上却偏偏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亂，喜歡出花樣，當事人認爲芝蔴綠豆的小事，但在那些好管閑事的人看起來，不把無事變有，小事化大起來是不夠熱鬧的。

於是文壇上也就有署名「清道夫」其人在一份叫做文藝新聞的刊物上揭發這些所謂陰私了。這樣一來，從而也就有人從中興風作浪，大事叫囂，一窩蜂地大寫文章攻擊何家槐；的確頗熱鬧了一陣，當時弄得家槐幾乎沒有招架的力量，結果也只有把這事體的始末公開暴露了真相。還備受人家的揶揄，而頗費一番筆墨呢。

徐轉蓬也就這樣露了頭角，這樣的一樁不愉快的有關著作權事件，也就由誤會而演成了一齣鬧劇，終於不了了之。可是誰應該負這樣的責任呢？

在這場風波發生之前，家槐曾先後出版了兩本小說集，一本是「曖昧」，一本是「竹布衫」，可是這兩本小說集都沒收進徐轉蓬的作品。後來徐轉蓬的那些以何家槐的名字發表的小說，也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個叫「母親們」的小說

集，以後文藝性的雜誌也逐漸看到徐轉蓬的名字的小說刊出來了。抗戰勝利的初期，轉蓬還出過一本叫做「炸藥」的中篇抗戰小說。他的小說和家槐的小說作風很相近，甚至連語法的組織也大同小異，簡直可以亂真。

事情過去了已經廿多年了，這事件可以說已經成了歷史上的陳跡，但是它的警惕性，在今日看來，彷彿還沒有淡去。近日重讀家槐那本小說集「曖昧」裏面收的「貓」，竟在書裏發現了一幀我南行時他贈送給我的照片，還看見他的照片的背面，塗着觸目的兩條像手指那麼粗的黑墨線條。他題了這樣的句子：「這兩條黑線象徵我和我老婆的死」。家槐寫了那篇「貓」，即使以後沒有作品產生也應該是不朽的。那的確是一篇傑作，不用說，廿多年後的今天重讀一遍，我還是有這樣的感想。

夏炎德寫法蘭西文學史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這幾年期間，鄭洪年長校暨南，可說是暨南的黃金時代，不用說，知名的教授，差不多都薈萃于暨南門下講學，而體育方面，在江南八大學當中，各項比賽，可以說是所向披靡，全不是敵手；在文藝方面，則青年作家輩出。這幾年間，說是暨南的黃金時代實不過譽；洪深教授就說過東南文藝集于暨南的話。現在且說在暨南的青年作家當中，何家槐，陳福熙和黑嬰，都是當年的流行作家，名氣往往還比教授來得大，那時他們也不過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而風頭之健，無可形容。何家槐以「貓」鵲譽文壇，陳福熙則以數量可觀的短篇小說見稱于時，黑嬰原名張又君，是廣東梅縣人，據說是印尼僑生，他是以「帝國的女兒」一作成名的，他當年在文藝圈中竟有「橫光利一第

四」之稱，據謂他的小說就是比較接近新感覺派，如橫光利一那一類型的。青年詩人中則有出了一部「時間的大木船」的方形開本，版式很大的詩集的章石承，和另一個詩篇散見于「青年界」「現代」和「文學雜誌」上的傅尙杲，但是除了這些慧星似的比較顯著的人物之外，也有不少孜孜不倦地埋首寫作的青年作家。他們當年雖然不怎樣頭角崢嶸，可是却是腳踏實地的，今日尚在文壇上巍然不爲所動的却大有其人，夏炎德兄就是其中的一個佼佼者。他那時還非常年輕，不過二十一二歲左右，他原本是上海江灣勞動大學的學生，後轉學暨南，在暨南完成了大學的課程。他的英法文根底很好，而且能夠寫作。同學們都說他是當年曾在暨南任教的法國名教授邵可侶（Jacques Reclus）先生的得意門生。

夏炎德和我雖然同住在第五宿舍裏，在我們認識之後，我才知道他原來就是我的鄰居，他給我最初的印象，就是一個恂恂儒者的風度。他在暨南，起初是不會有多少人知道的，那時，他正在埋頭著述他那本傑作「法蘭西文學史」。我和他的認識，說起來也很偶然。有一天下午，我從圖書館借了幾部參考書回到宿舍，忙着翻閱這些借來的書籍，預備寫筆記的時候，同房的三個華僑同學都上球場打球去了，他剛好和彭成慧兄走過我的臥室門口，成慧和我本是認識的，他走了進來，問我要不要出外去散散步，就在這時候給我介紹了夏炎德。他們原來是要到外面去散步的，成慧還打趣說，炎德不容易到外面去閒蕩的，今天能夠邀得他出外，實在是一件幸運的事情。當即說得炎德面紅耳赤，靦靦不已。

在散步的當兒，炎德告訴我，和他同房住的都是華僑同學，他們的生活習慣，他真覺得不順眼。他說他們一天要上幾次浴室去沖涼，不然一有空就是打球，時間簡直都全給糟

塌了，但對他却有說不出的好處，因為他們差不多祇有睡覺的時間才在房子裏，房子裏也就冷靜得很，對於他讀書寫作都有莫大的好處。他還表示，他覺得我和一般華僑同學不大相同，常常經過我的門口，總看到我在那裏用功，他起初還以為我不是生長在外國的華僑同學呢。那天我們吃過晚飯，還陪他回到他的房間去，果然房子裏一個人都沒有，我看到他的書案上，堆放着一大疊寫得密密麻麻的原稿紙，案頭上有着不少長長短短的殘燭，床頭上，椅子上還堆着不少書。

「老夏，你真用功，用得那麼多洋燭！」成慧打趣他。

「不，我有遲睡的習慣，早睡不入覺，只得起床看看書寫寫東西吧了。」他申辯地說。

「你寫些什麼，可以看看麼？」成慧毫不客氣地說。

「隨便寫寫的，還沒有寫完。」他說。

「寫小說麼？」我插嘴說。

「不，我不會寫小說。」他坦然地說。

「那麼定是準備畢業論文了。」成慧說，「寫畢業論文還早呢。」

「不，是在編寫一部文學史之類的東西。」他說。

「這部著作叫什麼名字呢？」我說，「出版後，我可以拜讀拜讀了。」

「還未寫成，即使寫成了，出版也很成問題。」他客氣地說。

「書寫成了，還愁沒有地方出版麼？」我說。

「那也不見得，這是一個奢望，」他說，「我不過想寫好它，了却一樁心願吧了。」

「這部書寫成一半了吧？」成慧說。

「還沒有呢，只是一個開端，」他說，「我只寫到第三

篇吧了。」

「纔寫了第三篇，稿紙就有半尺來厚了，寫完了，不是不得了嗎？」成慧說。

「我寫的暫定名爲『法蘭西文學史』，我打算寫到目前的法國文學趨勢爲止。」他說。

「那簡直是一部鉅著呢。」我說，「法國文學史出版的很少，目前只有徐霞村編過一部，我還沒有仔細讀過，不曉得內容怎樣？」

「我倒看過了，覺得畧嫌簡畧一點。」他說。

「因此，你才着手寫一部咯。」成慧說。

「我希望能夠寫得比較詳盡一點吧了。」他說。

「我倒希望你趕快寫成，」我說。

我和成慧坐了不久，便告辭了出來。因爲我們恐怕耽擱了他用功的時間。

有一次，曾今可到暨南來玩，幾個寫文章的朋友都聚在暨南邊上的一家精緻的餐館裏喝茶聊天，大家都想到去邀夏炎德來談談，我說他恐怕不會來的，他正埋頭寫作呢。我們打斷了他的文思也不好，還是吃飯的時候纔去邀他來，後來成慧兄告訴他說，今可很早就到了暨南，玩了許久，就是恐怕妨碍他寫作，所以到吃飯的時候纔去邀他的。他聽了却哈哈大笑了一陣，說是唯有寫文章的人纔懂得寫文章的人的脾氣。炎德的生活原來就很嚴肅，不苟且的。

他費了近兩年的功夫，居然把『法蘭西文學史』寫成，關於法蘭西文學的重要主義，思潮，流派，作家等，大部分都盡了應有的介紹責任。那時剛巧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間的事。他請洪深教授給他寫序，洪深先生讀完了這部心血的結晶以後，不但給他寫了一篇很長的序文，而且還介紹給商務

印書館列作大學叢書出版。全書分八篇共四十一章，該書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版式爲十八開本，約六百七十餘頁，洪深先生對這部巨著說了「中國近年來文學史著作方面最有進步的作品中的一部新書，值得向讀書界推薦」的話，爲了這部書出版，恂恂儒者的夏炎德兄便靠了這筆巨額的版稅上歐洲去念了幾年書，勝利後，回到上海來便當了復旦大學的教授。

徐悲鴻坐對瓶梅食餅乾

一九三二年春，上海新時代月刊第三卷第三期刊載了該刊主編曾今可的一篇對劉海粟畫展捧場的文章，因爲其中有一段文字涉及了另一個畫家徐悲鴻先生，想不到竟引起了一場筆戰，頗熱鬧了一陣。首先是徐悲鴻先生在上海申報上登了一則廣告，說：

「民國初年，有甬人烏某，在愛而近路，後遷橫濱路，設一圖畫美術院者，與其同學楊某等，俱周湘之徒也。該院既無解剖透視美術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無，惟賴北京路舊書中插圖爲範，蓋一純粹之野雞學校也。時吾年未二十，來自田間，誠懇之愚，惑於廣告，茫然不知其詳，既而鄙畫亦成該院函授稿本，數月他去，乃學於震旦，始習素描，後游日本及留學歐洲。今有曾某者，爲一文載某雜誌，指吾爲劉某之徒，不識劉某亦此野雞學校中人否。鄙人於此野雞學校，固不認一切人爲師也。鄙人在歐八年，雖無榮譽，却未嘗持一與美術學校校長照片，視爲無上榮寵，此類照片，吾有甚多，祇作紀念，不作他用，博物院畫人皆有之，吾亦有之，既不奉贈，亦不央求；偉大牛皮，通人齒冷，以

此爲藝，其藝可知。昔玄奘入印，詢求正教。今流氓西渡，惟學吹牛，學術前途，有何希望。師道應尊，但不存於野雞學校；因其目的在營業欺詐，爲學術界蝨賊敗類，無恥之尤也。曾某意在侮辱，故不容緘默，惟海上鬼蜮，難以究詰，恕不再登，伏祈公鑒。」

這則「徐悲鴻啓事」登了出來之後，自然引起了劉海粟的反應，也跟着在申報上登了一則廣告云：

「第三卷三期新時代雜誌曾今可先生刊有批評拙作畫展一文，曾先生亦非素識，文中所言，誠出衷心，固不失文藝批評家之風度，不謂引起徐某嫉視，不惜謾罵，指圖畫美術院爲野雞學校，實則圖畫美術院即美專前身，彼時鄙人年未弱冠，苦心經營，即以徐某所指石膏模型一具都無而言，須知在中國之創用『石膏模型』及『人體模特兒』者，初爲圖畫美術院，經幾受苦鬥，爲國人所共知，此非『藝術紳士』如徐某者所能抹殺；且美專二十一年來，生徒遍海內外，影響所及，已成時代思潮，亦非一二人所能以愛惡生死之。鄙人身許藝學，本良知良能，獨行其是，讒言毀謗，受之有素，無所顧惜。徐某嘗爲文斥近世藝壇宗師塞尙，瑪提斯爲『流氓』，其思想如此，早爲識者所鄙，今影射鄙人爲『流氓』，殊不足奇；今後鄙人又多一『藝術流氓』之頭銜矣。惟彼日以『藝術紳士』自期，故其藝淪於『官學派』而不能自拔。法國畫院之尊嚴，稍具常識者皆知之，奉贈既所不受，央求亦不可得，嫉視何爲，真理如經天日月，亘萬古而長明，容有晦暝，亦一時之暫耳，鄙人無所畏焉。」

這一則反響的「劉海粟啓事」廣告登了出來之後，戰事也就不了了之地平息下來，那時悲鴻好像是剛從南京到上

海，住在法租界貝勒路中華學藝社樓上的客寓。有一天，我去探望住在那裏的滕固兄，我在滕固兄的房間裏，竟意外地初次看見他。那時他大概是三十三四歲左右，一頭黑髮，並未膏沐過，眼皮很厚，膚色不但不潔白，而且畧帶黃；臉方圓，顴骨高高的，但像是有點浮腫，那是一副使人覺得是一張營養不足或是久病的面容。跟在座的紅光滿面的滕固和清秀的邵洵美相形之下，顯得格外觸目。他是擅長交際的，他的爲人誠懇而客氣。我記得那天他還悻悻然地談起那一回的「廣告戰」，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了半個多月了，但並不以我爲初識而那麼如數家珍般地在憤然地敘述着。他那頸項上的青筋也微微地暴漲了起來，他給我的最初的印象使我至今還忘不掉。

一九三九年秋，時值抗戰期間，他到橫城來，爲了籌賑中國傷兵難民舉行他個人的作品義展，把全部收入撥充籌賑。於是我們又在橫城的一家俱樂部裏見面，他兩鬢已有星霜白髮。過了幾天，他也就遷進一家大旅社的三層樓的一個閣樓上安頓了下來。有一次，我到旅社去看他的時候，他出示了一張特爲贈我而畫的古松。他告訴我那株古松畫了一枝橫枝，畫得太粗，看起來有點碍眼，他在畫上題了幾句有趣的話：「古松因年事已高，枝桠不多，惟橫枝異常蒼勁，若供鳥雀棲息，未免大才小用，若取而爲門門，雖畧嫌粗大，尙堪一用，不知梓川兄以爲然否？」畫角上還印上一方「荒謬絕倫」的閑章；此外他還恐怕我不喜歡，還特意畫了一張竹給我，題「時窮節乃見」幾個字，規規矩矩地落了上下款，印上「江南布衣」的印章。事後，他和我談起文藝，才知道我原來也體會「幽默三昧」，因爲我就很高興他那幅「脫帽鍾馗」，雖然他並沒有送我。

他要我對他的畫表示意見，我說他畫馬最有名，也是世人所共知的，而我倒不喜歡他的馬，他覺得很詫異。我說他畫的馬因為太熟練，太精巧，功夫也下得最深，隨手拈來，都是栩栩如生的「奔馬」，而我所喜歡的，倒是他畫的貓，鷄，松，竹和那些奇趣的徐悲鴻體的字。當他問我還要他什麼畫的時候，我說我希望他給我做一首詩寫一幅條幅，他立刻答應了。

他的畫，他的詩，他的題畫，和他的散文一樣，在平淡中使人覺得奇趣盎然，他題畫的詩不多，他給我寫的那首舊作原是在重慶沙坪壩的口占詩：

此夕晴空倍好看，推窗唯覺月光寒。

盤飧燈火艱難甚，坐對瓶梅食餅乾。

寫完了，他坦然地說我的脾氣古怪。他說他許多朋友都要他畫「馬」，而我却偏偏與眾不同。我說，「你的『馬』因為太著名，不好也是好的，所以我反而覺得沒有什麼意思，而我喜歡的畫，我根本就買不起，你送給我的二幅古松和竹，還有那條幅，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他聽了，連呼上當不已。

他在檳城的日子，前後算起來也有二三個月，可記的也很多。有一天我和莊心在兄同去看他，那天因為談得太晚了，我們一道出外去找飯吃；他提議最好不上館子，能夠找一些露天的攤檔，或者像上海城隍廟之類的館子最好。結果我們三四個人一道沿着熱鬧的街道無目的地走，經過一家座上客常滿的粥攤，他駐足下來，欣賞擺在那裏的菜餚。他說，「這些東西，品貌不凡，想來一定很可口的，就可惜沒有地方可坐下來吃個痛快！」結果那天晚飯也沒有吃，我們只是叫了些「蠔煎」，紅豆水，胡亂吃一頓果腹就算了。

他在食桌上告訴我們，他在巴黎苦學的生活，他說他因爲在一九二一年九月廿六日，法國國家美術會開展覽會，他赴會參觀，忽遇大雪，因沒有大衣穿，會內酷寒異常，不禁受涼而返，以爲洗澡可禦寒，誰知道澡還沒有洗好，肚子竟痛得不得了，從此就成了不治的胃病，假使當時有錢足以購置一襲大衣，恐怕不會罹此惡疾。他說着還告訴我們他曾把在巴黎的苦學生活寫過一篇文章，在「良友」上發表，題爲「悲鴻之墓」。

有一次他要離檳返星赴美，心在兄請吃飯，席上還有女賓數位，悲鴻一一應酬，招待女賓也非常殷勤得體，使我記起滕固兄對我說過，悲鴻善於應酬女人的話，實在不錯。這次在席上，我們才知道他有終老炎荒之意。他很稱譽檳城的山水人物，他表示此番爲抗戰到美國開畫展後，便回檳城隱居。可是日軍南侵的炮火却把許多人的計劃打得粉碎了，也把許多人打醒了，自然這位藝術大師的計劃也終於成了泡影。

他在檳城雖然留下了許多畫作和墨寶，許多人都知道；但是沒有幾個人知道的，便是「南斗」周刊的產生和他有過一段因緣。有一天，莊心在，李詞傭，和我一道到旅邸去看他。偶然談起文藝，大家都覺得當時馬來亞的報紙還缺少一種純文藝性質的刊物，雖說那時郁達夫先生在星洲日報編副刊，大體上是比較接近文藝的，因此大家都有辦這種刊物的意思，當下便推選心在和我負責進行。悲鴻當時是同人中最熱心的一個，他立即給「南斗」題眉，還先後撰述了幾篇很有分量的文章給「南斗」發表，如「泰戈爾先生」，「談陳散原的詩」和「論中國畫的派別」等都是當時膾炙人口的作品；此外他還經常替「南斗」向國內友人拉了不少稿來增光篇幅。如經常在「宇宙風」寫文章，當時還在印度國際大學

研究的巴宙先生的文章，都是由他催索得來的。

戰後復刊了的「南斗」，他也曾先後從南京寄過不少的文章來增光，他的文章不但我有先睹為快的權利，還有給他謄抄的義務；悲鴻的脾氣很古怪，他的文章不用稿紙寫，而用宣紙寫，字體寫得像雞蛋那麼大，但並不潦草，可供裝裱懸掛，而每次寄了文章給我，我便得爲他花些時間，想法給他抄出副稿付排，原稿還得寄還給他，這種甘苦是沒有人知道的。現在悲鴻久已歸道山，但是認識他的人，我相信不免還會常常想念他的！

郁達夫三宿檳城

叔世天難問，危邦德竟孤，臨風思猛士，
借酒作清娛，白眼樽前露，青春夢裏呼，中年
寥落意，累贅此微軀。

——郁達夫：有感

日前因爲整理書箱，偶然翻出從前搜集得郁達夫的遺作一束，其中有詩，有遊記，有隨筆，有雜感。以年代來說，大多數都是在星洲的一家報紙主持副刊編務時所寫的東西，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這一時期寫的佔最多數，達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八日抵星洲，居留星洲時，寫作也最勤，幾乎每星期都有二三篇文章發表，有時副刊登不下，則在新聞版上闢欄發表，一篇很出色的散文「郭泰祺訪問記」就是登在新聞版上的。這篇文章我當時曾經剪下來，可是現在却找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場戰火，簡直把什麼都燒精光了，可是現在爲了這些遺稿，也就不免會想起這位去世十多年的詩人氣質很重的郁達夫和他的往事來了。

記得是在一九二九年，那時，我還在上海暨大念書，在

初秋的一個星期天，我到真茹楊家木橋去探訪汪靜之先生，就在那裏初次見到郁達夫先生，那天恰是汪詩人的詩集「寂寞的國」出版了，他堅留我和達夫在他家裏吃「牛肉」宴，藉作慶祝。這天他預備的幾個菜餚，不外是紅燒牛肉，清燉牛肉，吃飯時兩位詩人的酒興不淺，還喝了不少黃酒。

我還記得當時我們談了不少的關於詩歌的問題，汪靜之極力主張揚棄舊詩。以「蕙的風」一卷蜚聲文壇的詩人——尤其是他那首「一步一回頭，瞟我的意中人！」的膾炙人口的小詩，有這樣的主張是難怪的；可是郁達夫却表示了他相反的意見，他表示他對舊詩較有興趣，同時還表示了他不會寫新詩，即使寫了也不會寫得出色。他還說他曾試用新詩譯過幾首薄命詩人道生的詩詞，覺得不妙；當時，他給我的印象，就是說話那麼坦率，那麼誠懇。他那時剪着平頂頭，穿着藍布罩衫，樣子是顯得那麼質樸，那麼親切，和那麼土氣。

「你喜不喜歡寫詩？」他忽然轉問我說。

「高興時偶然也寫寫。」我說。

「你喜歡新詩呢還是舊詩呢？」他說。

「他新詩寫得不錯，南洋地方色彩寫得很濃厚，舊詩他也寫的。」汪靜之突然插嘴說。

「那好極了。」他說，「可是你將來不能單靠寫詩生活的！王獨清就寫了一輩子的詩，却苦得要命！他的詩，一行要賣三塊錢稿費呢！」

「其實，文學家是做不得的。」汪靜之說，「如果要做文學家，那準會餓死！」

說着大家還哈哈地笑了一陣！

「你可以給我念兩首舊詩麼？」達夫對我說。

我當即背抄二首描寫南洋風光的竹枝詞給他。

「啊，你的詩寫得很新鮮！」他看了我給他抄出來的竹枝詞說。「不過，榴槤和娘惹這名詞是說什麼的？」

我當即給他一一解釋清楚了。

「啊，南洋這地方，有意思極了，真是有機會非去走走不可。」達夫說。

「汪馥泉也在南洋編過報，」汪靜之說，「像我們這種人老遠跑到南洋去發不了財，實在沒有什麼意思！」

汪詩人原來就是最講現實的，一腦子都是黃金夢。達夫並不以為然。他說司提文生的晚年就在太平洋的一個小島上度過的，他在那裏就寫了不少非常有意義的作品。達夫先生畢竟是詩人氣質很重的人，他的詩會寫得那麼飄逸，可見並非無因的。

我和他經過這一次會面以後也常常在內山書店，或者在某一種場合碰過幾次面，一直到我南渡以後，他給我的印象，總沒有那一次在汪靜之家裏的深刻得多。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郁達夫先生到新加坡來編報的消息終於在報上看到了。翌年一月他乘春假之便，到檳城來遊覽。當時檳城的一般喜歡搞文藝的朋友便定于一月四日下午五時，假座郊外的一家酒肆公宴郁達夫先生，事前派我和亡友李詞備兄去邀請，我們便約好於當天上午八時半去旅邸訪達夫。

那天早上，我們就依照預定好的時間去看望他。可是我們到旅邸的時候，他早已大清早出外去了。我們只得在旅邸的客廳坐候。大約過了十多分鐘，郁達夫出于我們意料之外蹣跚地從樓梯頂上出現了。

「啊，你來了。」他一見面就對我這麼說。

「還認得麼？」我說。

「認得的，認得的。」達夫不住地說着，「我們好多年不見了吧？」

「說起來有七八年了。」說着我隨即給他介紹了李詞傭兄。我們還沒有把來意說出來。他就把手中抱着的一個大包裹解開。

「我今早七點鐘就出門，去找舊書店。在一家印度人的舊書店買了這一大堆好書。」郁達夫先生一面說，一面把解開的書籍，一本一本地遞給我和詞傭共賞。

「這幾本德文本的王爾德，買得很便宜，每本只花二角錢。」接着他就又這麼說，「李先生沒有甚麼事吧，如果沒有事的話，多坐一回，我跟梓川是老朋友，想多談談，不碍事吧？」

詞傭兄連忙地說着特意來拜訪，多花時間也沒有甚麼，達夫隨即跑到臥室裏去取出兩篇稿子來。

「這是我今天早上寫的遊記，請你看看，這是我對檳城初見的印象。」他說着便把那篇題作「檳城三宿記」的文章遞給詞傭兄，然後就又把幾首詩交給我說，「你看看，我有沒有寫錯？」

我接過稿子一看。原來就是三首在檳城寫的詩。

「你有什麼意見麼？」他問我。

「我很喜歡你用謝枋得武夷山中詩韻的那首「故園歸去已無家，傳舍名留炎海涯，一夜鄉愁消未得，隔窗聽唱後庭花。」題名『宿杭州旅館』的詩。升旗山即景的那句『南天冬盡見秋花』，和『誰分倉皇南渡日，一瓢猶得住瀛洲』那二句我也喜歡，這兩首詩寫得很飄逸。」我把意見說出來了。然後，就又對他說：「達夫先生你可不可以把這首詩給

我寫一張條幅。」說着給他指出宿杭州旅館的那首詩。

「當然可以，不過，這裏紙筆都未便，我回到星加坡寫好了，再寄給你吧。」他說。

這時詞傭兄也讀完了那篇散文，把它交給我，我約畧讀了一遍，便說，「要在什麼地方發表呢？」

「打算在這裏的報上先發表。」他說，這時詞傭兄纔把我們的來意告訴他，說是這裏有幾個稿文藝的朋友舉行公宴，對他表示一點敬意，請他晚上撥冗出席。

「那怎麼好意思？」他說，「我的香港脚又出了毛病，鞋穿不得，很失禮的，今天我早上出門，你們瞧，就是這副形容。」

「那沒有關係，總之這裏的幾個朋友頗想聽聽抗戰中國的近情，達夫先生剛從那裏來的，所見所聞，一定不少。」詞傭說。

「好的，好的，既然這樣，我準來！」郁達夫先生答應了。

「那麼我們晚上見！」詞傭兄和我便起身告辭。

我記得那天晚上，在宴會席上，他報告了中國文藝界抗戰工作的近情，說是中國文藝界的近情由於抗戰一年半來，雖未有偉大的抗戰作品產生，原因却在于文藝界中人，此刻正從事抗戰的實際行動，目前一般文藝界中人，亦莫不認定以行動爲第一，所以當漢口淪陷前，文藝界人士就曾議定，能下鄉者下鄉，能赴敵後方者赴敵後方，能隨軍隊者隨軍隊，能赴海外者赴海外，一切不能者，則集中重慶，議定後各奔前程，他本人初赴重慶，繼轉南昌，視察各前線軍士，輒見前方軍士衣具不足，天寒衣單，且適逢淋漓秋雨，歸乃聯合同人，提倡募集寒衣，送往前方，迨後他才由福州南

來，將與馬來亞同文共同努力提倡文藝。希望文藝作者一齊努力云云。記得我當時還提出「幾個問題」請教他，事後他的答覆在報上刊出來了，竟惹起了一些同文的一場無謂的筆墨爭執。宴會是從五時一直吃到晚上八時才散席。從這次一別，直到日軍南進，我都沒有再看到他，雖則時常通訊，想不到一別竟成了永訣。他在星洲寫給我的條幅也于戰火中失落了。而想不到行篋裏却還留存了他的一束吉光片羽似的珍貴的遺作的剪稿。

達夫先生去世已十多年了。據當年盟軍當局的報告，他原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九日在蘇島巴爺公務失蹤，九月十七日被害的。根據他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廿六日寫的「懷四十歲的志摩」一文所說，他和志摩是同年生的，志摩去世的那年是一九三一年，時年三十六歲，由此推算，今年應該是達夫先生的六十多歲的了。

達夫先生去世雖則已十多年了，當時的情景還歷歷如在目前，一切彷彿是在昨天一樣鮮明，只是郁達夫全集至今還未見有人整理出版，文人身後的淒涼寂寞，真教人不勝慨歎！

蕭乾在檳城

記得是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一日那天，報上發表了蕭乾抵檳的消息，我正預備回寓的當兒，H兄從外面回到報館來，劈頭就對我說：「蕭乾到了，現在住在××旅館裏，你有空的話，最好去談談。」

原來他剛陪蕭乾走了大半天，說是爲的是去定購那張頗費周折的飛機票。他已決定了十三日飛星轉船回滬，真是夠得上說來去匆匆！因爲看到H兄滿臉的倦容，所以我也就只

好打消了邀他同去的原意，邀了L兄一道去拜訪他。在路上，遇到老S，他原來也是要去蕭乾的，老S和他據說還是從前在北京時的中學同學。

上了旅館的二樓，問了問侍役，纔知道他在睡午覺。我們正躊躇改天再來的當兒，誰知侍役嘴快，却把他喚醒了，進得房來，只見一個三十多歲的體格魁偉的男子，正在忙亂的穿上衣服。他的臉又圓又光澤，簡直像蘋果，給予人一種和善的感覺。但在我却不是張陌生的容貌，我好像在甚麼地方見過似的那麼熟悉。事後仔細思量，纔想起以前暨大的西洋文學系主任葉公超先生和他很相像，說話的神氣，舉動的閑適，態度的瀟灑，都無一不像。但他是蕭乾，是小說家，是名記者。照例是一番寒暄，話纔漸漸地談得投機起來。他很關切地問起我，副刊的投稿多不多，和覺得有什麼困難沒有？我很坦率地告訴他，投稿雖則不少，但不經修改就可用的却不多，因此有時不免要剪一點好文章轉載。感覺到困難的，倒是投稿者都把編者當作修改文稿的國文教師。

「稿費多不多？」

我對他說是二三元一千字。

「倒不算得低咯。」他說。

「那末就請你以後寄點稿子來增增光吧。」老S雖則和他是老同學，但是總覺得他實在有點冒昧。

「那不成問題，一定幫忙！」他很爽利地說。

「好極了，十分歡迎！」我說得很高興。

他健談，活潑，幽默，大概是在外國住得太久了吧，身體是那麼結實，精神是那麼飽滿，跟西洋人就差不了多少，名記者之所以會成名記者，除了豐富的學識和廣博的趣味之外，身體康健，精神飽滿也是重要的本錢，我暗地裏這樣

想。

後來老S問他對當地的報紙可有什麼意見。

「很好。」他簡潔的說。

「客氣！」我們不約而同地說。

「我的看法的確是如此，我說的是老實話。在物質條件這樣缺乏的現在，報紙辦得有這樣的成績，實在不錯！」他這樣補充了一番。

「英國可有幾家華僑報紙呢？」我問。

「沒有中文報紙，只有一個留英刊物。」他說，大使館並不看中文報。它裏面的一份重慶大公報，却是那邊的中國學生搶着看的報紙，尤其是學海軍的中國學生；不過報紙到得很遲，我動身的時候，才到三月份的報紙。」

「我們這裏已經看到四月底的上海報了。蕭先生從埃及寄出的一篇通訊，我也拜讀過了，實在得益不少，」我說，「我還想轉載，介紹給這裏的讀者呢。」

「啊，還有一篇比較早一些時候的通訊，你看到過麼？」他很關切的問，「好像是在三月份的報上，那篇通訊比這一篇，我自己要滿意一點。」

「我們訂閱的上海報紙是四月份才開始，所以沒有拜讀，可惜得很！」

我本想再請教他幾個關於英國文化方面的問題的，但他却反而向我談起此地的峇峇。話題一轉，却談到在這裏生長的蜚聲國際的哲學家辜湯生。這時窗外的陽光已經打斜了，而壁上的掛鐘也正敲了四響，想不到竟談了一個多鐘頭了。我們都知道他還要預備出席一個歡迎會，所以也就告辭了出來。

那天下午七時，在歡迎會的茶會席上，在主席致詞後，

便聽到了他講述留歐期間的見聞。他起初很客氣，說他拙於演講的口才，做新聞記者的第一個條件根本就不及格了。然後就又轉彎抹角地對檳城的風景，着實稱讚了一番。他跟許多到過檳城的文人一樣，說檳城是最適宜於幹文化工作的好地方，然後就又說：「這次世界大戰，便宜了我們新聞記者，過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政府和新聞界就不注重報導。如果下次還有大戰發生的話，新聞記者恐怕連筆也不必用了。因為一顆原子彈炸下來，便萬事皆休，那裏還需要新聞記者的報導呢？」

說到這裏，大家都哄笑起來。接着他告訴我們，當一九三九年初。他剛到外國，人家對我們總不大瞧得上眼。但珍珠港事件發生後，太平洋戰事爆發了，便眼看着中國在國際間的地位，像箭似向上飛升，因為我軍與盟軍并肩作戰，立下了不少的勳功偉績。加以我軍單獨對日本作戰了幾年長，堅忍卓絕的精神，便值得外人的欽佩。

後來他還告訴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故事，他說：「在德國投降時，有廿多個記者要去視察，但艾森霍華將軍事前却召集他們，說：『到目的地要在廿四小時內不準發出德國投降的消息。』大家都宣誓答應了。誰知有一個美記者違了約，偷發了消息出去。在新聞學的見地來說，他的確是一個英雄，但在新聞記者本身的道德上來說，却不免要受到人家的非議了。」

散會時，燈火已經輝煌起來了，正好是吃晚飯的時間，我們幾個朋友趁便邀他吃一頓便飯，隨便談談。

在席間，我問起我他所喜愛的一個現代英國小說作家H.E. 貝茲的近況。他說他還健在，大戰時他參加空軍，並且還寫了許多的小說，這個作家實在了不起。話題一涉到文藝上

去，便免不了會提到近年來英國小說作家究竟誰在文壇上的地位最高的問題上去。

他說：「在中國知名的毛姆和 J. B. 柏斯黎，在英國不過是個流行小說作家吧了。」

「蕭先生喜歡勞倫斯的小說嗎？」我想起了前幾年因肺病去世的薄命文人勞倫斯和他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那部舉世知名的傑作，所以才這樣問。

「好極了，他的小說在中國，人家只知道他是個描寫性慾的小說家，其實他在英國文學上的地位是很崇高的。」他歇了歇又說：「還有個女作家吳爾芙夫人也很好，可惜在前幾年自殺了，戰後的英國，却沒有見到有什麼了不得的作品，大概時間還短吧。」

這時候，夥計把菜餚端捧了來，我們也就只好暫時按下不表，只顧一味靜靜地喝酒吃菜。

「蕭先生，你喜歡看電影嗎？」坐在他對面的一個朋友終於打破了沉寂的說。

「啊，喜歡的，英國戰後出過幾部片子很不錯，比如『爲誰而戰』咯都很好。還有最近有一部採用蕭伯納的傑作『枯婁巴』拍製的片子也很好，女主角就是演『亂世佳人』的女主角，她的戲演得好極了。據說這齣戲花了三百萬金鎊拍的，在開演前先開宴會，並試映招待英國各報記者，第二天各報却寫了文章大肆攻擊一番，這倒是很幽默的。」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當菜吃過了之後，他拿起面前的一條香蕉，邊吃邊說：「英國在戰爭這幾年期間看不見一條香蕉，葡萄要賣八個金鎊一磅，不過每日有橘子配給，因爲政府當局覺得橘子對於人體較有滋養料，所以都改種了橘子。」

他看到H兄停了筷，他問爲什麼不吃了。

H兄告訴他因爲胃不大好。

「那麼，你應該找一個人照顧照顧咯。」想不到他竟開起玩笑來了。

「蕭先生身體這麼好，我相信一定是有人照顧的了？」
H兄一點也不示弱地說。

「還沒有，還沒有。」他連忙接着這麼聲明。

這麼一來，我們纔知道他還是獨身漢子。據說他這次之所以急於回到上海去的原故，第一件大事，原來便是結婚。

不久，便看到報上關於他和一個英國小姐結了婚，在復旦大學當教授的報導。似乎，過了不久，就又看到關於他離婚的新聞。這個「人生採訪」的作者在這十多年內，沒有什麼作品產生，十多年的期間並不算短，只是最近纔看到他翻了蘭姆的「莎士比亞樂府」。實在教人覺得悵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Hong Kong

[總：3040]

定價港幣一元八角